

# 中共党史资料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44

中共党史出版社

# 中共党史资料

第四十四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2年·北京

**(京)新登字071号**

**中共党史资料(第四十四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

---

**出版发行: 中共党史出版社**

(北京1929信箱 中央党校南院)

**经 销: 新 华 书 店**

**印 刷: 百善印刷厂**

---

850×1168毫米 32开 8.125印张 150千字

1992年11月北京第1版 1992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2500册

---

ISBN 7-80023-459-2/K·448

定 价: 3.50元

## 目 录

### 回忆录

- 西北局的光荣使命 ..... 傅 钟 ( 1 )  
回忆鲁迅 ..... 楚图南 ( 37 )

### 人物介绍

- 叶剑英的读书生活 ..... 张廷栋 ( 42 )  
记林月琴 ..... 黄 瑶 ( 62 )

### 专题资料

- 关于毛泽东争取江西首先胜利  
    战略思想的历史考察 ..... 盖 军 (100)  
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 ..... 邓礼峰 (139)



从中英联合声明到香港

基本法的诞生 ..... 魏 刚 (169)

会议介绍

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

和三月会议 ..... 王秀鑫 (194)

史料研究

红军长征史史料研究概述 ..... 曾景忠 (212)

小资料

武汉工人纠察队的建立和失败 ..... 张光宇 (248)

## 西北局的光荣使命

傅 钟

1936年7月，党中央为加强红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的统一领导，批准成立中共西北局。西北局以朱德、任弼时同志为核心，挫败了张国焘的分裂阴谋，保证了红二、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会师陕甘的胜利，为红军三大主力完成长征，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建立在大西北，做出了贡献。这段艰难历程一直铭刻在我的记忆里。

### 朱总司令的英明决策

1936年刚进7月，红二、六军团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合了！陕北发来了由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68位同志和一方面军、陕甘宁红军、苏维埃政府、人民团体、赤卫军、少先队等10个单位联合署名的贺电。贺电说：“我们以无限的热忱庆祝你们的胜利的会合，欢迎你们继续英勇的进军，北出陕甘与一方面军配合以至会合，在中国的西北建立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与全国抗日人民、抗日军队、抗日党派建立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挽救中国于危亡，解放中华民族于日本

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与此同时，红二、六军团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

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和红二、四方面军原已商定的计划，红军总司令部作出了进军陕甘的部署：先以左、中、右三路纵队穿过草地，到松潘包座一线集结；尔后向甘南的岷州、洮州、西固（今舟曲）地区进攻，打开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的通道。行进序列是：四方面军先机出动，李先念同志率骑兵师和八十九师为先遣军，在前边筹粮；徐向前同志率四方面军总部、九军、四军十二师、独立师和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为中纵队，2日从炉霍出发；董振堂同志率五军团和三十一军九十一师为右纵队，10日由绥靖（即大金）、崇化地区出发；朱德总司令率领四军的十师、十一师和三十军的八十八师为左纵队，3日由甘孜地区出发。贺龙、任弼时同志率领的二方面军（包括罗炳辉同志率领的三十二军），分两个梯队，沿左纵队的路线跟进，7日从甘孜等地出发。我当时是从炉霍率领慰问团到甘孜欢迎二方面军的，随左纵队的四军行动。

对四方面军来说，这是第三次过草地，而且路程最长，要走1个月，其艰难困苦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但部队已经过几个月的休整，战斗情绪很高，由于二方面军的到来，更加坚定了北上的信心。整个部队情绪确如后来任弼时同志向党中央报告的那样：“政治军事工作都有极显著的进步与成绩”。然而令人焦虑的是，张国焘仍没有停止反党活动，他向二方面军的领导干部游说，散布对党中央的不满，进

行挑拨离间，企图拉拢人同情他，在良好的统一、团结的氛围中制造混乱。

针对张国焘的行为，朱总司令在会见二方面军的主要领导时，让他们了解了张国焘反对党中央、分裂红军的事实真相及其过程，并采取了一项重要措施：要任弼时同志随总司令部行动。无疑这是一个十分英明的决策。

我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一年来，朱总司令为了维护党中央的统一领导和红军全军的团结，使南下红军重新北进抗日，正气凛然地、从容不迫地同张国焘进行周旋，费尽了心血。让任弼时同志留在总司令部，显然会更有力量地抵制张国焘的错误影响，大大加强党的领导。左纵队乃至整个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得知这一决定后，无不喜形于色，对前途充满希望。

我和任弼时同志相识于1926年。那时，他是共青团中央总书记，到莫斯科参加少共国际代表大会，我在中山大学任学生支部局副书记。有一天，在共产国际大楼，领我去见他的苏联同志说：“这是你们的代表！”后来我们交谈过多次，结下了诚挚的友谊。1930年，我回国在上海中央军委工作，他是长江局委员，开会常在一起。他严格要求自己，其原则性和组织纪律性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记得张国焘回国不久，提出要到军委看文件，任弼时同志说：“他看文件到中央组织部去，不要到军委来。”对于张国焘，他是知道底细的。1931年后，我从鄂豫皖到川陕，对张国焘在掌握政策上的过“左”和不搞党的建设，就积了一堆



意见。同一方面军会合后，他和党中央搞不拢，好端端的四方面军由8万人被他弄得剩下不到一半……压在我心头的郁闷和痛楚日益沉重，恨不得立刻向弼时同志说个痛快。

## 草地竟夜谈

进入草地的第二天晚上，任弼时同志主动找我谈话。他讲了二方面军7个多月的艰难行程，也称赞四方面军的《二次北上政治命令》和《北上抗日政治工作保障计划》搞得不错。他对我很信任，直截了当地说，你们发的小册子，讲和党中央的分歧，说一方面军“不辞而别”，这样散布不和，损害团结，为什么要发给我们？那是不应该发的。随后，他开门见山地问我：“去年北上，中央走了，你们为什么不走呀？”我不假思索地说：“不知道。”他很惊讶。我说当时确实如此，不知道怎么闹到了那种地步。他仔细地听我说了我的经历和所见所闻。

毛儿盖会议后，我在右路军前敌指挥部任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是陈昌浩同志，徐向前同志是总指挥。尽管张国焘对我们说过一些挑拨离间的话，但大家都知道他的为人，并未深究，而且对中央的北上方针是完全同意的。所以王稼祥同志说：“看来你们和张国焘是有争论的。”但这段时间令人不安的是，陈昌浩同志非常傲气。我看到他在参谋长叶剑英同志面前也是旁若无人，对党中央、一方面军说些令人十分难堪的话。我看不下去，表示了意见，陈就要

我离开政治部，到包座前线部队进行战地工作。随后李卓然同志也去了。9月11日清晨，突然来了骑兵通信员，送来陈昌浩同志的“特急飞传”的信件。里边是张两指宽、4寸长的纸条，上面写着：傅钟、卓然：赶快回来，中央夜里秘密开走，去向不明。他们丢下我们“开小差”，用意何在？飞速来议。

这突如其来的事变，真是霹雳盖顶，卓然和我都懵了！象被窒息了一样说不出话来，只是默默相顾，不知所措。过了好一会儿才想到：赶快走，回巴西！于是丢下带来的工作人员，我和卓然快马加鞭，往巴西飞跑。到达巴西已时过中午。见陈昌浩同志在大庙里，庙里坐了好多人，徐向前同志身体不好，斜卧在门板上。我靠近他坐下。陈昌浩同志开始讲话，神情暴躁至极，说中央“右倾”，“怕死”！丢下我们“逃跑”了！许许多多难听的话都脱口而出。人们听了更觉茫然，心神无主，难过极了！昌浩说完，问谁有话讲？我说没有，卓然也说没有。向前同志难受得很，叹气，无语。天近黄昏，陈昌浩宣布南下，口号是“打回通南巴！”要政治部对部队进行动员。我问昌浩，究竟出了什么事，为什么到了这种地步？昌浩说：你不必担心，我们还有几个军，自有出路！你们搞好政治动员。在庙外草场上，我面对部队说不出话来，心慌意乱，只讲了讲行军注意事项，什么绑腿要打好呀，脚布要包好呀，防止“烂脚病”呀，要发扬阶级友爱呀，东一句西一句，言不由衷，匆匆结束。

第二天，黎明即起，在凄风苦雨中南下，人们的心象被浓厚的乌云紧紧包裹着，部队情绪和北上完全相反。走了10多天才知道，原来不是去通南巴！待到了板阳，10月初，张国焘、朱总司令从阿坝方向来到卓克基，四方面军和一方面军的五军团、九军团（后改为三十二军）又会合在一起，七八万人，浩浩荡荡！但想到党中央和一方面军已远去北方，不免感到孤单和不安。徐向前同志说过，合而再分为兵家所忌。但张国焘是听不进这种意见的。有天晚上，他突然召集会议宣布成立“中央”，自任党的军委的“主席”，一下子就乱了！胡说的，乱喊的，混乱极了！张国焘闹独立，搞分裂，这算坏到了顶！

任弼时同志是敏于事而慎于言的。听完我讲的过程，严肃地问我：“北上有决议没有？”

我说：“有。”

“有，为什么不执行？”

弼时同志这个提问，一针见血，刺中我的思想深处。尽管草地的凌晨格外寒冷，我身上还是不由得冒出了汗。关于一、四方面军共同北上的战略方针，在两河口会议、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上，党中央都作了决议或补充决定，其中有两个会议我也列席了，但却没为执行和维护它进行坚决斗争。这是我终生难忘的过失，后来我多次为此作过自我批评。但这天晚上，弼时同志没有再说什么，只要我明天到总司令部机要科去看电报，说：“凡我看过的你都可以看。”



看过电报才知道，原来在一、四方面军分开前后，有不少重要事情，但我根本不知道，不是弼时同志打破张国焘的封锁，我还是被蒙蔽着。比如：中央率一、三军团到俄界后，不仅等了3天，来电7次，规劝张国焘放弃“南下”，跟随北上，而且直到9月18日，彭德怀、聂荣臻同志等还致电张国焘，告知他们已占领甘南的大草滩一线，当地的物资丰富，汉、回民众热烈拥护红军，“请你们立即北进”。显然，中央一直是坚持两河口会议精神，希望、等待并准备接应四方面军共同北上的。对争取张国焘一起北上真是做到了仁至义尽。所以弼时同志再次和我长谈时语重心长地指出：“看来，不是中央丢下你们走了，是你们不跟上中央走，中央才先走的；责任不在中央，在你们！”这对我启发很深，彻底分清了是非。

关于张国焘自立“中央”问题，弼时同志说已在李卓然同志那里了解过。我说，那个委员名单，全是张国焘和黄超搞的，别人概不知道。那天晚上开会，事先都不摸底，陈昌浩同志也不晓得要干什么。经过10来年艰苦奋斗和无数先烈流血牺牲创造的红军，眼看分裂到这种地步，谁不痛心叹惜呢？所以不管当时一些同志胡说了什么，胡喊了什么，都是张国焘的分裂阴谋所使然，党会理解的，历史会澄清的。弼时同志就是这样，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这个问题，团结了所有同志。我把那次会上的记录给他看过，他明确指出：“责任全在张国焘，事是他干的，人是他定的，你们谁管得了？”后来，弼时同志没有为此批评过哪个同志。



对我则非常诚恳地说：“按照列宁的党性原则，我们不是不参加党内斗争。必须考虑到，我们是拿枪的，彼此都带着队伍！意见有分歧不好搞斗争的！我们还在长征当中，艰难困苦，人间罕见，团结一致比什么都重要。”他的这些话贵如金石，在我心里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共鸣，不仅使我经久不忘，而且每想到它都会引起新的震动。

有一天，弼时同志当面告诉张国焘已和我谈过话。张国焘满脸不高兴又不好明讲，只是说，可以再多找几个同志谈谈。还指名可以找谁谈谈。弼时同志说，和傅钟同志还没有谈完，以后再找别的同志。他清楚张国焘的用意，是要让听他的话的人来施加影响，混淆是非。弼时同志的明确答复，既是保护我，也击破了张国焘的圈套。

弼时同志继续和我谈的，是维护党中央的统一领导问题。在那些天里，张国焘一直散布：他取消了“中央”，和中央那边是平等的协商关系。说是陕北那边改称西北局，这边是西南局，象上海局、北方局一样，都由驻共产国际的中国代表团统一领导。对此，弼时同志只是静心听没有说过什么。这天晚上他向我了解为什么这样提出问题？自立“中央”，已是我们党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分裂危机，既然宣布取消了，为什么还不服从党中央的统一领导？我向他汇报了问题的由来和变化过程。

张国焘是1935年11月中旬南下红军打下芦山县城之后公开打出“中央”旗号的，党中央严厉批评了他的分裂主义行为，指令他不得再自称“中央”。1936年元旦，毛泽

东同志给朱德同志的新年贺电说，不仅已和上海局发生联系，也同国际发生联系，“这是大胜利”。自然，对于张国焘，这也是个警告。不几天，张闻天给张国焘来电话说：“兄之临时中央，望自动取消。否则长此下去，不但全党不以为然，即国际亦不以为然，尚祈三思为幸。”这算是直言相劝了！到1月下旬，中央电告“十二月决议”（即瓦窑堡会议决议）要点时，从共产国际归来的林育英同志来电肯定党中央是正确的，也要张国焘取消自立的“中央”，成立西南局，直属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朱德、刘伯承、徐向前同志等本来就反对他自立“中央”，这时也都劝他接受林育英的“通融”办法，目的是维护党的统一，早日结束分裂状态。但张国焘坚持反党立场，又要诡计，一面表示愿谋党的统一，一面却提出这里是西南局，陕北（党中央）那边要改为西北局，由共产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他还是那个不承认党中央、反对党中央统一领导的主意。

弼时同志不了解这些情况，说5月20日中央有过电报谈了与张国焘的关系，“暂时采用协商方式”，为求革命胜利，应改变过去一切不适合的观点与关系，“而以和谐团结努力奋斗为目标”。中央没有讲与他是平行的“局”之间的关系，也不应该是这样的关系，而且我们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是党中央派出的，怎么能颠倒过来领导党中央呢？

弼时和我都会俄语，这有利于我们把心底深处的话，包括直接批驳张国焘的话都可以无所顾忌地说出来。对于张国焘破坏党的统一，他极为愤慨，说：“搞派别活动是张国

焘的老毛病，斯大林都知道，想不到会发展的这样严重。”他认为最迫切的问题，是维护党中央建立绝对统一集中的最高领导。他用俄语说，列宁是非常重视统一问题的！列宁说过，统一对工人阶级是无限宝贵的，无限重要的，在斗争中是最伟大的武器！而没有统一的领导中心，党的真正统一是不可能的。我们再不能让张国焘破坏党的统一了！弼时同志这种坚定的鲜明的维护党的统一的态度，对我教育极为深刻。

经过几次和弼时同志的竟夜长谈，使我对张国焘在四方面军党内制造的政治上的阴霾、思想上的糊涂、组织上的混乱有了深刻认识，一些问题也得到了澄清。按照弼时同志的见解，我和王建安、袁克夫等四方面军政治部的高级干部作过长谈。他们完全赞成弼时同志的意见，并积极主动地在部队中进行了团结一致和维护中央统一领导的思想教育。这样，指战员的精神面貌显得生机勃勃，对二方面军同志的感情更加亲热。

“太阳万岁！”

不远就是噶曲河了。连日阴雨、闷热的天气，被骤起的风吹得清爽起来，霎时乌云也散了，久违的太阳露出火红的圆脸，把灿烂的阳光洒满草地。走在队伍中的刘伯承总参谋长情不自禁地高呼一声：“太阳万岁！”这句话表明了人们的共同心境，于是长长的行列上空，象有万顷波涛



喧嚣一样，连连响起“太阳万岁！”“太阳万岁！”的喊声。接着笑声、歌声也飞扬起来。曾经旅欧的、留苏的同志们，有的用法语唱《马赛曲》、《国际歌》，有的用俄语唱起了沙皇时代革命志士的歌：

同志们向太阳向自由，

向着那光明的路。

你看那黑暗已消灭，

万丈光芒在前头！

尽管谁也不是够格的歌手，弼时同志在合唱中还总比别人慢半拍，但年轻的战士们听了，身上显得轻快了许多。

过噶曲河小休息，廖承志（当时叫何柳华）同志来了，掏出铅笔和纸问“哪个要画像？”刘伯承同志要他给画，还要他把岸边的渡船也画上。许多同志围上去看他运笔，称赞他画得好。接着，给我画了一张侧面的头像，下边签上了时间地点：“11.7, 1936, 绒玉”。~~这幅画~~我一直保存着。当时若不是很快出发，他还可以给人多画几张的。刘伯承同志和我用以酬劳他的，是倒给他半袋子青稞。他诙谐地喊着：“卖画罗，公平交易！”这期间，由于张国焘推行错误的肃反政策，他还被看押着，但由于朱总司令、弼时同志的关照、保护，已有若干“自由”，不仅有“新闻电台”大量的译电、编辑工作，还常常出“队”执行画马克思、列宁的像、布置会场等任务。他在被看押的队列中规规矩矩，一出“队”工作，就显出幽默、乐观的本色，走到哪里，哪里的愁云就被他赶个精光。



5月间在炉霍，举行有朱德、刘伯承、罗世文、张琴秋等同志主讲的“世界政治经济研究”讲座时，廖承志同志曾是《东方殖民地革命运动》、《关于国民党》、《日本问题》的讲演人。他以丰富的知识和精辟的分析，提高了大家对国内外形势变化的认识。这个讲座，是为迎接全国人民抗日斗争高潮的迅猛发展举办的。人们通过这个讲座，加强了拥护党中央正确路线——开赴大西北抗日前进阵地的思想基础，筑起了抵制张国焘反对党中央、反对北上错误的思想防线。弼时同志对此是肯定的。在这当中，廖承志、罗世文和朱光同志编译并刻印的新闻材料起了很大作用。

队伍天天在广阔的草地上行进，不见人烟，不见村庄。有时我问伯承同志：今天走多远？他总是说，听太阳指挥，它落山，我们宿营。

### 求 吉 寺 会 议

7月27日，在阿木柯河（今牙磨河）畔，接到中央来电，批准建立中共西北局。西北局委员有：朱德、张国焘、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肖克、王震、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傅钟、李卓然、曾传六、张琴秋、王维舟、董振堂、罗炳辉、何长工、黄火青等20位同志。张国焘为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西北局只设组织部，确定由我任部长。我当时是没有军事职务的。这主要是弼时同志的意见。后来在西北局下达党务工作的文电中，在张、朱、任

后面要签上傳。我提出不要署我的名字。弼时同志说：“要这样，为的是便于你在四方面军开展工作。”朱德同志是大力支持我的，凡属党务、党纪和高级干部的工作、学习调动、安排，他都交我负责办理。后来，还让刘少文同志担任了秘书长。西北局算是有了一个非常精干的日常工作机构。

中共西北局的组成，出乎张国焘的意料之外。这显然不是那种直属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和党中央平行的组织，而是归中共中央统一领导的下属组织。广大指战员对成立西北局热烈拥护，并寄予厚望。西北局的使命和大多数委员的共同意志是：维护党的领导地位，坚持党的组织原则，打破张国焘的个人专权，保证党中央方针的贯彻和北上会师部署的顺利实施。

7月末8月初，左纵队和中纵队、右纵队经过1500里的艰苦跋涉，走出草地，先后到达包座一线集结。西北局要在包座河西畔的求吉寺（也叫救济寺）开会。任弼时同志同徐向前、陈昌浩等四方面军的领导和高级干部多次交谈，了解情况，交换意见。会议前夕，徐向前同志等特意赶到山下的王友钧烈士墓前献了鲜花，表示对1935年壮烈牺牲在这里的右路军烈士们的哀悼和怀念。王友钧同志也是我的老战友。他原在蔡申熙同志领导的红十五军。1931年初红十五军和红一军合编成为红四军，再发展成红四方面军。他一直在这支部队，从鄂豫皖到川西北，身经百战，功绩卓著，是全军闻名的“夜摸将军”。牺牲前是红四军十师师长，年仅24岁。他是为全军打开北上抗日通道而以身

殉职的。他牺牲后我到了十师，人们传诵着他身先士卒，把机枪架在警卫员肩上猛烈扫射敌人，掩护部队冲锋的英勇事迹。他的牺牲使战友们异常悲痛！但更令人痛惜的是，烈士们的战绩被张国焘断送了！部队没有沿着他们打开的通道迳直北上，而是走了这样一段大弯路。在烈士墓前，人人都由地立下决心：沿着他们用宝贵的生命打开的通道勇往直前，奔向党中央指示的北上会师抗日的伟大目标。

在求吉寺会议上，朱德同志语重心长地说：一个好的党员应该拥护党中央路线，维护群众利益。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一个政党，一个军队，一个人，不站在抗日斗争前线，将不会有他的立身之地。我们要把自己的历史任务担负起来，大家都要加紧学习。他还就西北局要按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进行工作的问题说道：我们党讲民主，委员要是好党员，书记要是好党员，好委员；在西北局里，书记一样要服从多数委员形成的决议，这才有集中的统一的领导。大家都赞成并支持他的意见。这对张国焘搞个人专断是个有力的扼制。随后，徐向前同志也就应该按组织关系进行工作的问题发了言。他说：四方面军的干部大家都清楚，优点是不说虚话，缺点是懂得少；过去我们对干部的批评多用个人的办法，没有建立工作的组织关系，因而养成了骄傲。以后应当转变个人的领导方式，多用组织力量去推动工作。为了加强部队基层党的建设，徐向前同志还提出，支部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平时工作的讨论，党的发展情形，政治部应当去进行检查。朱、徐同志的这些意



见，过去也对张国焘说过，但没起什么作用，现在在西北局的会上正式提出来，对张国焘是个严正的批评，他不能不听下去。这样，有朱德、任弼时和徐向前等同志带头坚持正确原则，党内生活开始有了新鲜空气。

这时，任弼时同志想解决的主要问题是让四方面军的干部真正从思想上以“十二月决议”为基础在党中央领导下团结一致。但在对党中央的态度上，还有思想障碍要克服。张国焘不顾在遵义会议所处的紧迫的战争环境中，没有条件从政治上清算“左”倾错误路线这样一种重要情况，利用遵义会议决议没有指出以前的中央政治路线也有错误的问题，散布对党中央的不信任，在干部中造成了思想混乱。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党中央派刘伯承同志等到四方面军传达两河口会议精神，正好是和张国焘同行的。临到四方面军领导机关，张国焘耍了个手腕，他把刘伯承同志等放在一个军部里“休息”，自己先到四方面军领导机关给干部们讲了一通，使他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东西在干部头脑中先入为主，待到刘伯承同志正式传达时，正确的东西就被“抵挡”住了。弼时同志要大家紧紧团结在党中央领导之下，他引导大家要把眼光放到当时最重要最紧迫的问题上来，他说：我们和党中央和一方面军会合之后开会，中心还是讨论迎接抗日民族革命运动新高潮的问题，对以前的问题，有冷静的、客观的自我批评，就不再提了。陈昌浩同志自此以后思想上有了很大变化，所以他后来反对张国焘的西去主张，坚持北上方针，态度非常明确，不仅



积极率领前锋部队夺得岷州一线，而且在9月上旬，率先提出了北出通渭、静宁、会宁，与一方面军南北夹击胡宗南西进部队的方案。

7月底、8月初的敌情是，蒋介石忙于对付两广事变，胡宗南部已经南调；同时蒋命令他的重庆行营在川、陕、甘、青部署一道防线，“凭借天然险要及原有碉堡线，采取攻势防御”，对我分途追击，多线堵截，阻我三大主力会合。党中央连续来电指示，“宜迅速北进”，“取得三个方面军的完全会合”；“我们已通知全苏区红军，准备一切条件欢迎你们，达到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合。”显然，党中央的指导思想是非常明确的。但在求吉寺会上讨论北进计划时，张国焘却对原拟的北进岷、洮、西的计划，只是在口头上说一说，而不做实际部署。相反，却提出要部队从齐哈玛过黄河，由西面北出青海到新疆。这遭到了多数同志的强烈反对。原来，二方面军到甘孜之前，他曾派人探过去青海的路，因为根本无路可走，也走不出去，就没有再声张。现在看到部队已和党中央愈来愈近，就又提出这种计划来。朱总司令细心分析，判定事关全军的战略方向，不能走西去的路。任弼时同志也说，有三条理由不能西去。第一，两广事件的发生，说明国民党内部在全国人民的抗日高潮面前不同派别的矛盾尖锐了，对蒋介石的现行政策是个摇动；第二，我们和一方面军会合，突破张学良的“围剿”，陕甘宁三省会成为我们抗日前进的根据地，结束我们的流动；第三，红军主力配合全国人民抗日高潮有重要作用，若到黄河以西

处于偏僻之地就不行了。会上的同志们对任弼时同志的精辟分析十分佩服。张国焘看势头不对就放弃了从齐哈玛过黄河的企图。

经过充分讨论，西北局通过了立即进行岷、洮、西战役的计划，8月5日下达部队，要求全军以迅雷行动，“先机夺取岷、洮、西地区，主力向天水、兰州方向进展”。命令以三十军、九军、五军为第一纵队，由徐向前、陈昌浩同志率领，5日当天从求吉寺出发；以四军、三十一军组成第二纵队，由王树声、詹才芳同志率领，7日自包座出动；第三纵队由二方面军组成，因尚在行进中，待到达包座后于12日出动。

在此期间，西北局还审议了岷、洮、西战役的《政治工作保障计划》。指出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务，是进行热烈的战斗鼓动，使部队充分认识这个战役的重大意义，“打大胜仗，会合全国主力红军！”“严守政治纪律，争取西北广大抗日民众！”关于同一方面军会师的动员与准备工作，还强调指出，要以中国革命的最高利益为原则来解决。“在四方面军的指战员中，应特别注意学习与研究过去与一方面军会合中的经验教训，开展必要的自我批评，纠正过去的缺点，消除一切不满和误解现象”，“进一步发扬这次二、四方面军会合中高度的阶级友爱的热情。”由于西北局同志们的共同努力，对部队政治工作尤其是思想教育，抓得很紧。四方面军政治部还主动编写了如何运用统一战线的通俗教材，加强了对各军政治工作的直接领导。同时，注意学习

二方面军运动战中的政治工作经验，使各部队的政治工作在许多方面有了明显进步，在北进战斗中发挥了保证作用。

8月9日，前锋部队夺下天险腊子口，直逼岷州城下时，西北局随红军总司令部离开求吉寺向俄界前进。6万之众的两大主力红军，以锐不可当之势挺进甘南大地。

### 挫败张国焘的阴谋

进入甘南地区，确实感到“柳暗花明又一村”了。这里人口稠密，物产丰富。刚刚走出茫茫草地，皑皑雪山，猛然看到庄稼村舍，听到鸡鸣犬吠，干部战士莫不欢欣雀跃，热泪盈眶。路上跑着驮东西的小毛驴，货摊上摆着火红的柿子，圆溜溜的白兰瓜，南方人见了又新奇又兴奋。1935年一方面军由此路过，给人民群众留下了良好印象。他们亲眼所见，红军是亘古以来独一无二的不扰民、不欺民、帮助老百姓担水扫院子的好队伍。听说红军又来了，无论汉民、回民都拥到村头和路旁，喜盈盈地欢迎我们。

当时甘南的敌人，只有王钧、毛炳文、鲁大昌等部在岷州、洮州、西固分别驻防，构成西固至洮州、天水至兰州两道封锁线，企图阻止我军北上会合一方面军。

部队按计划展开后，连战连捷，为北上会师而战，斗志格外昂扬，纷纷提出杀敌竞赛口号。三十军和三十一军提出要“活捉毛炳文，迎接大会师”；九军提出“拿下岷州城，活捉鲁大昌”；四军提出“攻占洮州城，撕开封锁线”。



四方面军政治部及时通报各军的杀敌情况，鼓舞部队发扬艰苦奋斗和运动战的特长，提高战术水平，保证战役胜利。在此期间，西北局还就开展地方工作和“扩红”运动发出指示，作了部署，使部队及时补充了新生力量，在群众中扩大了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

经过10多天的激烈战斗，部队占领了洮州新旧两城和渭源、漳县，截断了西固、岷州大道，除岷州城有鲁大昌部死守待援外，甘南大部地区已被我军占领。这时，西北局随总司令部驻在哈达铺。这是岷州西南的重镇，有五六百户人家。8月25日，陈伯钧、王震同志率领的二方面军先头部队——六军团的十七师和模范师到达哈达铺时，红四方面军的九军一部列队欢迎，军号声、口号声、歌声、掌声响彻云霄，情形十分热烈。第二天中午，十六师、十八师赶到以后，下午4时，两军举行联欢大会，演出了文艺节目，隆重庆祝两大主力红军北进会合的胜利。到9月6日，继三十二军之后，二军团也全部到达哈达铺、礼县一线。至此，西至洮河两岸，东至礼县一线，北至9月7日三十一军占领的通渭，共有80万人口的广大地区在二、四方面军手里。而出动接应二、四方面军的一方面军的西征军，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同志率领下，自8月末从预旺出发，正向同心、海源以西，固原以南地区迅猛攻击。三十一军和西征军的侦察通信人员已经拉上了手，开始沟通来往。三大主力红军即将会师的态势已经形成。这巨大的胜利，鼓舞了全党、全军和广大人民，震惊了国民党政



府和日本帝国主义。张国焘妄图分裂党、阻挠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于抗日前进阵地的阴谋被挫败了！

然而，张国焘是不甘心的，他显得非常急躁。他让周纯全同志找任弼时同志说，两个方面军开个干部会，首先求得意见一致。弼时同志清楚，张国焘是想利用这个会拉出一部分同志同情他，支持他，同党中央继续对抗。弼时同志对周纯全明确表示：不要开这个会！把党内分歧在干部中公开出来，会造成上层对立，使工作更加困难，损害团结。张国焘听不进这种劝导，找到弼时同志坚持要召开两军干部会。弼时同志非常冷静、镇定，义正词严地说：“我反对开这个会！如果你坚持要开，我敢肯定，会上争取四方面军的进步干部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二、四方面军干部对你态度尖锐起来，我不负责任。”弼时同志的话，力抵千钧。张国焘害怕自己更加孤立，就不再提开这个会了。

但是，在西北局内部，张国焘同朱德、任弼时同志的争论日益深刻和严重。从8月9日由求吉寺出发以来，党中央对抗日统一战线的发展形势，对红军总的战略任务和冬季作战计划，频频发来指示。而张国焘口头上赞成统一战线策略，实际上是另一回事。他不相信在日寇加速全面进攻和全民抗日运动继续高涨的条件下，国民党及其军队大部或全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见到《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他说这象是韩愈的《祭鳄鱼文》，是不着实际的幻想；他还指责党中央提出成立国防政府，是重复法国镇压巴黎公社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口号。弼时同志针锋相对

地驳斥他的谬论，批评他根本不相信统一战线，不晓得如何估计阶级力量的变动。弼时同志指出，不能看到红军数量比过去少了就以为整个形势都不好，只有向西撤退，这是机械唯物论的错误观点。张国焘本来没有一点理论，更不接受马列主义理论，竟立刻抢白说：“机械唯物论总比唯心论好一些”。他不可救药已到这种地步。

本来，朱总司令是主张四方面军不要在甘南停留而迳直跨过西兰公路去会合一方面军的。后来陈昌浩也提过，四方面军向陇东北前进。张国焘则相反，总想往西去，甚至说：“打日本不是简单的。我们现在的力量就是再增加10倍，也不见得一定能打赢它。我们只能将西方变为苏维埃的后方，做前方抗日红军的后备军。”朱总司令嘲笑他胆子太小罗！说：“四川军阀打仗是溜边的，碰上敌人绕弯弯，见到便宜往前抢。国焘同志你莫要溜边边呀！我们长征是要到抗日的前进阵地，红军要成为抗日先锋队、模范军。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向绥远、宁夏进攻，敌情在北面咄，你老想向西去，当然打它不赢，只是跑得赢了！”

接着，张国焘提出两个行动方案报告党中央。一是往西去，到新疆接通苏联，获得武器装备再回来；一是出东南，向川陕豫鄂发展。9月8日党中央电复：往西行动须求苏联协助，要等国际回答，已派邓发去国际申请并报告情况。对于出东南，中央指出是向南京进攻的姿态，只能在与南京谈判决裂后才是可行的与必须的。这样，张国焘才不得不同意按党中央8月30日电令执行：“发展甘南作为

战略根据地之一……使之成为另一战略根据地，与陕北、甘北相呼应。”于是，西北局原已通过的在甘南建立临时革命政权——人民抗日革命委员会的决定，才得以实施。

这期间，张国焘主张向西、反对向北的症结在于：害怕同党中央会合。好多同志劝他解除这个顾虑。在任弼时同志就要返回二方面军的前夕举行的西北局会议上，朱德同志、任弼时同志非常诚恳地劝张国焘不要怕和党中央见面。错了认错，作自我批评，回到马列主义路线上，不再搞派别活动就不会抹煞自己的功绩和光荣。我也就反对并克服不愿和党中央会合的思想问题作了发言。

任弼时同志出发时，刘伯承同志也到二方面军去。由于王树声同志生病，留下二方面军的肖克同志接替他的职务，任三十一军军长。大家分手时，依依惜别之情难用语言表达。尤其是和任弼时同志一起度过的两个月令我永远难忘。

## 甘 南 风 波

三十一军攻克通渭不久，一方面军西征军即占领了界石铺一线。通过侦察通信人员的频频接触，党中央油印的《红色中华》报、《西北斗争》刊物以及其它宣传品，很快转送到西北局。军委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同志的《全国主力红军大会合》一文给我印象很深，其中许多热情洋溢的句子事隔好多年我还记得。比如：



“在转移新阵地的北上抗日的长征中，三个方面军都创造了历史上空前的奇迹。长追、堵击不能消灭我们。大无畏的精神征服了一切险恶的环境；铁一般的意志冲破了无比的艰难。这种用意志和牺牲换来的伟大的会合，暗示给全国爱国的人民看：……红军这种不屈不挠的行动，是伟大的中华民族无尚的光荣！”

《红色中华》报上还登了许多募集各种物资慰劳二、四方面军的报道。这些都使部队感到极大的温暖和宽慰，提高了希望早日会师的觉悟和信心。

9月初，我见到了彭德怀司令员兼政委的《关于西征中统战工作的指示》。里边提到：政治机关应把统一战线工作看作是我们的战斗任务之一，“应与其他政治工作提到一样的高度”。他还指出，组织“停战抗日促进会”，是团结各界群众推动统战实际活动的良好方式。后来在西北局会上，黄火青同志就提出在我军与敌接壤地区可以广泛组织这种“停战抗日促进会”，还可以出版对内的刊物《抗战》，对外的刊物《抗战之友》，广泛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方针，影响并团结各个阶层，包括国民党军队官兵在内的广大群众，推动抗日运动。

9月8日，党中央来电重申“逼蒋抗日”方针，指出过去抗日、反蒋并提是错误的，中央从2月起已改变这一口号。还说，中央与南京方面常有书文、人员往来，有达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因此不要提打倒任何国民



党军队的口号，而提联合抗日。同时还强调，对张学良部不可采取真正进攻态度。

9月9日，张国焘召集西北局委员开会，除任弼时同志、刘伯承同志随二方面军向天水方向行动，徐向前同志、周纯全同志在漳县的前敌指挥部外，大多数委员都参加了。

总司令朱德同志在会上主要讲了统一战线工作，强调要认认真真地把它放在首要位置上，各项工作要围绕这个中心。做统战的上层工作是很重要的，基层工作也不容忽视，组织群众抗日武装，部队可以派干部去。张国焘也说中央电报重要，但他主要还是强调建立甘南根据地问题，对中央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采取消极态度，并以建立甘南根据地拖延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在此之前，成立了甘肃省和甘陕川省两个工作委员会。前者以岷、洮、漳、陇西、渭源、通渭、武西为基本工作地区，向四周发展；后者随二方面军向成县、徽县、两当、康县发展。甘肃省工作委员会原由何长工同志负责，在这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省革命委员会主席，改由我任书记，又增加了几个人。常委7人，除我外还有曾传六、刘少文、华民、邵式平等同志。下设组织、宣传、白区、妇女、少数民族工作等工作部。委员有熊国炳、王维舟、余洪远、陈敬先、杨克明、黄超、王泉媛、邓永耀、邹功凯、吴德峰、吴富莲等。同时还组织了吴永康同志负责的北路和黄火青同志负责的西路工作委员会，分别以漳县、洮州为中心开展地方工作。张国焘说，甘南已有11县我军力量已经达到，有的全县，有

的 2/3、1/2、1/3，只要我们工作做到，根据地一定能扩大、巩固。最后，他一个个点名，限限时写好会议文件：税收条例，你，德峰同志写，明天中午 12 点交卷；秋收斗争指示，你，郭潜军，明天下午 6 点交卷。还点着我的名说：省委工作决议，你写，明天 12 点交卷，省委工作计划也由你来写，后天交卷，再给总政治部直属队讲讲话，介绍省委的工作方针，关于西北局加强省委的决定，明天 8 点油印下发。又说，北路工委 12 日上路……他对建立甘南根据地十分热心，自有他的用意。

这些决定、指示有的已经执行，有的正在执行，有的没有执行，蒋介石就解决了两广事件，调胡宗南部由河南开回兰州，想分化东北军，撤换张学良。情况发生了急骤的变化。如果一、二、四方面军不抢在胡宗南部占领兰西公路之前会师，就有被它分割的危险，三个方面军都会陷入不利境地，也会动摇张学良跟我们联合抗日的决心。

蒋介石的行径使我想起明代嘉靖年间诗人冯维讷的一首针砭时政的七绝：

露骨山前月色高，  
夜闻胡骑在临洮。  
将军未挂平羌印，  
独倚长虹看宝刀。

如今，欲抗日寇而不能的张学良将军，岂止“独倚长虹看宝刀”，还要遭蒋介石的暗算。宋代诗人苏轼有诗《获鬼章二十韵》，歌颂当时岷州宋将种谊奉命抵御外侮进行的

“熙河之役”，收复夏河、岷州大片疆土。抚今追昔，让人感慨系之！不过共产党人绝不会让蒋介石捆住手脚，天大的困难也要排除，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实现全民族抗战。

根据敌情的变化，中央9月13日来电，明确指示：“四方面军宜迅以主力占领以界石铺为中心之隆（德）、静（宁）、会（宁）、定（西）段公路及其附近地区，不让胡（宗南）敌占领该线，此是最重要一着。”电报中还说，已令一方面军的第一师南下静宁接应。很明显，中央的意图是先于胡宗南占领该区，保证三大主力红军会师。

西北局根据新情况，于三十里铺召开会议，9月16日、17日、18日连开3天。参加会议的有张国焘、朱德、陈昌浩、傅钟、曾传六、李卓然、何畏、肖克、刘少文等。张国焘主持会议。他不象前几天研究甘南根据地建设时那样兴致勃勃，滔滔不绝，情绪有了微妙的变化。讲话中，有同意中央来电部署的意思，但又大谈陕北地瘠民贫，人口稀少，难以供应大部队生活之需，仍显出不愿与一方面军会合。

胡宗南的动向使原来对“逼蒋抗日”有怀疑的同志信心更加不足。针对这种情况，朱总司令说，蒋介石是要置我们共产党于死地而后快，可天下的事情不能随他一厢情愿。国际上法西斯和反法西斯两个阵营的对立越来越尖锐，观望犹疑的越来越少。战争象加足了汽油的飞机随时可以发动起来，英、美不会看着中国被日本独吞，会促蒋介石

下决心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全国人民不愿当亡国奴，也要逼蒋介石抗日；就是蒋介石军队的内部，象张学良、杨虎城那样的主张抗日的将领也大有人在。现在蒋介石所以还搞他的“攘外必先安内”，是因还没有把他逼到非抗日不可的地步。这就靠我们的工作，宣传我们的主张，动员群众，争取友军。陕北比我们做得好，发表了《告全国人民书》。去年12月提出的口号，今年2月变了一次，现在又变了，越变策略性越强，团结面越广。他还说，去年开始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以来，我们做得不够，在思想上没有把它放在首要位置，想问题做事情只看眼前，以后应有一个转变。

朱总司令的讲话很开脑筋，情况确实如此。之后，张国焘口头上也讲统一战线，但实际行动却南辕北辙。干部教育，宣传工作，政权工作，以及对蒋介石军队的态度，还是沿用过去的一套，没有做相应的转变。我在会上提出，要加强学习党的新的方针政策，检查过去有哪些不合现在形势需要的，彻底改正过来。朱总司令又插话说，对，要检查过去，改变不合适的；统一战线与一切工作都密切相关，要把视线都集中到统一战线方面来。斗气报仇都不对，要教育干部战士，不能感情用事。军需也要解决，但要注意军民、军政团结，不能象法国大革命时那样，脱别人身上的裤子。

你一言我一语，讨论很热烈。关于部队的战略方针，大多数同志同意中央9月13日来电的部署，发动静、会战役。



谁知，在制定静、会战役具体方案时，张国焘与中央闹独立的故态又恶性发作。他反对北上，要西进，过黄河去青海、新疆，根本推翻了西北局刚刚作的决议。陈昌浩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公开跟张国焘唱了反调，主张北上。争论十分激烈。张国焘甚至说经静、会北上是“断送红军”。朱总司令耐心地劝张国焘维护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不要个人推翻集体决议。我也向张国焘表明，主张向北，并陈述了北进方针的好处。张国焘成了孤家寡人，情绪很坏；说总政委不干了，作战方案也不做了，带上警卫员离开总部，去驻漳县三岔的前敌指挥部。

朱总司令很为难，但也无可奈何，说：他不干我们干吧，中央部署不可耽误。他一方面领着参谋们做计划并下达部队，一方面组织指挥机关向北进发。

9月21日，在总部北进途中，收到张国焘从漳县前敌指挥部发给部队的电报，令进到通渭执行静、会战役任务的部队停止北上，转头西进永靖、循化，准备渡过黄河。

朱总司令见到电报大吃一惊。原来张国焘没有甩手不干，但这样干可不行，党的原则，中央的部署，抗日大业都不允许这样干。

我当时也愣住了，觉察到问题的严重。张国焘这样把一切置之脑后，将使全军再次陷入危难境地。

一向从容不迫的朱总司令，这时眉头紧蹙，面露焦急之色。他想了好一会儿，决定一面电报中央，一面令部队停止前进待命，又用电报通知已返回工作岗位的西北局委

员火速去漳县继续开会，还问我有什么想法。朱总司令的处境太难了，张国焘要团结，中央指示要执行，除此之外没有再好的办法。

当即拟好3份电文。一份发给漳县前敌指挥部徐向前总指挥和周纯全同志并转张国焘，告知西北局一些委员即日赶到漳县，继续讨论行动计划问题；一份发给在外地筹粮的曾日三同志，让他速去漳县开会；另一份是朱总司令发给党中央和二方面军首长的，指出张国焘对北上方针又发生动摇，并拟根本推翻静、会战役计划方案，西北局同志将集漳县继续讨论，结果再报。朱总司令在这份电报中说：“我是坚决遵守这一原案，如将此原案推翻，我不能负此责任。”

不想电稿送到电台，电台拒绝发出，说“张主席有指示，没他签名的电报一律不发。”几次派人做工作，答复还是：“不能发，不能违抗张主席的指示。”

又是一个严重情况。朱总司令被剥夺了发电报的权力，何以指挥部队？看来人们对张国焘那套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手段，心有余悸，不敢稍有违背。

朱总司令很着急，最后对我说：你是四方面军的，又是西北局的组织部长，你出面吧，给他们讲讲组织原则。

这是我义不容辞的。我说话方便，人又熟，正想自己去做工作，朱总司令这一说，我立刻就去电台。

电台的同志也感到问题严重，也许有分歧，可能还争论过。我进门时气氛仍较紧张，个个面无笑容，直盯着我。

为了缓和气氛，我先说了几句闲话，然后才转入正题：“有人要推翻岷州会议决议，总司令不赞成，要向中央报告，也要召集人继续讨论，这是关系红军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党的原则的大事。总司令有命令应该执行。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遵守党的纪律和原则，维护党的决议，下级服从上级。现在我代表西北局组织部问问大家，怎么办？”

沉默了一会儿，电台负责人王子纲同志首先站起来表态：

“给朱总司令发报！”

电台同志一致响应，我才松了口气。

发出3封电报，看看表已是22日凌晨了。朱总司令带我们连夜出发，骑马直奔漳县。

甘南的初秋，特别是后半夜已经很凉了，但一路心里焦急，策马飞驰，人人汗流浹背，衣服湿透。朱总司令并未因为电报发出而轻松，看得出他在为说服张国焘放弃错误主张而思索，许久才对我说，这次一定要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不能书记说了算，书记也要执行集体决议。我理解朱总司令的心情，十分清楚他肩上的重任，我表示竭尽全力配合他工作。

作为四方面军的一员，我对张国焘的种种破坏党的原则的行为，早有切肤之痛，对这次践踏西北局决议也深感不满，也为四方面军的前途忧心忡忡。刚刚从逆境中走出来，难道又要被他引向深渊吗？好在朱总司令在身旁，总算有依靠，心境稍稍踏实一些。



到了漳县城外的三岔，见到前敌指挥部的徐向前总指挥、周纯全等同志。接到通知的委员们也先后到达了。这时我才知道，张国焘到漳县之后大发陈昌浩一通牢骚，说四方面军就让陈昌浩干吧，我到陕北坐班房，根本不提会议的决议，似乎只是他和陈昌浩之间的个人意见分歧。

这次开会张国焘情绪又很好，气也消了，牢骚也没有了，也不提辞职的事，指着地图讲了很多。因为有人说他擅自改变会议决议，不合组织原则，他首先为自己辩解，说上次讨论不充分，有的委员没有参加，这次详细讨论也不能算错，定出好的方案，减少部队损失，是件好事，等等。更多的还是讲他那个西进方案的“优越”。他说，西进的地区人口稠密，部队供应容易解决。过黄河的困难也不大。青海、甘北的马步芳、马鸿逵总比胡宗南好对付，从那里也可以和一方面军会师。再说，北上静、会作战也要充分估计我们的能力。部队刚刚走出草地不久，到甘南又连续作战，没有休整，相当疲劳，人员弹药都不足，单说五军，炸弹10个有5个打不响。胡宗南呢，近年几乎没有多少战斗消耗，人员装备齐全，供应充足。两下一比，我们不得不作万一之想。

他的一番话，抛开他怕见中央不谈，仅从四方面军这个局部看，不能说是杞人忧天，一些同志同意他的看法也是有道理的。部队三过草地，在芦、天、宝地区，特别是在百丈遭受巨大损失，元气大伤，与强敌作战确实困难。但有一点他避而不谈，那就是这个计划是三个方面军协同行



动，互相配合，决不是四方面军孤军作战。

朱总司令作了长篇发言。他语气缓和，详细地、有分析地比较了北上和西进两个方案，轻轻带过张国焘擅自改变党委决议的错误，也没说张国焘的西进计划反对中央统一部署，只说原来方案比第二方案好处更多。朱总司令用心良苦，他在尽量缓和空气，消除对立情绪，以求争取他们执行原来方案。

他说，原来方案最大的好处是三大主力红军早日会师，统一领导，统一指挥，增强红军力量，使蒋介石阻止红军会师的企图破产。这个局面，会增加张学良等主张抗日的国民党军队将领的信心，和我们一起迫使蒋介石放弃内战，进行抗日。共产国际有这个要求，党中央也是这样部署的，目的是早日实现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从军事上讲也是可行的。仅从四方面军看困难确实不少，但三个方面军相互配合，协同作战，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如果先胡宗南占领静、会地区，那形势就更为有利，这个战机万万不可失之交臂。第二个方案，很明显三个主力红军会师不知何年何月，至少要推迟，这就会影响张学良下决心，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延误，一、二方面军的侧翼也要暴露，处境将更加艰难。所以我坚持第一方案，从抗日全局看，第一方案优点多。

陈昌浩比我们早到漳县一步，可能已经受到指责了，情绪不好，也表示不想当四方面军政委。他在会上只是表露个人感情，对方案本身谈得不多。

我除了表示同意朱总司令的分析，说明向北是对的，往西是不对的以外，还对一些人对岷州会议提出的质疑作了说明，也劝陈昌浩不要辞职。不管怎样，都需要同心努力做好工作。

这次会上，一些同志表示支持第二方案，而且部队已经行动，让张国焘收回成命是不可能的。

再僵持下去更会延误时间。朱总司令无可奈何地说，那就暂照第二方案执行，大家作好工作，减少损失。我建议向中央报告，如中央不同意，就坚决执行第一方案。

于是，在9月26日向中央发了一份电报，说明红四方面军已决定西渡黄河，并已按西渡计划行动。电报中说：“如兄等仍以北进万分必要，西渡计划万分不妥时，则请中央明令停止西渡”。

部队本来准备去打静、会战役，会合一方面军，情绪很高。现在掉头西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议论很多：“日本鬼子在东面、北面，往西走抗谁去？”“不是又让过草地吧，可不能来第四次！”疑虑不小，人心浮动，部队逃亡现象增多。

所幸中央9月27日又来了电报，当时总司令部已到洮州附近。电报中明确指出：“四方面军应立即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合”，“合则力厚，分则力薄。合则宁夏、甘西均可占领，完成国际所示任务；分则两处均难占领，有事实上不能达到任务之危险。”电报再次肯定了岷州会议作出的静、会战役计划，要求红四方面军的活动仍按9月18日的部署

进行。还指出：“中央明令已下，请电令通渭部队仍回占通渭，其余跟即北上。”

我想，这也许是纠正张国焘错误的机会，谁料他看了电报后仍坚持自己的意见。

好在天公不为他作美。带领先头部队的徐向前总指挥从前边回到洮州总部，说，据老乡们介绍，黄河对岸已经进入大雪封山季节，气候寒冷，道路难行，西渡黄河的计划难以实现。

张国焘不想与中央会合的思想是很固执的，西进已经山穷水尽了，他还坚持，说前面不通，可以绕道西进。

朱总司令劝他说，是回头的时候了，不能一错再错。

张国焘还想来一个漳县会议，争取多数支持。于是又有一个洮州会议，在城里一个天主教堂里召开的。

张国焘说，打到迪化（今乌鲁木齐），打通国际路线，得到装备再打回来，与一方面军会合也不迟。大雪封山，不可以从南边绕道。

陈昌浩立刻说，从地图上看那又要走一片草地，部队走怕了，再走草地开小差的增多，部队怎么带？

徐向前同志也语重心长地劝说：鄂豫皖出来的同志不想再折腾了。

肖克、李卓然、余洪远、王维舟几位同志会前和我交换过意见，感到中央已有明确命令，不能再犹豫含糊，于是在会上都以各自的方式表示了执行静、会战役计划的意愿。

张国焘在会上空前孤立，才被迫放弃西进主张，同意北上静、会地区。9月29日又下达进军静宁的命令。

这时部队的种种议论、疑虑全然消失，情绪又高涨起来，按照部署向北日夜兼程。记得在行军途中，四方面军政治部下发了一份教育材料，真切表达了当时部队心情：“为着会合红一方面军，我们眼睛都望穿了……听到中央和军委决定要四方面军北上会合一方面军的消息，我们高兴得不得了。不放松一分一秒的准备，准备克服一切困难，准备铲除任何企图阻拦我们的敌人……三只铁拳在一条战线上合起来作战，一定有把握打大胜仗……”

10月2日，红一方面军南下接应部队攻下会宁县城。8日，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经会宁的青江驿、界石铺与一方面军一军团第一师胜利会师。这时遇到老相识陈赓同志。在鄂豫皖时我们相处甚好，去年一别，历尽艰辛曲折，这次重逢不胜激动，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谈起。

10月9日，我随总部进入会宁城。10月10日，会宁城万众欢腾，彩旗飘扬，举行庆祝胜利会师大会。一方面军的同志把准备好的礼物——用羊毛捻毛线织成的毛衣、毛袜、毛手套；以及肉、菜之类的慰问品，送到四方面军的手里。

那天，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革军委联署发来贺电，其中有一段谈到会师的重大意义：“我们的这一在抗日前进阵地的会合，证明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侵略，是要受到我们全民族最坚强的抗日先锋队的打击了，证明



中国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与抗日联军是有了坚强的支柱了。证明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全国同胞，是有了团结御侮的核心了”。

没过几天，二方面军在任弼时、贺龙、刘伯承同志率领下，也经天水地区渡过渭河，经秦安、通渭进入会宁地区。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胜利地结束了世界瞩目的长征。中国革命历史进入一个新阶段——全中国人民抗日民族战争阶段。中国历史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几年来，风风雨雨，曲曲折折，经历了重重艰险，渡过了多少困惑苦闷的难眠长夜，终于盼到了与中央会合的这一天。思前想后，感慨万千。

## 回 忆 鲁 迅

楚 图 南

鲁迅日记和鲁迅的书信中都提到过和任国桢的联系。

任国桢早年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学俄文的。大革命时期就在北大从事党的工作。当时北方党组织的负责人是李大钊同志，他的公开身份是北大的教授。为了开辟党在东北的工作，1923年至1925年，李大钊先后派吴丽石及任国桢到东北筹备建党工作。我是1926年初到哈尔滨的，和他们取得联系后，就以中学教师的公开职业为掩护，担任宣传方面的工作。我先后在哈尔滨第六中学、第三中学、第一女子中学、长春第二师范和吉林毓文中学当过教师。当时党在东北的组织叫哈尔滨特区小组，由吴丽石担任书记。那时，特区小组是在中东路联共（布）党组织的掩护及暗中配合支持下开展活动的。懂俄语的吴丽石和任国桢和他们联系，吴、任没有公开的身份和固定的住址。1927年春，哈尔滨特区小组改为满州省委，在上海的中央派陈洪涛（陈为人）来传达过中央的指示和部署。省委成立的集会是在哈尔滨马家沟一个白俄工人家里以纪念俄国天主教的复活节（俄国人叫“巴斯节”）为名召集的。吴丽石担任省委书记，任国桢负责哈尔滨市的工作，杜继曾（即杜省吾）负

责组织工作，我仍担任宣传方面的工作。

当时，我除了以教师身份作为公开的职业掩护，在青年学生及学校工友中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外，我还注意国内文化界的斗争。鲁迅在北京时和任国桢有过交往，他们的关系是很好的，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有书信来往。任国桢翻译的《苏俄的文艺论战》也曾送给过鲁迅。由于任国桢没有公开身份和固定住址，因此鲁迅和任国桢的一些通信是由我经手转的，时间大约是1927年秋到1928年春。

鲁迅当时的思想，正如他在早二三年前的作品《彷徨》、《野草》中所表露出来的那样，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现实是不满的，对黑暗统治是反抗的，他在苦苦地探求出路。那时有些同志对鲁迅不够理解，对他有过一些不恰当的责怪。也有些别具用心的人使用一些革命词句吓唬鲁迅，这使鲁迅很不服气，也加剧了他的苦恼。1928年春天，鲁迅曾给任国桢写过一封信，信是寄到我处托我转交的。经我转的信件中，这是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封。信是用整张毛边纸写的，内容大致分三大段：

第一段，鲁迅说，现在在上海有些人对他进行围攻，满纸用一些不易懂的新革命名词吓唬人，他颇不以为然，也不服气。

第二段，鲁迅说到，由于他们的围攻，他想找一些马列主义关于文艺的论述看看，从理论上加深认识，也好应付对他进行围攻的人，比较有把握地进行战斗。

第三段，鲁迅提到任国桢是学俄文的，翻译过《苏俄

的文艺论战》一书，也知道任国桢现在从事实际的革命工作，因此希望任国桢介绍一些书给他看看，或者介绍一些书目，他可以设法找到。

这封信写得很诚挚、迫切，从信中我才对在上海文化界的争论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可惜的是，这封信由于当时的环境，没能保存下来。

接到鲁迅的这封信后，我就和任国桢商量，任国桢说，我们要想办法支持鲁迅。我问任国桢有什么办法？任国桢说，要找苏联同志帮忙。

当时，苏联的中东铁路局在哈尔滨附设有一个图书馆，收藏一些早期出版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及有关文艺方面的论述和作品。图书馆的馆长是苏联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受伤后锯掉一条腿的残废军人，名叫季托夫，同我们经常有联系。我们和他一起商量，拟了一个书目，中文、英文、俄文的都有。

这书目寄到了上海鲁迅那里。后来鲁迅在《奔流》月刊上以及水沫书店出版的一些书刊里介绍和翻译了一些马列主义的文艺著作及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对托尔斯泰、高尔基的评论和一些当时苏联的文艺作品，其中有些作品就是我们寄去的那个书目里曾推荐过的。

1928年秋，一部分在莫斯科参加党的六大的代表经西伯利亚，在绥芬河附近昼伏夜行，秘密过境，陆续到达哈尔滨，由组织安排住在一些同志的家里。安排住到我家的是王德三，他也是云南人。这样，我对外就可以说，家中



住的来客是“同乡”。

据王德三告诉我，他们从绥芬河秘密过境的经历异常艰苦，昼伏夜行，路上又逢大雨，衣服都湿透了，捆在贴身腰带上的文件也都湿透了。他们在哈尔滨停留期间，除了整理衣物，烘烤清理文件外，晚上还要到指定地点秘密碰头，商量工作。当时在哈尔滨和王德三碰头的有周恩来、罗章龙等。王德三要我向他和汇报国内情况，尤其是上海文化界的情形。我即将我所知道的情况作了汇报，并着重讲了鲁迅和任国桢通信中所反映出来的问题。据王德三告诉我，他曾经在和周恩来等同志碰头时提到过这些问题。周恩来同志的看法是，如果事情真是象鲁迅在来信里所讲的那样的话，围攻和责怪鲁迅是不对的，应该团结、争取鲁迅。又说，鲁迅在国内文化界及青年学生中有相当的影响。他对社会现实不满，又一时找不到正确的出路。要把他争取过来为革命斗争服务。并说，回到上海后，对鲁迅的工作是会有考虑和安排的。

至于周恩来同志和六大代表们到上海后的情况，我就不清楚了。但是可以看到鲁迅此后的一些变化：在文艺方面翻译了相当数量的马列主义文艺论述；撰写了许多斗争性很强的杂文、政论文章及诗歌；参加了自由大同盟、左翼作家联盟、民权保障同盟、反帝大同盟等组织。一些共产党人还以各种不同的身份和在不同的场合和他联系，与他交朋友。从这可以看出，正是由于周恩来同志正确意见的指引，党内外许多同志（如瞿秋白、沈雁冰等）的细致

工作和耐心帮助，促使鲁迅逐渐完成了从一个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文化战士的转变。

解放后，我曾对许广平同志谈过鲁迅和任国桢通信的一些情况。许广平说，她知道鲁迅和任国桢的联系，但一些细节，由于年代久远，她也不十分清楚了。

60多年过去了，曾在我家住过的王德三同志后来壮烈牺牲在国民党地方军阀的屠刀下，任国桢同志于1931年牺牲在山西，鲁迅也于1936年故去。每当我想到鲁迅，想到这些献身于革命的先烈，想到一生鞠躬尽瘁、感人至深的周总理，就压抑不住怀念和崇敬的心情。我以这篇短文记叙时代变革中一个小侧面的史实，希望年青的一代懂得过去革命斗争的艰难和复杂，以更大的毅力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并以此作为对先烈们的回忆和纪念。

# 叶剑英的读书生活

张廷栋

“武装头脑，指导实践”，这是叶剑英早年题写在一本书上的两句话，鲜明地展现了他的读书目的。他为了革命的需要，为了从事建军、作战、建设社会主义的需要，读了很多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以及其它方面的书。叶剑英晓古通今，学识渊博，他既是一位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军事家，也是一位杰出的学者。

我在叶剑英身边做秘书工作，直到他去世，历时17年，给我感触最深的就是他孜孜不倦的读书生活一直伴随着他的政治生涯和军事生涯。我最近到叶剑英藏书室里整理图书时，发现有许多本书是他早年反复阅读过的。我一本一本细致地翻阅，发现他在这些书里留下了许许多多的各种各样的非常丰富的批注。从这些书里可以看出他求知若渴、刻苦治学的精神。他的这种酷爱读书的精神，永远是我们后代学习的光辉榜样。

## 勤奋学习 勇于攻关

“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

关。”叶剑英的这首《攻关》诗，是他从几十年学习、战斗实践中得出的宝贵经验。他从幼年起就勤奋学习，酷爱读书。他14岁那年，从广东省梅县丙市三堡公立高等小学校毕业，获得全校最优等毕业生文凭。

随着年龄的增长，叶剑英读书的欲望愈来愈强烈。为了增长知识，寻求革命的真理，1917年夏，他从南洋回国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在校认真钻研中外军事理论，特别是认真钻研炮科知识和技术，毕业时获得最优等毕业证书。1920年8月，他追随孙中山革命，在东征、北伐战争生活中，认真研究孙中山的理论和著作。1927年12月广州起义失败后，他到香港与聂荣臻同志一起研读太平天国史，总结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的经验教训。1928年底，他到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除刻苦地攻读俄文，很快地掌握了语言工具外，还进修了辩证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和军事知识等课程。1930年下半年，从莫斯科回国途经上海时，在白色恐怖极端严重的情况下，他用自己节省下来的一点路费，购买了一批有关政治、军事、历史等方面的书籍，带到了中央苏区，孜孜不倦地学习。

全国解放以后，他仍然是一位读书不知疲倦的人。读起书来，废寝忘食是常有的事。我在他身边工作多年，看到他读书的高效率和坚强的毅力，深受教育。他不管书本有多厚，文字有多长，都是从头至尾一读到底，连译序、目次、著者的话都读。他读得快，记得牢，领会得深。不论读哪本书，或者读哪篇文章，都能迅速而准确地抓住要点，



抓住问题的实质。他的才能和智慧是他一生勤奋学习、博览群书的丰硕成果。他还经常要求秘书们和身边工作人员要养成看书学习的习惯，并督促大家办好英语学习班，学好英语。他要求别人做的，自己首先做到。他每天坚持自学英语约1个小时，经过常年不断努力，他能看懂英文版的一些文章和书籍。

叶剑英不论是在战火纷飞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政务繁忙的和平时期，不论在前方，还是在后方，不论在中央、军委领导机关，还是在创办各种学校中，总是坚持学习，从不倦怠。他从青春少年到白发晚年，真是“活到老，学到老”。1980年，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讨论成立中央书记处的问题时，他在发言中强调说：“必须善于学习，勤奋学习。书记处担负的任务是很繁忙的，我们的经验不足，知识也不多，很多新的课题需要我们去学习，去研究。我们要认真读书，学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会现代化的经济管理，掌握必要的专业知识，即使我们的工作有了一些成绩，也要谦虚谨慎，力戒骄傲。”叶剑英一生正是这样做的，他这样告诫别人，自己也这样身体力行。

### 注重藏书 爱不释手

1963年11月27日，叶剑英在西山二号楼写了这样一首诗：“翠柏围深院，红枫傍小楼。书丛藏醉叶，留下一年

秋。”这首诗的前两句，是对二楼环境的生动描绘，但不过是一个引子，作者的真正写意是在后两句。“书丛”两个字，是指二楼的许多藏书。二楼是名符其实的“藏书楼”，这里有上万册藏书，种类繁多。有马恩列斯著作、毛泽东著作，有社会科学（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等）、文学艺术（包括中国文学、中国古典文学、古典诗词、古典文选、中国近代、现代文学，还有外国文学名著等）、中国历史（包括古代、近代、现代历史著作等）、外国历史（包括世界史、世界各国史等）、中外地理（包括地图集等），有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包括数、理、化、天文、地球科学、机械工程、生物、气象等）、医药卫生、工业、交通、农业、林业、综合性图书（包括各种字典、辞典、手册等工具书），等等。叶剑英很重视藏书，在他看来，这些书是革命的本钱，没有它们，干革命、干社会主义就没有力量。

叶剑英的藏书是由少到多，逐步发展起来的。其来源，有一部分是从战争年代随身携带过来的，有相当一部分是自己从书店里购买来的，有的是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出版部门赠发来的，也有的是别人送来的。

叶剑英为了藏好这些有价值的书籍，在70年代后期，让秘书们帮助，利用业余时间，进行逐册登记、编号、贴标签、设图书目录、卡片和借书登记簿等，很快地建立起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藏书室。自从有了这个藏书室，叶剑英的读书条件得到了改善，需要看什么书，到藏书室很快

就可以找出来。他身边的一些工作人员要看书，也不用到外边借阅了，为他们的学习提供了很大方便。

叶剑英不仅注重藏书，也非常爱书，爱不释手。凡是读过的书，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丢。别人可以借阅，但不能随便乱拿、乱划、乱改。如果有人违背了就要受到批评。例如，有一次有人未经他本人同意，拿走了他正在阅读的《辩证法唯物论》，乱传乱改。他发现后很生气，在被改的篇页天头上，用红笔批了“谁人传阅，瞎改！”从此以后，这种现象再也没有发生过。工作人员想看书学习，就跟他去借。许多时候，他还主动地把自己刚刚看过的书借给工作人员阅读。他不仅自己读书，还时刻关心他人读书。叶剑英对自己的书如果不是这样爱惜，不是这样严格管理的话，如今是不可能给我们留下这一批宝贵财富的。

叶剑英长年累月想方设法搜集书籍，珍爱书籍，其目的还是为了读书，并不是为了藏书而藏书。他读书的范围十分广泛，涉足的知识领域也极宽。仅从我近来查到的，他早年读过的、留有批注的64种（72本）书中，就可以了解到他的读书范围是多么广泛。他除了阅读马恩列斯著作全集、毛泽东著作以外，还阅读其它很多著作。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马克思列宁主义论战争》、《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关于列宁的“哲学笔记”》、《论列斯创造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论农民社会主义改造》、《社会学大纲》、《向列宁学习工作方法》、《自然科学讲话》、《军事科学军事艺术》、《论资产阶



级军事科学》、《拿破仑论》、《外军资料》、《国际问题译丛》、《资本主义总危机》、《宇宙的构造》、《原子世界》，以及初高中数理化课本、英语俄语课本等等。从马列主义著作、毛泽东著作到西方资产阶级著作，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从古代的到现代的，从中国的到外国的，包括哲学、经济学、军事、政治、文化、天文、地理、历史等各方面的书籍，他全都阅读。还有各种辞书、地图、手册等工具书，他也离不开身。使用最多的是《辞海》、《中国地图》、《中国历史地图》、《世界地图》以及各种专门知识的辞典。其中有两本工具书足以说明其使用时间之长。一本是中华民国 23 年 6 月出版的《中国分省图》，在这本地图的第 2 页上，有叶剑英 1935 年 11 月 21 日题写的“纪念直罗镇之役”手迹。从这个手迹上记载的时间看，到 80 年代初为止，这本地图已经使用四五十年了。另一本是中华民国 8 年 12 月出版的《辩证唯物论辞典》，在这本辞典的首页上，有叶剑英 1946 年 5 月 24 日题写的“这不是考查的备用书，而是咱们必读的好书”的手迹。从这个手迹上记载的时间看，到 80 年代初，其使用时间也有三四十年了。

## 明确目的 讲究方法

叶剑英钻研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有一个明确的目的，那就是理论联系实际，“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他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不是为了单纯的学习，而



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如他很注意学习哲学，用以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学习经济学，用以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和规律，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学习政治学，用以研究中国革命的政策和策略，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学习军事学，用以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指导革命战争，等等。他在学习中，尽力做到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总之，他是有目的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

叶剑英读书的具体方法，是自己从实践中不断地总结出来的。这个读书方法很有特色，叫做读书“三遍法”，也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读书方法。他在阅读《主稿》（毛泽东1949年10月至1967年6月的一些重要讲话、指示、批语、书信和文电等等，汇集成3册，后有部分被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一册时，在这册的首页上提出了读书“三遍法”：“一读、二记、三用。”但没有提如何读、记、用。当阅读到《主稿》第二册时，觉得这个读书“三遍法”，还不够具体和完善。于是，又作了补充。在这册首页上写道：“一读，即浏览、圈点；二记，即笔记、脑记；三用，即主席用马列主义，我们用毛泽东思想。”当阅读到《主稿》第三册时，还觉得这个读书“三遍法”有的地方应该改进。于是，又把“用”字解释得更确切一些。在这册首页上写道：“‘三遍法’：一读，浏览、圈点；二记，笔记、脑记；三用，主席怎样用马列的，我们又怎样学主席的用”。这个读书“三遍法”，是他从40年代末开始，通过读书不断地总

结出来的。以后，他一直坚持用这个方法。从他读过的书上记载的时间来看，到80年代初他还是用这个方法读书。不只是读书，看文件、批文件也是用这个方法。

我对叶剑英的这个读书“三遍法”的初步理解是：

一读，浏览、圈点，就是按照书里的文章先后顺序一篇一篇、一句一句地眼看着、嘴说着、手写着，一边阅读一边圈点，看说写几乎同时进行，非常协调。

二记，笔记、脑记，就是对书里某些重要内容用毛笔（或其它笔）批注在本篇页的天头地脚、边白中缝、段末行间；对某些非常重要内容的批注用脑子记下来。他的记忆力是惊人的。他善于把记忆、理解、应用统一起来。

三用，主席怎样用马列的，我们又怎样学主席的用，就是要学习毛泽东是怎样用马列主义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的。

从叶剑英这个读书“三遍法”联想到1977年10月9日他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大会上的讲话中曾号召我们要坚持和发扬毛主席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他说：“理论密切联系实际，我认为有两层基本意思。一层是：一定要掌握理论。没有理论，一张白纸，凭什么去联系实际？另一层是：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如果理论不能指导实际，不受实际检验，那算什么理论！决不能把理论同空谈、吹牛甚至撒谎混为一谈。”他的“三遍法”，从“读”到“用”，就是说的这两层意思。至于怎样才能更好地“用”呢？他提倡“融会贯通，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有的放矢”。这就是说，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来

分析、解决我们遇到的实际问题。

叶剑英的读书“三遍法”，就是理论联系实际、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的具体化。这个方法是他多年读书实践的经验总结。采用这个方法读书，印象深，记得牢，用得上，可以收到更好的学习效果。

## 挤出时间 埋头读书

叶剑英有个座右铭，叫做“抓紧时间工作，挤出时间学习，偷点时间休息”。他读书的时间，白天主要靠挤工作间隙时间，除了这个时间以外，抓早、晚休息时间，在这个时间里读书占的比重较大。

早晨的时间，是指起床之前的早睡时间。他经常牺牲早睡时间，早早起来读书。如阅读《辩证法唯物论诸问题》一书时，连着抓了9个早睡的时间，一气读完了近33万字的书。在这本书里共有9次时间地点的记载。如其中的一次，在“巴甫洛夫的学说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映论”一文的最后一页边白上记载着：“4/5，四时，1954年（即指1954年5月4日早4时），汉口大楼”。叶剑英读完了这本书，在书的第2页空白上用钢笔题写了这样4句话：“他在工作着，同时在学习着；他在学习着，同时也在工作着。”这4句话，说明了一个人的工作和学习的辩证关系：工作中有学习，学习是为了工作。

晚上的时间，是指10点以后的夜眠时间。他抓这个时

间读书更是经常的事，也可以说形成了一种习惯。他读过的书上记载的时间大都是深夜 12 点以后。如在《马卡洛娃讲演集》一书的一页边白上记载的时间地点是：“阅过，18/10，1951 年，一时十五分（即指 1951 年 10 月 18 日 1 时 15 分），于北京北长街 81 号”。又如在《论农民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书的最后一页正面边白上记载的时间是：“阅完，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一夜，十二时四十五分。”还在这里题写了：“珠江江上月如钩，夜阑人静好读书”两句词。象他这样深夜读书的例子不胜枚举。

此外，叶剑英还利用外出视察工作的路上和住院休养的一些时间读书。如《掌握布尔什维克领导经济的方法》一书，就是他在视察工作的途中阅读的。记载在“按劳取酬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这篇文章的第 4 页背面天头上的时间地点是：“8/3，1950（指 1950 年 3 月 8 日），正午，离开岳阳北上”，记载在本书最后一页背面边白上的时间地点是：“8/3，1950，阅完，于岳阳、武汉间”。又如阅读《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基本问题（一）》一书时，记载在“斯大林对于马列主义哲学的伟大贡献”这篇文章的最后一页背面边白上的时间地点是：“27/6，1942，于烂泥湾休养所”。阅读《当前苏联军事学说与战略的关系》一书时，记载在本书最后一页边白上的时间地点是：“10/3，1956，在三〇一医院。”这说明他是利用旅途和住院休养时间抓紧读书的。

叶剑英之所以挤这些时间读书，有一个可贵的思想，就



是他认为时不我待，要主动抓紧时间。夜阑人静是他读书的好时光。虽然在这些时间里读书更辛苦、更劳累一些，但是为了革命的需要，再辛苦、再劳累他也不在乎。

## 读书批注 增强效果

马克思、列宁、毛泽东读书都有批注的习惯，这是个很好的读书方法。叶剑英向革命导师学习，在读书中也善于作批注。他的读书批注有三种形式：一种是符号批注，一种是时间批注，一种是文字批注。这三种形式，体现在近来查到的72本书里。在这些书里，每一本都有不同的符号和不同的文字批注。其中55本有三种不同形式的批注，17本只缺时间批注这种形式。

### 1、不同的符号批注

每一本书里，都有圈圈点点的读书符号，有很多地方圈点细密。例如，有红杠加蓝杠、红双杠、蓝双杠、红方框、蓝方框，有××、○○、〈 〉、（ ）等符号，还有逗号、分号和问号。这些符号往往反映出他在读书中的某种意图和倾向。如问号，直接显示了他对某个观点持怀疑和反对的态度。这对于理解他的思想是有帮助的。

### 2、不同的时间批注

在55本书中，时间批注有如下三种情况：第一种，有的书读了几篇或几章之后就有一次时间地点的记载；有的书阅读两遍，每遍都有时间地点的记载。例如：《关于列宁

的“哲学笔记”》一书，他在11年中读了两遍，共有9次时间地点的记载。第一遍是1957年在广州分5次阅读完的，因此书中有5次时间地点的记载；第二遍是1968年在北京西山分4次重读完的，因此书中又有4次时间地点的记载。第二种，有的书分两次读完，就有两次时间地点的记载。第三种，有的书一次读完，就在本书的最后一页记上时间地点。

### 3、不同的文字批注

在叶剑英读过的72本书里给我们留下了大量宝贵的文字批注。每一本书里，都有几十处的文字批注，一处批注的字数，最少的三五个字，最多的二三十个字，平均每一本书里的批注有200多字。这些批注，有的批在篇页的天头地脚，有的批在篇页的边白中缝，有的批在篇页的段末行间；有的是对某一句话的复述，有的是对某一段落的提要，有的是对某一内容的概括，有的是对某一观点的疑问，有的是对某一问题的联想，也有的是自己提出的见解。因为批注的内容较多，不能一一列举，只能举如下一些问题加以说明。

#### (1) 关于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法则问题

对立统一、量质互变、否定之否定是辩证法的三个基本法则。而对立统一的法则又是辩证法的核心。叶剑英在阅读《社会学大纲》一书时，抓住了这个核心，反复阅读，在字里行间划满了红杠杠、红圈圈、红点点，并以“力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社会”为例，来说明“运动是矛

盾，是矛盾的统一”。例如，力学的运动，是作用与反作用，运动与静止的对立物的统一。物理学的运动，是阳电气与阴电气、阳磁气与阴磁气的统一。化学的运动，是原子的化合与分解。生物学的领域，一切生命现象，都是生与死的统一。社会的领域，社会发展的内在根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社会的发展是阶级的对立的发展。

叶剑英为了说明“否定之否定的法则”是发展的各个过程所固有的法则，从“否定之否定的法则”这节中引用了麦粒、天竺、牡丹、兰花、蝴蝶等这样几个例子，分别说明这个法则。例如麦粒在适当的条件下发芽生长，变成了植物，这是从肯定到否定；植物经过一系列的环节，最后又产生麦粒；于是麦秆就枯萎，这是由否定到肯定。从麦粒开始又回到麦粒，仿佛是向旧东西的回复，但实际上新产生的麦粒不仅数量比原来的麦粒更多，而且如果经过人工培养的话，品种也会有所改进。又如，天竺、牡丹或兰花，如果我们用园艺家的技术，去培养种子及其所生长的植物，那么，因这一否定之否定的结果，我们不但得到更多的种子，而且得到能开最美观之花的更好的种子。这一过程的每次重复，每次新的否定之否定，都增加着这种完美的程度。再如，蝴蝶，它从卵发展出来，于是否定了卵，它经过各个阶段，终于达到了性的成熟、交尾，而重新自行否定，即在配偶、产生无数之卵等等过程完成之后，自行死亡。

## (2) 关于分析与综合的统一问题

叶剑英阅读《社会学大纲》第一篇第四章第四节时，对“分析与综合的统一”问题，提出了个人见解：“在综合指导下进行分析，又在分析基础上进行综合”。这个见解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分析与综合是互相依存的。综合必须以分析为基础。没有分析，就得不到反映对象的各个侧面的各种规定，当然无从进行综合。分析又总是以在它之前进行的某种综合的成果为指导的。而分析的唯一目的又是为了下一步的综合。没有综合也就无所谓分析。二是分析与综合在一定的条件下是互相转化的。分析到了一定的程度，思维的行程就倒转过来，转化为综合：综合得到了一定的成果，又要开始进一步的分析；认识的深化过程是伴随着分析和综合过程的交替进行的。叶剑英的这一见解，对分析与综合的辩证统一关系作了精辟的表述。

## (3) 关于客观真理问题

“社会科学阶级性，自然科学全民性”，这是叶剑英阅读《论辩证唯物论》一书时，对“辩证唯物论论客观的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一文几段内容的概括。它说明了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说明了客观真理是客观现实在人类感觉、观念和概念中的正确反映。每一种科学理论、法则，倘若它们正确地反映出客观的现实，经过了人类的经验与实践的检验，那它就是客观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客观真理，因为它正确地揭示出自然界与社会发展的法则，正确地指出改造



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的途径。

二是批判了现代资产阶级的唯心论哲学家（杜威等实用主义者，逻辑实证论者）否认客观真理的错误观点。

三是论证了在阶级社会的条件下，因为社会科学是同斗争着的阶级的政治理想相联系着的，所以，必然地、完全地带有阶级性质。同阶级的政治理想没有直接关系的自然科学的客观真理，则是带有全人类的性质，而且是几千年地存在着，由一个时代转到另一个时代，由一国人民转到另一国人民。例如，欧几里德的几何学原理、古典力学、电力学、化学，都是客观真理，被一切阶级所承认，而且被它们利用于实践之中。然而，这些成为客观真理的科学根本原理，也还被带有阶级性和党性的一定宇宙观与思想体系所遮盖。所以，每一门科学，其自身不仅包含着根本原理及确定不移的客观真理，而且还包含着它们的一定宇宙观的解释。

#### （4）关于马克思与工会问题

“战斗是幸福，唤起被压迫者反对压迫者，工会是团结的学校”，这是叶剑英阅读《马克思与工会》一书时从“绪论”中提出的要点。这个要点，不仅充分肯定了马克思关于工会的观点，他首先认为工会是组织中心，集合工人力量的中心，给予工人以基本的阶级教育的中心，更重要的是赞赏马克思的“战斗是幸福”的人生观。马克思在哲学、历史 and 经济学方面，是一个革命家，在政策和策略上，也是一个革命家。这位伟大的革命导师向来都是认为战斗就

是幸福。战斗是他的固有的素质。他的生命的真正目的，在于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资本主义社会带来的政府形式，致力于无产阶级的解放。他的生命的天职是唤起被压迫者反对压迫者。

叶剑英在读这本书的“序言”时批注道：“研究历史，不能为历史而研究历史。”这告诉我们要明确研究历史的目的，树立正确的历史观，要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研究历史，并用以指导现实斗争。

#### (5) 关于政党的问题

在《苏联怎样消灭剥削阶级和阶级差别》一书第一章第二节中，有这样一段内容：“旧的西欧型的各国社会民主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年代不义地背叛工人阶级，沿着为资产阶级服务的道路，越滚越低。在德国和奥国，社会民主党当权多年，实行着和反动派妥协的政策，替法西斯开了路。在英国、法国、比利时和其他的右派社会党人屡次领导政府的国家里面，他们实行着鼓励法西斯侵略的政策。结果是西欧大部分被法西斯所奴役。后来只是由于苏联的英勇斗争，才获得解放。”叶剑英把这段内容概括为一句话：“当权的历史经验”。它指出了政党和个人一样，是要在苦难中和斗争中经受考验的。旧的西欧型的各国社会民主党在这个考验中遭受到的命运，不单单是个别领袖的叛变，而是它们的阶级“合作”的全部理论与实际。这是他们背弃马克思主义的不调和的阶级的理论和政策不可避免的结果。叶剑英的这一句话，不仅总结了历史经验，还告诉我

们：任何时候，都不能与反动派搞阶级合作。否则，就一定会葬送革命，葬送国家；葬送政党。

#### (6) 关于消灭阶级的问题

“只政治的、经济的，没有提到思想的”，这是叶剑英在阅读《苏联怎样消灭剥削阶级和阶级差别》一书第一章第三节时，对“消灭阶级的前提”问题提出的疑问。原书中写道：“如列宁所指示，为了消灭阶级，仅仅政治上的大变革还不够。必须完成一个远为困难的任務：完成最深刻的经济上的大变革，这就是消灭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根据集体主义来改造小商品生产，这样地来确立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叶剑英认为，只讲政治、经济，而不讲思想和思想改造，要实现政治上、经济上的大变革，消灭阶级，是没有基础和保证的。

#### (7) 关于发展生产力的问题

斯大林在苏共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为了把生产力提高到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的水平，必须在经济方面，就是说，在按人口平均分配时落到每人份上的工业出产品数量上，赶上并超过各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他说：“只有当我们在经济上也超过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时，我们才可希望我国有完全充足的消费品，有丰富的食品，那时我们就有可能实行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第二阶段。”叶剑英阅读《苏联怎样消灭剥削阶级和阶级差别》一书第四章第一节时，对这个报告有这样一个疑问，他批注道：“没有提农业，也许把农产品



加工，也列入在工业品范畴内”。他的这个批注，指出了报告中没提农业方面赶上并超过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他联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感到农业是基础这一重要环节不能忽略。不加强农业建设，不提高生产力，要建设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这个批注早于1952年，是颇有见地的。

#### (8) 关于苏联实现减低工业品成本费的政策问题

“改善生产工作，扩大国内市场，提高实际工资，巩固城乡团结”，这是叶剑英阅读《掌握布尔什维克领导经济的方法》一书时，从“斯大林论工业生产中的几个问题”的第二部分提出的要点。斯大林为了使苏联的企业工作得更好，工业品生产得更好，在苏联共青团第一届代表大会上演讲时，提出“有计划的减低工业品成本费”。实行这一政策，便有可能使工业顺利发展，并引导农业前进，在国民经济一切部门中保证社会主义的胜利。叶剑英在1950年阅读此书时，对苏联的经济建设发生了极大兴趣，感到斯大林提出“有计划的减低工业品成本费”这一政策很重要，可作为我们的借鉴，因而提出前面4句话。今天看来，这4句话对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仍有现实指导意义。

#### (9) 关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第二次危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问题

“瓜分、重分、再重分”，这是叶剑英阅读《资本主义总危机》一书时，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资本主义各国发展不平衡的加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第二次危



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文里提出的要点。早在1936年3月1日，斯大林在与美国新闻界代表霍华德谈话时，描述了当时形成的两个主要的战争危险策源地。当霍华德问：“目前战争危险的主要原因，到底是什么？”斯大林答：“是资本主义。”霍华德又问：“究竟是资本主义的哪些现象呢？”斯大林这样回答：“是它的帝国主义掠夺现象。您可记得，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怎样发生的。现在又是这个老花样。有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认为它们在上次重分势力范围、领土、资源、市场等等时，是受了委曲的，而它们就想再重分一次，使得对自己有利。资本主义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就成为这样一种制度，它认为战争是解决国际矛盾的合法方法。”叶剑英用极简练语言提出的“瓜分、重分、再重分”要点，表述了帝国主义对世界各国进行掠夺的“三步曲”，深刻地指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根源，充分说明了“帝国主义就是战争”这一真理。

#### (10) 关于战斗力的问题

“工具与人结合为生产力，人与武器结合为战斗力”，这是叶剑英阅读《历史唯物论》一书时写的一个批注。他是从这样一个问题联想到的：“为着使社会能够生存，需要工具和能使用生产工具运动的人，这就是生产力”。这说明了生产力的组成，包括着劳动工具和人，人不仅是一个简单的肉体的人，而且是有一定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的人，能使用很复杂的劳动工具的有教养的人。战斗力的组成，包括着各种武器和人，而且人不仅是一个能使用单一武器的

人，而且是能使用多种武器和有熟练技术的人。

叶剑英一生读的书是很多的，他的读书生活是非常丰富的，有待于我们深入挖掘和进行全面总结。他所以对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建立了丰功伟绩，是同他勤奋学习，善于学习，善于运筹分不开的。上面说的几点，只不过反映了叶剑英读书生活的一个小小的侧面。然而，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从中学到了许多东西。让我们共同学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孜孜不倦、刻苦治学的精神，更多地读书，更好地读书，用学得的知识，为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大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 记 林 月 琴

黄 瑶

几年来，在撰写《罗荣桓传》的过程中，同罗帅的夫人林月琴同志多有接触。罗帅的战友、部下、亲属在接受我的采访，谈罗帅的同时，也常谈起如春风一样待人的林大姐。我常想，把这一位女红军战士丰富的经历和她在长期革命征途上百折不挠、一往无前的精神记下来，定会给人以启迪。因此，我在写罗帅传记的同时，草成此篇，是为记。

### (一)

林月琴，1914年1月出生于河南省商城县南溪街（今属安徽省金寨县）。其父林维尹，在南溪街上开杂货铺，因经常到汉口贩货，比较早地接触到科学和民主的新思想。1927年，在大革命的高潮中，他参加了共产党，他的家便成为当地革命活动的一个据点。

大革命期间，林月琴在明溪小学读书。这个学校的校长是共产党员詹谷堂。林月琴在这里接受了反帝反封建的启蒙教育。

1929年5月6日，中共商城县党组织发动了立夏节起义，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林月琴当了县苏维埃妇女儿童大队长，随后进入由陈绍禹的妹妹陈觉民举办的女子学校。这所学校不上文化课，但开设有关妇女运动的讲座，实际上是一种边讲边做的妇女运动讲习班。林月琴和同学们一道投身于热火朝天的革命活动，动员妇女放脚剪发，宣传破除迷信，反对封建礼教，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主等等。她们还演出了歌颂二七大罢工领导人林祥谦的话剧。在这一年，林月琴加入了共青团。

1931年秋，林月琴受党组织委托，带领十几位同志（其中妇女占80%）到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兵工厂工作。这一工厂的任务是缝制军衣。林月琴等戴上工厂领导发给的红袖标，便正式参加了红军。

1932年1月，林月琴列席了中共鄂豫皖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随后调任边区儿童局局长，提着石灰桶到处刷标语，宣传扩红。

1932年秋天，由于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积极推行王明的“左”倾路线，使许多干部战士受到打击和迫害。已经参加红军、在部队当司务长的林月琴的父亲林维尹因开过杂货铺、雇过一名短工而被错划为地主，又被打成“改组派”，林月琴受株连，被遣送回家。

不久，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红四方面军主力从鄂豫皖苏区突围西去。当地苏维埃决定让林月琴回家自谋生路。此时林月琴尽管受了委屈，但仍然对党抱有信心。她



坚信，事情迟早会弄清楚的。她决心跟着红军走，绝不脱离革命。于是，她同成千上万扶老携幼的群众一道，随着部队西去。部队越走离家乡越远，绝大部分跟随部队行动的老乡逐渐散去。最后，剩下十几位妇女聚拢到一处，其中有掉了队的红军战士，有被敌人冲散的地方苏维埃工作人员，还有来投奔红军的童养媳和地主家的丫头。情况各有不同，但大家的心情都一样，这就是要跟着红军走，一步也不离开党。于是，她们便紧紧地跟着一支部队。部队出发，她们也出发；部队宿营，她们也宿营。

这支部队的指战员称呼这十几个跟在他们后面走的妇女为“跑反队”。几天以后，一位干部便劝她们回去，说部队拖着这么个尾巴，不便于行动。林月琴等便说：“家乡已经被白军占了，让我们回到哪里去？部队就是我们的家。”“我们不碍你们的事，还可以帮助你们挑水、拾柴禾、做饭、洗衣裳。”虽然那支部队的指战员们大部分都对她们表示同情，但一些干部怕担责任，不敢擅自收留她们。她们便稍稍拖后，同部队保持100米左右的距离，仍然是部队走，她们也走；部队歇，她们也歇。

由于她们跟在部队后面，也同部队一样，常常遭到敌人的围、追、堵、截。有一次，她们正在河滩上休息，突然遭到敌机空袭，炸弹掀起的沙石像大雨一样倾落在她们身上。还有一次，与敌人一支骑兵遭遇，她们差一点被敌人截住。这支队伍中有一个童养媳出身的姐妹叫刘百兴，她脚负了伤，林月琴便扶着她走，帮她换洗绷带。尽管她们

行走很困难，但仍然紧紧跟着部队。有时部队早已宿营，她们才赶到，但决不掉队。她们跟着部队经湖北、河南来到陕西。部队指战员们都被她们坚决跟着红军走的顽强意志所感动。经部队领导研究，决定将跟着部队走的人组织成大队和分队，选出负责人，由部队统一指挥。于是林月琴又回到部队，并被选为一个分队的负责人。此后，部队打土豪、分粮食，她们也有一份；行军出发、宿营都有通信员通知，宿营地也给她们划分。有时部队还分配她们干一些洗绷带、缝补衣服、照顾伤员、帮厨等工作。

部队转移到大巴山脚下时，已是严冬。林月琴等仍然穿着从家乡带来的破烂的单衣。老乡们看到这些瘦弱的女子要跟部队一道翻越大巴山，既感到惊奇，又非常同情，便对她们说：“山顶上可冷了，终年下雪，连后生都难爬，你们几个弱女子咋个过得去？”有些好心的老太太也劝她们：“你们留下吧，在这里找个婆家过日子。你们年纪轻，会干各种活路，又识文断字，都是百里挑一的好女子，可以找一个好婆家。”

林月琴等不为所动，她和战友刘百兴等拄着棍子，互相搀扶着，翻过了风雪弥漫的大巴山。到山脚时，她们已快冻僵了，也掉了队。她们便生起一堆篝火，从地里挖来一些已经长芽的土豆，烤一烤拿来充饥。结果，她们都中了毒，好久才缓过劲来，于是又去追赶远去的部队。

## (二)

红四方面军转移到川陕边地区后，好比是蛟龙入了大海。部队迅速扩大，川陕革命根据地很快便初具规模。林月琴等从鄂豫皖出来的老战友都成了骨干。她和刘百兴都当了妇女工厂的干部。工厂的任务主要是缝制军衣，编织布带草鞋。

1933年中秋节前后，在红四方面军供给部长郑义斋主持下，妇女工厂改编为妇女工兵营，林月琴任营长，刘百兴任副营长，王泽南任营政委。全营除一名管理排长是男性外，所有人员，包括伙夫、马夫、号兵，全部由妇女担任。这个营的主要任务是缝制军衣，有时也要运粮食、扛弹药、抬伤兵。

妇女工兵营一成立，便赶上扩大红军。林月琴等以老战士为骨干，组成若干个宣传队，分散到各个村寨进行宣传。川北人民在军阀田颂尧、刘存厚等统治下，生活异常困苦，苞谷、红苕也填不满肚子。军阀除滥收捐税外，还强迫农民种鸦片。许多男人染上抽鸦片的恶习，劳动的重担都压在妇女身上。她们不少人从小便被卖为童养媳，受苦最深，对翻身解放也最迫切。红军一宣传，她们便纷纷涌入队伍。工兵营很快由100多人扩大到500多人。林月琴和王泽南、刘百兴一道带领着这几百名昔日的丫头和童养媳，一面工作，一面进行军事训练和部队生活制度的养

成，在不长的时间内很快就把这个营培养成了一支名副其实的红军队伍。

1935年1月，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途中，妇女工兵营的主要任务是搞运输。除了营里的物资和个人的行李外，还要背供给部的光洋和金子。

林月琴、王泽南等带领妇女工兵营随红四方面军主力渡过嘉陵江后，经阆中到剑阁，便来到了“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她们每人背着四五十斤东西，冒着敌机轰炸、扫射和围追堵截的危险，通过在悬崖上硬凿出来的栈道，来到川康边，与中央红军会师。然后，随左路军第一次过草地北上，又因张国焘违背中央北上的决定而第二次过草地南下。林月琴和妇女工兵营的许多同志都得了妇女病。有一次她发高烧，几天昏迷不醒。当时什么药也没有，伙房给搞一点豌豆秧，这就是最好的病号饭。她完全依靠旺盛的生命力才挺了过来。在翻越党岭山后，林月琴和大部分人都得了雪盲症，眼睛红肿，什么也看不见了。大家只好一手拄棍，一手扶着前面同志的背篓，排成一路纵队，在漫天风雪之中，艰难地前进。

1936年春天，在快到甘孜的一天夜里，张国焘的贴身交通队有少数人伙同几个伤员，竟闯进妇女工兵营住地耍流氓。林月琴得悉后立即下令：把他们轰出去！战士们奋起还击，一时间，伤员的拐棍、工兵营运送的物资，都成了“武器”。这些耍流氓的人被打跑，交通队有几支枪也被妇女工兵营收缴了。



张国焘知道此事后大发雷霆地说：“这还了得！”他不分青红皂白，便下令撤销了林月琴营长的职务。林被调到粮食局任妇女运输连连长。不久，经何长工介绍，转为中共党员。<sup>①</sup>林月琴的战友刘桂兰将此事告诉了康克清。林月琴于是同康克清相识。

当时，张国焘正在进行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活动。他另立了第二个“中央”，并在街上贴出了“打倒毛、周、张、博”的大标语。林月琴感到困惑不解，便去问康克清。康克清对她说：“我们党的中央已经北上了。一个人只能有一个头，一个党也只能有一个中央。搞两个中央，就不能步调一致，进行战斗。”康克清的话使林月琴豁然开朗。从此，她们建立了终身的深厚友谊。

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再度北上。林月琴、汪荣华等4人从粮食局调到由傅连璋领导的卫生所工作。这个卫生所随红军总部行动，负责红军领导干部和机关人员的医疗。林月琴等4人组成护理班，林月琴当班长。在长征途中，她们为许多红军伤病官兵作了大量的护理工作。

### (三)

红二、四方面军长征到达陕甘边区后，林月琴随红军

---

<sup>①</sup> 后来，根据有关政策，她入党时间以1929年入团时间计算。

总部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调到中央妇女部工作。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迁往延安后，她又被选调到中央党校学习。林月琴参加红军以后，经历了从鄂豫皖到川陕边区，从川陕边区到陕北历时将近3年的两次大的战略转移，一直没有机会学习。到陕北进党校后，她学习了马列主义的基础知识和党的历史，思想觉悟有了较大提高。

此时，红军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延安处于相对和平的环境。已届“而立”之年的红军干部，因为战争，大部未婚。而当时“抗大”和党校都已有了不少未婚女同志。她们有的是来自国统区的青年学生，有的是原红四方面军的女战士。她们都成为未婚男同志的追求目标。许多人先后办了自己的“终身大事”。

春节期间，林月琴的战友刘桂兰和原三军团保卫局长许建国结了婚。经许、刘介绍，4月间，林月琴结识了后方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她了解到罗荣桓原是一个大学生，“七·一五”汪精卫叛变革命后，他受中共湖北省委派遣，到通城搞农民暴动，带领农民自卫军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秋收起义，经过井冈山斗争、五次反“围剿”和长征的考验，对党忠诚，善于同群众打成一片，作风质朴无华，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

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林月琴和罗荣桓于1937年5月16日结婚。这一天正值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闭幕，又是星期天，罗荣桓、林月琴的战友纷纷前来祝贺。林月琴、罗荣桓用老战友宋裕和从西安捎来的半袋面粉，请伙房擀面条，

煮了一大锅，款待来宾，举行了非常简朴但气氛十分热烈的婚礼。

“七七事变”后第三天，中央军委调罗荣桓任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出发之前，毛泽东派警卫员叫林月琴到他的住处去。林月琴既感到突然，也感到有些紧张。她来到毛泽东住的窑洞，毛泽东起身招呼林月琴坐下，贺子珍送来一杯茶。毛泽东对林月琴说：“啊，你就是林月琴，都做过什么工作，打过仗吗？”林月琴回答后，毛泽东笑着说：“噢，你还当过营长！你们结婚拿什么招待客人啊？”林月琴说：“宋裕和从西安捎来半袋洋面，吃了一顿面条。”毛泽东风趣地说：“怎么，吃面条也不请我。”林月琴忍不住笑了，刚来时的紧张和拘束感一扫而空。接着毛泽东亲切地谈了罗荣桓的经历和为人。他说：“荣桓同志是个老实人，有很强的原则性，能顾全大局，一向对己严，对人宽，做政治工作就需要这样的干部。当然，老实人免不了受人欺负，这也没什么，历史会正确评定一个人的功过的。”

当林月琴起身告辞时，毛泽东说：“你们新婚不久就要离别了。我是不是有点太残酷了？”林月琴爽朗地说：“那是革命需要嘛！”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说：“好，在鄂豫皖你当过宣传员，到处刷标语，鼓动妇女送郎参军，现在你自己也送郎上前线罗！”

林月琴回来后，向罗荣桓谈了毛泽东接见的情景，罗荣桓听了很激动，但他不善于流露感情，只是把毛泽东的关怀和鼓励深深埋进心里。临分别那天，他才对林月琴说：

“我走了，你留在延安好好学习、工作。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要记住毛主席的话，永远做一个老实人，忠诚于党的事业。”随后便离开延安，到驻扎在甘肃省正宁县的一军团部就任。林月琴留在延安，转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1938年3月，林月琴生了第一个男孩。此时组织上决定分配她去西安工作，她毫不犹豫地将婴儿交给一户农民抚育，然后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机要室任秘书。当时中共中央许多负责干部经常住在办事处。林月琴负责给他们呈送文电，认真、细致、及时、准确地完成了上级交办的任务。4月，由于挺进山西的八路军部队已经展开，转入分散开辟抗日根据地，局面相对比较稳定。中央军委决定将林月琴和刘伯承夫人汪荣华调到前方，以便就近照顾罗荣桓、刘伯承的生活。林月琴来到设在晋西南孝义县的由一军团和陕北红军合编而成的第一一五师师部，拿出中组部开的介绍信要求给她分配工作。罗荣桓对她说：“原来有规定，家属留在后方。现在调你到前方是组织的照顾。你来了后还是到地方工作为好。”于是，在征得晋西南区党委书记林枫同意后，林月琴被调到区党委党员训练班任低级班主任。

1939年初，罗荣桓与代理师长陈光率部东进山东。林月琴随部队到达晋东南屯留一带。2月间，她生下第二个儿子（头一个孩子因营养不良，已在陕北老乡家夭殇）。林月琴分娩后，罗荣桓因部队正在挺进山东，给孩子取名东进，随即率部继续东进。林月琴留在驻扎在晋东南的一一五师



留守处。

6月，林月琴随一一五师留守处从晋东南到山东。不足4个月的罗东进由挑夫挑着，担子的一头是行李，另一头就是东进。同志们都知道林月琴已经失去一个孩子，于是对罗东进格外关心，女同志们常常轮流抱着他。有时，指战员们看到挑夫的担子空了，都要关切地打问：孩子哪里去了？

林月琴到达泰（山）西地区同罗荣桓会合时，日军正在对泰西地区进行“扫荡”，形势很紧张。部队需要频繁转移，带着一个婴儿十分不便，罗荣桓夫妇便将孩子寄养在老乡家中。

#### （四）

1939年秋，林月琴随一一五师师部过津浦路南下，转移到鲁南抱犊崮山区。林月琴被任命为政治部组织部干部科副科长，分管师直属队的干部工作。1940年春，林月琴又生一女。因为这一期间，正是部队南下的时候，罗荣桓便给孩子取名为南下。林月琴分娩后不足1个月便又上班了。她到任后逐个同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和卫生部的干部谈话，了解他们的情况。当时，有些刚刚参军的干部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一开始不愿意同她谈话，甚至躲开。林月琴便主动地、耐心地找他们，像拉家常一样问他们是哪里人，家里还有哪些人，何时参军，入伍后感到自己有些

什么进步，等等，使干部们感到十分亲切，便逐步由不愿意谈到主动反映情况。大家都把她看成大姐，对她十分尊重。

一一五师进驻鲁南之后，罗荣桓接待的人来自四面八方。既有中共山东分局和当地党组织的干部，也有山东纵队等兄弟部队的战友；既有在东北军中工作的秘密党员，也有东北军内的上层军官，还有地方实力派和当地开明士绅。在形势相对稳定的时候，他们经常来拜访罗荣桓。当时物质条件很差，林月琴则竭尽全力招待客人，给他们炒花生，送热茶，留他们吃便饭，使客人感到十分温暖。林月琴成为罗荣桓联系群众和团结各方面人士的得力助手。

1942年底，由于长期劳累，罗荣桓肾脏发生病变，尿血不止，身体日益消瘦。由于在敌后没有起码的检验手段，无法确诊是什么病。1943年初，罗荣桓向中央提出了休息半年的要求。但此时中央正在贯彻《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实现各根据地的一元化领导，已决定由罗荣桓出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和一一五师政委兼代师长（后任山东分局书记）。中共中央未同意罗荣桓休息的请求。罗荣桓便带病将山东抗日根据地一元化领导的重担挑了起来。林月琴此时的重要任务则是同医护人员密切配合，在艰苦的敌后环境下，尽可能安排好罗荣桓的饮食起居，服药护理，尽力使疾病稳定下来，以保证他能继续担负繁重的工作。这一期间，由于频繁的反“扫荡”，师部转移时，罗荣桓经常在担架上指挥。林月琴

总是不离担架左右。每天，林月琴都要用玻璃瓶为罗荣桓取尿样，让医生从血尿颜色来判断病情的轻重。罗荣桓是湖南人，嗜食辣椒，林月琴总是按照医生的意见进行劝阻，同时想方设法为他做一点易于消化的、有营养的饭菜。1943年春，林月琴陪同罗荣桓到位于江苏省盱眙县东南黄花塘的新四军军部，请奥地利籍泌尿科专家罗生特治病。从一一五师驻地到新四军军部约有500余公里，除过洪泽湖用船外，都是步行。罗荣桓由于病重，被用担架抬着走。当时正值阴雨连绵的春季，担架有时在水田田埂上通过，路滑难行。林月琴守护在担架旁，前面的担架员失脚她便扶前面，后面的担架员脚步不稳她便扶后面，保证不使罗荣桓有丝毫闪失。她忙前忙后，有时甚至比抬担架的还累。由于缺乏必要的医疗设备，罗生特未能作出确切的诊断，但判断病灶可能在右肾，也不排除前列腺有病变。如是后者，结扎输精管会有好处。当时罗荣桓夫妇均不想要孩子，罗生特便给罗荣桓做了结扎手术。1944年，罗荣桓病情仍不见好转。已由陈毅派往山东为罗荣桓治病的罗生特建议他秘密赴上海进行确诊。中央同意后，林月琴护送他先到苏北盐阜区新四军三师师部。因罗荣桓腹部有枪伤伤痕，毛泽东估计到此行颇冒险，来电报建议不要去上海。林月琴又护送罗荣桓返回山东。

林月琴在照料罗荣桓的生活中，做了大量的看来十分平凡实际上十分费力的“琐事”。这些“琐事”保证了罗荣桓的病情不致过快恶化，保证了他在病中能有必要的精力

从事巩固和发展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繁忙工作。

在从事这些“琐事”的过程中，林月琴不仅要“任劳”，而且要“任怨”。抗战胜利后，罗荣桓率领山东八路军向敌占区展开了大规模的反攻。到8月20日，山东津浦路东绝大部分县城已为八路军所收复，唯有临沂经8月20日和22日两次攻击，虽付出很大伤亡，仍未打开。临沂是滨海、鲁南和鲁中三块根据地的交点，此处不打下，三个根据地向敌人交通线、青岛等大城市进攻都有后顾之忧。罗荣桓十分焦急。8月22日他听到临沂前线失利的消息后，便喊警卫员备马，要亲自到临沂前线去指挥。此时罗荣桓连走路都困难，更不能骑马。但是，林月琴看到他如此焦急，知道阻拦不住，一时无法可想，便悄悄让马夫将马牵走。警卫员去找马时，见到这一情景，便回来对罗荣桓说：“报告首长，找不到马夫，”

“找不到马夫？那你把牲口牵来。”罗荣桓有点生气了。

警卫员硬着头皮吞吞吐吐地说：“牲口也不知道哪里去了。”

罗荣桓动怒了：“乱弹琴！你们这是搞什么名堂，快去把牲口找来。”

警卫员迟迟疑疑，就是不动身。罗荣桓正要向警卫员发火，林月琴忙走进来说：“这不干警卫员的事，是我叫马夫把马牵走的。”

罗荣桓听后，压了压火，等警卫员走出去后，便严厉地责问林月琴：“你为什么这样自作主张？”



林月琴平静地回答：“罗生特大夫说你近来病情很重，要绝对卧床休息。”

罗荣桓着急地说：“休息，休息，临沂打不开，叫我怎么能安心休息？”

林月琴也急了起来：“你的病这么重，还要骑马上前线，你不要命了！”

罗荣桓尽量耐心地说：“临沂打不开，就要增加鲁中、鲁南、滨海反攻的后顾之忧，这可不是小事！”说着说着他又冲动起来：“这么重要的时候，你不让我上前线去，你是不是共产党员？”

“我不是共产党员，难道是国民党？”林月琴自从结婚后，从来没见过丈夫发过脾气，更没有听过他这样重的话，又委曲，又难过，忍不住顶了一句，眼里闪动着泪花，说着便往外走。

正在院里玩耍的东进和南下，头一回听爸爸妈妈吵架，趴在窗户上偷看。他们见妈妈走出来，脸上还有泪痕，都吓哭了。林月琴也顾不上他们了，径直走向副政委黎玉的住处，把罗荣桓想骑马上临沂前线的事对黎玉说了。经黎玉劝说，罗荣桓才打消了骑马去前线的念头。

林月琴在精心照料罗荣桓的同时，还担任着山东军区司令部机要科的协理员。她努力做好译电员和电台工作人员的思想工作，保证罗荣桓同上下之间和友邻部队之间电报往返畅通无阻、安全保密。

## (五)

1945年10月，罗荣桓率山东6万部队（另有基干团人员3万）开赴东北。林月琴护送罗荣桓从山东龙口上船，在辽东半岛貔子窝登陆，然后乘火车、汽车到沈阳，与先期到达东北的彭真、林彪会合。罗荣桓在紧张工作之余，到设在沈阳的原日军医院检查。医院诊断是肾癌，需动手术切除已有病变的右肾。中央得悉后，为保证绝对安全，建议他到设在平壤的苏军总医院作进一步检查。我军撤出沈阳后，罗荣桓随总部转移到本溪。随后林月琴护送他到平壤苏军医院检查。由于这是一个以治疗外伤为主的医院，不具备作肾切除手术的条件，院方建议罗荣桓到莫斯科做手术。于是，林月琴又护送罗荣桓回国，转移到大连，一面休养，一面等待出国签证。1946年初，东北战况日趋激烈。3月中旬，国民党进入沈阳后又沿中长路向东、南、北三个方向展开扇形攻势，攻城掠地。4月18日，四平保卫战打响。但此时党内尚未就当时的对策取得一致意见。罗荣桓心系战局，停止休养，由林月琴陪同绕道安东、梅河口返回设在长春的总部，随后又后撤到哈尔滨。6、7月间，罗荣桓参与了东北局总结前一段斗争的经验教训、制定今后坚持东北斗争方针的全部过程。7月7日，东北局通过了《东北的形势和任务》。8月间，林月琴陪同罗荣桓乘火车到莫斯科。在克里姆林宫医院，罗荣桓做了右肾切除手术。随

后林月琴协助医护人员对罗荣桓进行护理。罗荣桓术后因刀口缝合不好大出血而再次做了刀口缝合术，以后刀口也长时未愈合，需每天换药，但由于林月琴的精心照料，他还是较快地恢复了健康。

在莫斯科，许多在苏联读书的烈士子女和干部子女经常来看望罗荣桓夫妇。他们当中有张太雷的儿子张大保，蔡和森的儿子蔡博和女儿蔡转转，毛泽东的次子毛岸青，刘少奇的儿子刘允彬和女儿刘爱琴，朱德的女儿朱敏，李富春的女儿李特特，林伯渠的女儿林莉莉姐妹等。罗荣桓夫妇经常向他们介绍国内情况，鼓励他们努力学习，将来回国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力量。当时，刚刚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一般群众生活还相当困难，配给这些孩子的食物常常不够吃。罗荣桓因享受苏共中央委员的待遇，又是病人，每天供应有白面包、鸡蛋、方糖、牛奶、黄油。于是，他把这些东西节省下来，吩咐林月琴保管好，留给孩子们“打牙祭”。不久，林月琴便很熟悉这些孩子了。她知道毛岸青爱读书，但不大会料理自己的生活，常把饭票搞丢了。一丢饭票，他就来到纽克斯国际旅馆罗荣桓住处，来后也不说话，只是坐在那里看书。林月琴一看便知道他又丢了饭票，连忙拿东西给他吃。

当时，贺子珍也在苏联。罗荣桓动完手术后便打听她的下落。苏方联络人员查询后说，贺得了精神病，正在住院，她的女儿在一所保育院里。罗荣桓和当时也在苏联治病的王稼祥商量后正式向苏方提出：将贺接出院。经几次



交涉，苏方将贺子珍送到纽克斯国际旅馆。这时，罗荣桓夫妇才知道，贺子珍赴苏后分娩的男孩因得肺炎而夭殇以后，她精神受了刺激，加上语言不通，被误诊为精神病。贺子珍出院时穿的仍是医院病人的衣服。林月琴便把自己的衣服拿出来给她换上。在罗荣桓、王稼祥夫妇的悉心照料下，贺子珍很快恢复了健康。

1947年春，罗荣桓开刀的伤口逐渐愈合。此时，中国国内的解放战争正在紧张进行。国民党虽然占领了延安，但全国各个战场都在为转入反攻而激烈战斗。在这种时刻，罗荣桓婉言谢绝了苏方请他到南俄疗养的提议，决定立即回国。医院交给林月琴一份出院通知书，上面写着罗荣桓肾功能仍有问题，还有高血压、心脏病，建议罗荣桓回国后休养3年，每天工作时间不超过3小时。不过，不管怎么说，罗荣桓的健康状况比开刀前确是大为改善了。林月琴带着欣慰之中还夹杂着几分忧虑的心情收拾行装，准备回国。

罗荣桓夫妇出国前，组织上给他们带了一些金子，以备急需。在苏联，生活均由苏方供给，这些金子一直未动用。回国前，罗荣桓和林月琴考虑到当时在苏联读书的孩子们生活比较清苦，在同王稼祥、蔡畅等同志商量后，将这些孩子请到家里，拿出一小部分金子交给他们作为生活补助费用。为了保管和使用好这笔钱，孩子们选出了朱敏、蔡转转、李特特作为负责人，罗荣桓夫妇谆谆嘱咐他们节省着用，要保持父辈艰苦奋斗的作风。



## (六)

1947年6月，林月琴随罗荣桓回国。罗荣桓一回国就投入紧张、繁忙的工作。当时，东北野战军总部分前方、后方两摊。林彪带着前总住在哈尔滨以南的双城。东北局机关以及野战军政治部、后勤部都设在哈尔滨。林彪专务作战指挥，对部队的政治工作、训练、动员、装备、后勤保障、军工建设很少过问。罗荣桓便来往于哈尔滨、双城之间，将这些林彪不怎么过问而部队又不能须臾离开的工作担当起来。苏联医生提出的休养3年以及每天工作时间不超过3小时的医嘱只好束之高阁。

罗荣桓健康状况好转，全力投入工作，常不在家。林月琴照顾他的任务减轻了，她感到清闲，便向组织提出，要求分配工作。野政组织部打算分配她到组织部工作。罗荣桓知道后对她说：“你要求参加工作是对的，但你究竟做什么工作合适，让我再考虑考虑。”过了几天，罗荣桓对她说：“现在各机关、各部队留守处都有许多娃娃，没有地方上学。你可以去办一所子弟学校，这既能解决前方干部的后顾之忧，又关系到培养革命后代，是很重要的事情。你就当这个子弟学校校长吧。”

林月琴平时常听到到她家串门的女同志谈孩子上学的问题，感到这件工作确实很重要，但又感到自己没有搞过教育，怕搞不好。罗荣桓又对她说：“不会干可以学。办学

校要有一些好教员。你可以找一些热心肠的有文化的女同志商量商量，请她们跟你一块干。”

于是，林月琴便找曾读过师范的政治部宣传部部长肖向荣的夫人余慎和副司令员吕正操的夫人刘莎一块商量办学的事，决定办一所包括保育院和学校在内的子弟学校，孩子满3岁就收，衣、食、住和教育均由学校负责，确定了要使孩子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随后便是找校舍，购置教具营具，选调医护人员、保育人员和炊事员、培训保育员。林月琴要求学校全体工作人员要做到像孩子们的父母一样关心、教育孩子。

在她和余慎、刘莎同志的积极筹办下，学校很快开学，招生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学校将孩子们的教育、生活都管了起来，使他们的身心都得到健康成长。父母在前方的解除了后顾之忧，在后方的也减轻了家务劳动负担。

但是，这件事却引起了叶群的不快。林月琴过去并不认识叶群，当林月琴离开延安时，叶群尚未同林彪结婚。到东北后，林月琴才同她认识。林月琴从苏联回来后，才同她熟悉起来。交往时间长了，林月琴感到叶群在热情中透着虚伪。她向罗荣桓说起自己的印象，罗荣桓对她说：“叶群的经历跟你不同，她在大城市待过，接触过三教九流，社会经验较多。你同她既要搞好团结，又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因此，虽然叶群有一定文化程度，在办学时，林月琴并没有去请她。

办学需要校舍，管理部门建议用林彪、叶群即将迁出

的房子当校舍。那房子很大，再早是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的官邸。罗荣桓夫妇回哈尔滨后，管理部门也给他们分配了一套相当于林彪住宅的房子：三层楼，有舞厅、会客厅。罗荣桓感到房子太大，他们一家4口人住太浪费。当时，政治部主任谭政夫妇没有子女，住一栋小楼。罗荣桓夫妇便建议同谭家合住那栋小楼。罗荣桓夫妇有孩子，较吵闹，便要求住在楼下，谭政夫妇住在楼上。谭政夫人王常德是四川人，原来也是四方面军的，同林月琴在延安党校是同学，那时学员宿舍是大通铺，两人是铺挨铺。王常德年龄小，嗓门大，特别爱笑，林月琴便学着四川方言，叫她“幺妹子”，两人感情很好。王常德一听说林月琴要搬来和他们同住，立即拍手欢迎，并嚷嚷着要做几个四川菜招待罗荣桓一家。

叶群知道林月琴搬家后便也提出要搬家，准备搬往马家沟。于是，管理部门便提出用叶群腾出的房屋当学校校舍。余慎等人去看了房子。此时，叶群尚未搬家。她听说要用此房办子弟学校时，陡然升起了一股无名火，便跑到双城向林彪告状，说罗政委带头搬家同谭政合住，是“将”她的“军”，逼得她也不得不搬到小房子去住，而原先的大房子却被林月琴要去办学校了，云云。

辽沈战役结束后，林月琴出席了在沈阳召开的东北妇女代表大会。会议推选出席全国妇代会代表时，在候选人名单中未列入叶群。叶群便在小组会上说，由于她是林彪的夫人，应当列为候选人。她的发言引起了与她愿望相反



的效果。好几个代表都批评她这种观念不对，不赞成她当候选人。有一位代表直言不讳地对叶群说：“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斯大林的夫人当了什么代表。你这样一说，本来可以选你的，也不好再选了。”叶群没有反省自己的表现，却无端怀疑是林月琴煽动的，而林月琴同她并不在一组，根本不了解她这一组的情况。叶群又到蔡畅同志处告状。蔡畅将林月琴找去问是怎么回事，林月琴莫名其妙。蔡畅便转了一个弯，建议让叶群当上了特邀代表，并向叶群解释，此事与林月琴无关。但是，叶群执拗地认为，后台是林月琴。这两件事便成为叶群嫉恨林月琴的发端。

## (七)

平津战役结束后，林月琴、余慎等将四野干部子弟学校迁到天津。这时，罗荣桓由于在辽沈、平津战役中过分劳累，他唯一的一个肾负担过重，也发生病变，并由此而引起高血压和心脏病。在一次听汇报时晕了过去。于是便住在天津休养。天津名医朱宪彝对他进行仔细检查后发出了“预后不良”的警报，因此罗荣桓和林月琴均未再南下。子弟学校由余慎等率领迁到武汉。林月琴仍继续关心着这所学校。1949年夏天，学校师生集体到北戴河度假，就是由林月琴亲自联系安排的。

1949年进入北平后，林月琴检查身体时发现又怀了孕。她开始是高兴，因为她的两个孩子都已上学了，再要



一个孩子正是时候。但她想想又不可能，因为罗荣桓作过结扎手术。她把这事告诉罗荣桓，罗荣桓很高兴。但林月琴很纳闷。为了弄清是怎么回事，林月琴又让罗荣桓去作检查，发现结扎的输精管又通了。在医学上这种情况尽管很少但完全是可能出现的，有过这样的先例。于是，1949年10月，林月琴又生育了第2个女儿，因怀这个女儿时正是平津战役取得胜利的时候，罗荣桓便给她取名北捷。建国以后林月琴又生育了最小的女儿——娜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罗荣桓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总干部管理部部长和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定居于北京。1951年初，林月琴被任命为解放军“十一”学校校长。林月琴亲自勘察校址，确定学校建设图纸，亲自看档案，选调和培训教职员，用很大的精力来抓学校的筹办工作。1952年10月，“十一”学校开学。林月琴在照顾病情越来越重的罗荣桓的生活的同时，仍然经常到校，听取汇报，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在林月琴和当时在校工作的教职员工们的努力下，这所学校很快成为当时北京教学质量较高的一所学校。

建国以后，罗荣桓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林月琴在办学的同时，要用极大的精力照顾罗荣桓的生活。她既是夫人，是孩子们的母亲，又是护士、秘书、管理员。

罗荣桓一贯以善于联系群众而著称。他的家中，客人不断。不仅有高级干部，还有一般干部、工人和农民。他家门前，不仅有卧车，还经常停放了不少自行车。有人写

诗赞道：

革命友谊重山河，首长关怀暖心窝。

帅府门前客不断，单车倒比卧车多。

客人上门，接待主要由林月琴负责，准备茶水和糖果点心。如果快到开饭时间，一定留客人吃饭。客人如果全家来，罗荣桓便同男客人谈工作，林月琴则将女宾和孩子领向别处热情招待。客人有时这一批尚未走，那一批又到了。林月琴怕怠慢了客人，便掩饰住自己对罗荣桓日益恶化的健康状况的忧虑，掩饰自己的不胜劳累，强打精神去应酬。有时实在支撑不了，便悄悄退回卧室，抽空在沙发上靠个三五分钟，然后起来，抿一抿鬓发，理一理衣襟，又去招待客人。

客人来看望罗荣桓，除了对老战友、老首长表示关心外，有的人是为了向他反映情况，有的是因在工作中碰到难题而向他请示，也有一些人是遇到一些实际问题想请老首长帮助解决，其中有人事关系问题、工作调动问题、纠正错案问题乃至两口子吵架问题，等等。其中，有许多事情都是按照罗荣桓的交代，由林月琴或其他秘书去催办的。林月琴是一个热心人，只要是应当做的事，她一定千方百计去办。由于她的奔走，一些干部的合理要求得到满足，一些错案得以避免或纠正，一些濒临破灭的家庭得以破镜重圆。多年来，林月琴是罗荣桓联系群众不可或缺的助手。许多干部对她的帮助都非常感激。但是她办过了就办过了，从来不记这些事。事后当别人向她再提起这些事时，她说

的常常是：“有这回事吗？啊呀，我都忘记了。”

湖南解放以后，罗荣桓同他老家久不通音讯的亲友也联系上了。

罗荣桓是湖南省衡山县鱼形镇南湾村人。他的父亲罗国理曾当过童蒙塾师，后来弃教经商，开了一个兼卖中药的杂货铺，逐渐有了积蓄，添置了一些田产，当了罗氏的族长。但在1908年因受人诬陷打了一场官司，家道开始中落。

罗荣桓的母亲姓贺，是一个贫农的女儿，一生生育有6男2女。到1949年10月衡山解放时，罗荣桓的父母已经过世。他的弟兄中依然健在的也只有二哥罗晏清和六弟罗湘。

1919年罗荣桓17岁还在读中学时，便由家庭包办，同一位贫农的女儿颜月娥结了婚。1926年秋天，生育一个女儿叫罗玉英。1927年7月，罗荣桓在武汉中山大学读书时受中共湖北省委派遣，去鄂南通城从事农民运动。此时，蒋介石、汪精卫均已背叛革命，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者被杀害。罗荣桓深知，此时投身革命，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他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为了不连累妻孥，他写了一纸离婚书，劝颜月娥改嫁。但是颜并未改嫁。她仍然生活在罗家，并依靠做针线活含辛茹苦，将女儿罗玉英抚育成人。到1949年初，罗玉英同当地一位小学教师陈卓结婚。

罗荣桓得悉这些情况后写信给罗玉英，让她到北京来读书，学一点文化，将来好为人民服务。同时，林月琴也



托部队捎去了一个包裹，里面有给颜月娥的皮袄，有给颜月娥和罗玉英的冬棉夏单、内衣外衣全套的衣服，还有林月琴亲手给她们编织的毛衣。罗玉英回信给罗荣桓，说她已经怀孕，即将分娩，等坐完月子才能北上。林月琴得悉后又托人捎去全套的婴儿衣服。罗玉英尚未见过这位林妈妈，已经可以感到她的无微不至的关怀。

1950年1月，罗荣桓的哥哥罗晏清让他的两个儿子陪同陈卓、罗玉英以及他们的孩子来到北京，罗荣桓将他的两个侄子和陈卓介绍进了军政大学，罗玉英由于文化较低，同时需照料孩子，便留在家里补习文化。到年底，进了速成中学的预备班。他们平时都住学校，星期六下午回家，星期天晚上再回学校。林月琴同罗玉英相处很好。每个月林月琴都要从罗荣桓的薪金中取出30元交给罗玉英，让她寄给她的母亲。直到罗荣桓逝世后，当地政府负责赡养颜月娥，方才停付。

在50年代，罗荣桓家共有子女5人：罗玉英、罗东进、罗南下，还有建国前后才出生的罗北捷和罗宁（娜娜）。在罗家生活的先后还有罗荣桓的侄子罗德平，侄女罗蔚兰、罗绮，侄孙罗孟贤，林月琴的堂弟林一苏、林明，侄女林立。林立原名林保住。林月琴看到家里孩子太多了，打算把保住送回安徽老家；罗荣桓不赞成，他对林月琴说：“现在叫这孩子回去，还不是当个童养媳。我们多养一个孩子还养得起，把她留下吧。”罗荣桓为她改名林立，鼓励她自立自强，学好本领，成为国家有用之材。林彪前妻的女儿林小



玲一度也住在罗家。她同叶群的关系不好，有一次她写信指斥叶群为王熙凤。林小玲想见她的父亲林彪，怕叶群从中作梗，便请林月琴联系。林月琴认为这是人之常情，便同意了。尽管林小玲写信给叶群的事林月琴事先并不知道，但多疑的叶群还是把这事同林小玲见林彪的事联系起来，从而增加了对林月琴的不满。这是后来在“文革”中叶群整林月琴的原因之一。

孩子们平时在校寄宿，寒暑假都回来了。罗荣桓夫妇便把大家组成一个学习小组，由年纪最大的罗玉英当组长，让大家按时作息，一起复习功课，做假期作业。孩子们相处得很融洽。

## (八)

到1954年，一向充满和谐、欢乐气氛的罗荣桓家出现了不幸：林月琴的女儿南下腿上长了骨癌。

南下很聪明，功课很好，罗荣桓很喜欢她。林月琴听说南下得了不治之症后，非常悲伤，但她怕罗荣桓难过，一开始没有告诉他。不久，南下病情发展很快，要做截肢手术，再也瞒不住了，罗荣桓也知道了。这时林月琴便得心挂两头，既牵挂罗荣桓的身体，又为女儿而焦虑。1955年5月，南下癌肿已转移到肺部，住进了医院，林月琴整天守护在医院内。尽管医生用了各种办法医治，最后病魔还是夺去了南下年轻的生命。此时林月琴强行抑制住自己的悲

痛，怕的是罗荣桓听到这个消息后会加重病情。她同卫生部保健局长黄树则商量，让黄先回去设法慢慢地同罗荣桓讲，避免使他受到刺激。

这一难关总算渡过去了，林月琴更把照顾好罗荣桓的生活当作自己的首要任务。对于罗荣桓的病，最彻底的治疗方法是做肾移植手术和安装人工肾；但这在50年代还办不到，对他只能采用保守疗法，可疗效有限。罗荣桓的健康状况仍然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恶化，林月琴对他健康状况的焦虑也与日俱增。有时罗荣桓精神好一些，林月琴便得到些许安慰。但是这样的时光往往十分短暂。林月琴经常是悬着心过日子。

为了同病魔作斗争，罗荣桓非常注意锻炼身体。多年来，他养成了每天散步的习惯。由于他比较胖，有因肾病引起的高血压和心脏病，他走起路来步履十分沉重，每走一步都似乎要用尽全身力气，似乎都是在重新起步。然而他每天都要坚持走1个小时，走到某一个作为标志的地点才回头，以保持有一定的运动量。但是当刮风下雨或是数九隆冬时，便不能外出散步了，他只好在室内做一做自编的体操。为了便于让罗荣桓每天都能散步，林月琴想将院内那一排平房打通，修一条走廊。但是罗荣桓坚决不同意。后来，罗荣桓病重住院，管理部门乘机突击修好了走廊。但是罗荣桓再也没有回来。

罗荣桓没有什么业余爱好，既不下棋也不打扑克。林月琴给他买来留声机，让他听听唱片，但他兴致也不高。有

一次保健医生给他放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他听了一会儿便对医生说：“这是什么呀？”医生便一段段地放，一面放一面给他讲，他听后点点头：“你这么一讲，还确实有一点味道。”以后他便常让林月琴或医生给他放《梁祝》。

对于罗荣桓的健康，同他住地相邻的贺龙十分关心。贺龙去看望他时常向他宣传钓鱼对健康的好处，劝他去钓鱼。贺龙还请来聂荣臻一道劝驾。林月琴也劝他去。盛情难却，罗荣桓便去了。第一次便钓了一条十几斤的大鱼，从此引起了对钓鱼的兴趣。林月琴在他精神好而天气又好的时候便陪他去钓鱼。

1963年9月28日，罗荣桓因病情严重再次住进了北京医院。这次不仅是血压不稳，心脏不好，肾功能也开始衰竭。

肾功能的衰竭引起尿毒症，非蛋白氮指数高达110、120（一般超过100，人就要昏迷）。当时医院还没有人工肾设备，只能采用腹膜透析的办法，就是向腹内注射1000毫升生理盐水，过半小时再抽出来。林月琴看到罗荣桓注进盐水后，肚子胀得像鼓一样，但他却强忍着一声不吭。由于尿中毒，毒素不能从肾排出，就从皮肤排出。因此罗荣桓浑身皮肤常常奇痒难耐。他自己挠，林月琴也帮他挠。这也止不住，就用热水烫。皮肤经常烫出泡来。林月琴看到他如此的受折磨，真比自己身受还感到痛苦。

最痛苦的是尿毒刺激肠胃，不能吃饭，吃了就吐。医生想尽一切办法，也不能制止呕吐。病人再不吃饭，病情

更会加重。林月琴和医务人员便喂他吃，他便以坚强的意志一口一口地把饭强咽下去，一面吃一面同旁边的人谈话，以分散注意力，减少痛苦。吃下去吐，吐完了再接着吃，有时一顿饭要折腾四五次。每当他吃下一点东西而没有再吐时，林月琴和罗荣桓一样，也感到欣慰。

随着病情的发展，罗荣桓已经很难起床了。但是他还是一次次地挣扎着要坐起来。他反复地说：“让我坐起来，站起来，能站起来就是胜利！”为了能使他下床活动，林月琴把家里的一把旧靠椅拿出来，装上四个轮子，搬到医院里来，推着他在走廊里走来走去。走廊里静悄悄的，林月琴是多么希望这位同生死共患难达 26 年之久的最亲密的战友能从这把自制的轮椅上站起来啊！

在最后几天，罗荣桓因尿毒症而打嗝不止，几天几夜地打，院方把北京所有会止嗝的医生都请来，用了各种方法，就是止不住。林月琴喂他吃冰，后来吃冰也止不住，又用喝开水的办法……看到罗荣桓这么痛苦，林月琴的心都要碎了。自从罗荣桓住院以来，林月琴就在病房搭了一张小床，日夜守候在那里。为了尽量减少医护人员的负担，生活上的许多事，林月琴都主动去做。焦虑和劳累使她变得十分憔悴，而许多人来看望，她还要抑制自己的悲伤情绪去迎送客人……

12 月 15 日，罗荣桓病情更加恶化。几天来，他一直处于昏迷状态。这一天他苏醒过来，看着守候在床前的林月琴和孩子们。他拉着林月琴的手，深情地望着，对这位经



过长征的红军女战士、与他同甘共苦 26 年的老伴，他没有更多的话要嘱咐了，只是说：“我死以后，分给我的房子不要再住了，搬到一般的房子去。不要特殊。”然后他又逐个看看孩子们，嘱咐道：“我一生选择了革命的道路，这一步是走对了，你们要记住这一点。我没有遗产留给你们，没有什么可以分给你们的。爸爸就留给你们一句话：坚信共产主义这一伟大真理，永远干革命。”随后又昏迷过去。傍晚，罗荣桓又苏醒过来。林月琴告诉他：“少奇同志要来看你。”罗荣桓听说后，一直硬撑着。刘少奇走后，他又陷入昏迷。

12 月 16 日下午 2 时 37 分，罗荣桓在贺龙、张爱萍、甘泗淇、梁必业、肖向荣和林月琴及孩子们守护下，心脏停止了跳动。林月琴悲痛欲绝，在人们的劝慰下，脑子里已是一片空白……

这天晚间，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议室召集会议听取聂荣臻等同志汇报 10 年科学技术规划。开会前，毛泽东提议大家起立为罗荣桓默哀。默哀毕，毛泽东说：“罗荣桓同志是 1902 年生的。这个同志有一个优点，很有原则性，对敌人狠，对同志有意见，背后少说，当面多说，不背地议论人，一生始终如一。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不容易，原则性强，对党忠诚。对党的团结起了很大的作用。”

出席这次汇报会议的罗瑞卿随即打电话给正在罗荣桓家陪同林月琴的郝治平，让她把毛泽东讲的话向林月琴转达，劝劝林月琴。林月琴听了毛泽东的话，稍稍得到一些

慰藉。

## (九)

丧事办完以后，林月琴仍然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罗瑞卿的夫人郝治平、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向荣的夫人余慎、总政副主任谭政的夫人王常德、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的夫人翟云英经常来看望她，劝她去钓鱼，以转移她的注意力，使她的情绪能逐渐稳定下来。然而，这几位女同志，有的丈夫已经去世，有的丈夫依然健在，在“文化大革命”中，却被叶群打成了“寡妇集团”。

叶群为什么要整林月琴？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谈到林彪与罗荣桓的关系。

林彪和罗荣桓，早在1930年便在一起共事了。当时一个是红四军军长，一个是红四军政委。解放战争中，他们一个是四野司令员，一个是四野政治委员，互相配合，合作得很好。

建国以后，他们之间以及两家之间的关系，一直也是不错的。

但是到了60年代，林彪罗荣桓之间却在几个问题上产生了不同意见。一个问题是1960年面对在农村工作中存在的刮共产风、强迫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和特殊化风，指战员中有不少意见的情况，要不要向地方上反映。罗荣桓认为应当及时向当地党委反映，并在请示中共中央书记

处之后，以总政名义向部队发了文件。但是林彪不同意，否定了总政发出的文件。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学毛主席著作。林彪提出了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罗荣桓不赞成这种简单化的实用主义提法，认为主要应当学习立场、观点、方法，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对第二个问题，罗荣桓曾在会上当面向林彪提出，使林彪不得不同意在一个条例中删去他的提法。邓小平主持的书记处完全支持罗荣桓的观点。这一件事引起了林彪对罗荣桓的不满。他在对一些干部谈话时，曾给罗荣桓扣上“反党反毛主席”的帽子，并说：“什么林罗，林罗从来就不是在一起的，林罗要分开。”虽然罗荣桓已于1963年逝世，但从后来“文革”中林彪、叶群的表现看，他们仍然记恨罗荣桓。

从叶群方面说，她对林月琴也有许多不满之处。在东北时搬家的事和选妇女代表的事，解放后林小玲的事，叶群都是记着帐的。1965年，当林彪着手整罗瑞卿时，叶群便通过吴法宪向刘亚楼夫人翟云英打招呼，要她少同林月琴接触，原因是林月琴同人交往“左中右不分”，其实际含义即是指林月琴同罗瑞卿的夫人郝治平经常来往。翟云英没有听他们的话。同林月琴比邻而居的贺龙夫人薛明有一天收到军委办公厅送来的一份传阅文件，让她看完后送给林月琴看。叶群知道后便威胁薛明说：“你们那个邻居的弟弟历史有问题。你把文件给她看，将来你会说不清楚的！”薛明没有理她。“文革”开始后，江青和叶群曾相约，互相

支持整“仇人”。同江青达成这一默契后，叶群便放开手脚，在大整贺龙夫妇、罗瑞卿夫妇的同时，也把手伸向林月琴。她不仅要报林彪的仇，还要泄自己的愤。

1966年8月25日，吴法宪带头给林月琴写了第一张大字报，贴在总参办公楼的门厅内，轰动了总参机关。轰动不在于内容而在于它的作者。人们都很纳闷，空军的司令怎么会把“反”造到总参来呢？至于内容，却很空泛，说的是林月琴喜欢钓鱼，帽子则是“意志颓废”。为了造声势，空军又送来几张大字报，接着是林彪办公室支部贴出大字报支持吴的“革命行动”。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叶群操纵吴法宪演的一出傀儡戏。但是，由于曲拙和寡，这出戏不几天就沉寂下去。

叶群对这种状况很不满意，她决定再添几把柴禾，把“火”烧起来。1966年12月，在林彪授意下，总参成立了批判肖向荣的领导小组。叶群向领导小组提出，要在批肖向荣的同时点名批判林月琴，斗倒斗臭，肃清影响。她要求领导小组每天向她报告情况。除批肖向荣的情况外，还要了解有谁点了林月琴的名，都讲了些什么。就是在这次会上，一些人在叶群授意下胡说林月琴组织了“寡妇集团”。

这一期间，林月琴的弟弟、民航局的一位一般干部李宁被诬陷为特务而被迫害致死。林月琴则带着女儿北捷、侄子林洋被软禁在西山。12月16日，罗荣桓逝世3周年，叶群又将公安部长谢富治搬了出来，连夜秘密逮捕了李宁的



妻子陶书秀，把她投入秦城监狱。逮捕的方法经过周密安排，十分神秘。当夜由谢富治在林彪家里坐镇指挥，先是派一辆卧车到林月琴家，叫醒了陶书秀，要她把林月琴的换洗衣服收拾一下，送到西山去。陶信以为真，上了车。车到了西四附近，又让陶下车，然后换乘警车直奔秦城。对一位不识字的家庭妇女如此煞费苦心，无非是要给林月琴添点堵。至于把逮捕日期选在12月16日这一天，是故意还是巧合，就不得而知了。

此时，罗东进夫妇住在机关，林月琴被隔离，陶书秀被捕，罗家就没有人了，只剩下一个司机看门。林月琴的小女儿娜娜回家一看，不知道妈妈到哪里去了。曾经护理过罗荣桓的301医院护士肖宝珠便把娜娜接到301医院当一名护理员。此后，很长时间，娜娜和母亲互相都不知道对方在哪里。

1967年2月，叶群由幕后指挥转向前台。她在京西宾馆召开的总政治部一次会议上指名攻击罗荣桓“反党”、“反毛主席”；并通过全军文革小组一名工作人员之口在向群众解答问题时，把罗荣桓和已被贬黜到福建的谭政并列为在总政工作做得较少、较差的主任。接着，罗荣桓曾长期领导的总政治部便被林彪一伙打成了“阎王殿”而“彻底砸烂”。

1969年10月17日，林彪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恶化的估计，作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翌日，总参谋长黄永胜以“林副主席的第

一个号令”正式下达了这一“指示”。随后，林月琴被疏散到广东丛化。同时被疏散到丛化的还有朱德、康克清、董必武、何莲芝、李富春、蔡畅等人。对这些老同志，当地管理部门给规定了活动范围，不准到附近工厂、农村去。连散步也不得超过给划定的桥头警戒线。丛化这一风景优美的疗养地一变而为软禁这些老同志的禁区。

林月琴和她的大儿媳带着刚刚出生 45 天的孙女上路。20 天后大儿媳便被单位召回去“抓革命，促生产”。林月琴为带这个婴儿，提出希望请一个保姆。管她的人因上边有令，任何闲人不得进入禁区，所以不敢答应。林月琴只好自己带。祖孙二人住在一座楼房内，没有伙房，只能在食堂打饭吃。为给孩子热奶，她买了一个电炉，请电工在厕所装了插销。但管理人员禁止用电炉。她又买了一个木炭炉在走廊热奶。管理人员又说，会把楼熏黑，让林到楼顶平台去热奶。楼顶风大，而且一天要热几次，其中包括夜里一次，林月琴被逼得走投无路，便对当时广州军区一位负责人说：“这个孩子我是养不活了，你把她抱走扔到珠江里去吧。”这才允许林月琴在卫生间内用电炉热奶。

处于这种被软禁、被歧视的状态，所幸的是林月琴同朱德、康克清比邻而居，每天可以一块散散步，一块到树林里采蘑菇，一块聊聊天，以舒解郁结于心头的愤懑情绪。当时，党的九大已开，叶群已是政治局委员，名字经常在报纸出现，不是出席什么会议，就是接见什么人。有一天，康克清问林月琴：“你了解叶群吗？过去你和她常有来往。

她这个人究竟怎么样？”

当时，叶群是炙手可热的人物，林月琴感到不便说什么，便回答说：“我和她过去常有来往，但她并不了解。”康克清听出了林月琴的弦外之音，便说：“不管是谁来领导，只要他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我们就拥护。”停了一会，她又说：“如果不是这样，将来历史是会给他做结论的。”

过了一段时间，林月琴还是把叶群怎样唆使吴法宪贴她的大字报，怎样把她打成“寡妇集团”的头子等情况向康克清说了。康克清安慰她说：“这些事将来都会弄清楚的。”康克清的话给林月琴以很大的安慰和鼓舞。

到1970年，林月琴还见过一次叶群。那是在李天佑副总长逝世以后。林月琴当时到北京来看病。她听说要开李天佑的追悼会，便搭了别人的车去了。治丧的工作人员不让她进去，但她闯了进去。过了一会儿，叶群到了，她看到林月琴不禁一愣，但立即满脸堆笑地对林月琴说：“啊呀，好久不见啦！”边说边挽着林月琴的胳膊进了休息室。追悼会要开始了，叶群在众人簇拥下进了灵堂，而把林月琴撇在了外面。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林月琴回到北京。

1975年，邓小平从江西返回北京，住在招待所里，便约见了林月琴和她的3个孩子。经过9年动乱，孩子们见到这位罗荣桓的挚友，历尽磨难依然健壮的邓叔叔，都含着热泪。邓小平满怀感情地对罗东进等说：要记住你们的爸爸，他是真正维护毛泽东思想的，他反对“活学活用”完

全正确，我和他的观点是一样的。听到邓小平这一番语重心长的话，林月琴感到莫大的安慰。

粉碎“四人帮”后，林月琴得到彻底解放。她被任命为总政干部部顾问。从1964年起，她是第三、第四届人大常委，第五届政协常委，第六届人大常委和第七届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专门委员。她曾为许多冤假错案的受害者反映情况，转递信件，帮助他们和他们的家属落实政策。她参加了王震主持的全国中小学优秀教师奖励基金会、康克清主持的中国儿童和少年基金会及邓朴方主持的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工作。她和贺龙夫人薛明、罗瑞卿夫人郝治平为中小学优秀教师奖励基金会筹款97万元，为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筹款300万元。她曾批转了许多群众来信，落实到上海、山东、江西等省市。她还到少年管教所视察，了解管教所的情况，对管教所干警的生活待遇和少年犯的管教等问题提出了意见。

现在，她已有78岁，仍然在为教育下一代、为社会公益事业而奔走，为中华的经济腾飞、为四化大业发挥着余热。



## 关于毛泽东争取江西首先胜利 战略思想的历史考察

盖 军

1927年国共两党分裂以后，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广大工农群众进行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同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了实行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并提出以城市暴动为“中心及指导者”，直到“造成一省或几省革命胜利的局面”，强调了以城市为中心。1928年党的六大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根据反动统治在各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明确提出“可以使革命先在一省或数省重要省区之内胜利”的策略方针。从此，以城市为中心，夺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方针，便成为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武装暴动夺取政权”总战略的中心策略口号。

毛泽东在具体领导革命斗争的实践活动中，作为一个地区的负责人不可能脱离或违背这一总的策略方针而独断专行，这是不言而喻的。但也不能认为毛泽东在这一段时间的实践活动及主张同党中央的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指导思想毫无区别，半斤八两，党中央错了，毛泽东也不正确，那就无是非可言了。

本文试图对毛泽东争取江西的战略思想作一历史的考

察，以就教于同行学者。

### 一、“以宁冈为大本营”的思想是从实际出发的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进军井冈山，到1928年2月，井冈山根据地初步建立起来。4月，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起义农军到达井冈山地区。两支革命军队胜利会师，大大增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力量。

1928年5月2日，毛泽东总结了半年来斗争的经验向中央作了报告，提出了坚持井冈山斗争的方针，指出：军委采取对内加强军队的建设，特别是党组织的建立，对外深入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和分配土地的方针，坚持井冈山地区的斗争，造成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政权，这对发展井冈山根据地有重大意义。6月16日，毛泽东给湘赣省委转中央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了“以宁冈为大本营，其理由有三：（1）此间系罗霄山脉中段，地势极好，易守难攻；（2）党在此间是由无组织进为有组织，民众比较有基础（赤卫队、赤色游击队组织了），弃之可惜；（3）湘南、赣南只能影响一省并只及于上游，此间可影响两省并能及于下游。因此三个理由，我们只有用全部力量与敌人争斗，决无退却抛弃。但山上粮食万难，款子万难，伤兵医药万难，正随时解此难关。”<sup>①</sup> 大本营就是根据地的意思。毛泽

---

<sup>①</sup> 《关于红军情况的报告》（1928年6月16日），见《毛泽东军事文选》第6页。

东认为没有一个巩固的根据地，就站不稳脚根。这个大本营设在哪里呢？经过湘南特委 3 月命令工农革命军开往湘南，井冈山根据地的平原地区随即被江西敌人占领的教训，毛泽东从地势、党群基础、革命影响等方面肯定以宁冈为大本营最为合适。

毛泽东什么时候形成了以宁冈为大本营的思想呢？根据历史材料，是在朱毛会师以后的 4 月到 6 月之间。杨克敏 1929 年的报告中说：“边界自毛部去春（1928）自湖南与朱部会合今重来后，确定了建立罗霄山脉中段的割据政权的决心，因为鉴于过去军队没有一个根据地，流寇似的东闯西窜，得不到一个休养的机会，军队十分感觉疲劳，而甚难解决的，就是伤兵的安置问题，要找一个军事根据地，必须用力量去建立一个割据区域，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是很好的军事根据地，于是创造罗霄山脉中段的割据，建立罗霄山脉中段的政权，为朱毛部当时唯一的工作和企图，于是伟大的奋斗和激烈的斗争，一幕一幕地开展起来。”

6 月中旬，毛泽东根据当时湘敌较强，赣敌较弱的情况，提出了“对湘取守势，对赣取攻势”的方针，这一避强击弱的作战原则是从实际出发的。

1928 年 6 月，湖南敌人的兵力约有 10 个军，其中 4 个多军驻在湘南和湘东，江西敌人约有 3 个军，其中驻在赣西的不到 1 个军。

这时，湖南省委在党中央盲动主义残余的影响下，错估形势，认为湖南反动势力十分动摇，更加削弱，因此，制

定了湘南第二次武装起义计划，并于6月下旬两次派人到井冈山，调红四军主力向以郴县为中心的湘南发展。6月30日，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和永新县委召开联席会议，传达和讨论省委来信，湖南省委代表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认真讨论了省委来信，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四军仍应继续在湘赣边界各界作深入的群众工作，建设巩固的根据地。有此根据地，再向湘赣推进，则红军所到之处其割据地方巩固，不易为敌人消灭。”

7月4日，根据联席会议精神，毛泽东以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的名义，写报告给湖南省委，陈述红四军主力不去湘南的具体理由：

第一，“省委上次主张建宁冈大本营的政策（按：毛泽东以宁冈为大本营的方针是得到了湖南省委的批准的）是对的。如现在又马上改变使四军重行走徒游动的道路，四军的改造必更困难。前次省委来信指出四军转战千里，近于流寇，必须择地休息以资改造，此意非常正确，正在遵照执行，不宜轻率变动”。

第二，“湘省敌人非常强硬，实力厚强，不似赣敌易攻。……故为避免硬战斗，此时不宜向湘南冲击反转更深入了敌人的重围，恐招全军覆灭之祸”。

第三，“宁冈能成为我军事大本营，即在山势既大且险，路通两省，胜固可以守，败亦可以跑，且敌人绝对无法把我围着。若加上各县党与群众的基础，实在可以与敌人作长期的斗争。若此刻轻易脱离宁冈，‘虎落平阳被犬欺’，四



军非常危险”。

第四，“现我们全力在永新、宁冈工作，日有进步，并向莲花、安福及吉安西南端推进，深入土地革命，创造地方武装，再能有一天（些）功夫，敌人再来进攻，颇有胜利的把握”。

第五，“湘南各县焚杀之余，经济破产，土豪打尽，……此刻到湘南去解决经济问题，乃是绝对的不能，真正解决目前经济问题，只有在湘赣边才有法想”。

第六，“伤兵增至五百，欲冲往湘南去，则军心瓦解，不去又不能，此亦最大困难问题之一”。

报告最后表示：“根据以上六种实际理由，在新军阀战争未爆发以前，尚不能离开宁、永、莲往湘南。一俟此间基础略固，外边有机可乘，四军自可出茶、攸、浏参加湘省之总暴动”，“上项意见，请省委重新讨论，根据目前情形，予以新的决定，是为至祷。”<sup>①</sup>

湖南省委要求红四军出击湘南，参加湘省总暴动，毛泽东则反对去湘南，并据理力争，分歧很大，矛盾尖锐。于是，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与省委派充特委书记的杨开明，乘力持异议的毛泽东、宛希先诸人远在永新的时候，不察当时环境，不顾军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不同意湖南省委主张的决议，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向湘南去的命令，附和第二十九团（宜章农民）欲回家乡的举动，导扬其焰，军

---

<sup>①</sup> 《中共湘赣边特委和红四军军委向中共湖南省委的报告》。

委亦未能挽救此不利的行动，遂招致边界与湘南两方面的失败。

湘南八月失败的具体原因，毛泽东指出了6条，而根本原因，他认为是两条，即“完全不明了当时正是统治阶级稳定时期”和“不注意中心区域坚实基础之建立”。毛泽东指出：“在统治阶级内部发生破裂时期，例如两湖在李宗仁唐生智战争时期，广东在张发奎李济深战争时期，我们的战略可以比较地冒进，用军事发展割据的地方可以比较地广大。但是仍然需要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以备白色恐怖到来时有所恃而不恐。若在统治阶级政权比较稳定的时期，例如今今年四月以后的南方各省，则我们的战略必须是逐渐地推进的。这时在军事上最忌分兵冒进，在地方工作方面（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发展党，组织地方武装）最忌把人力分得四散，而不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各地许多小块红色区域的失败，不是客观上条件不具备，就是主观上策略有错误。”<sup>①</sup>

1928年10月，在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的决议。决议总结了湘赣边界4月到7月的经验：“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正规军队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集中红军相机应付当前之敌，反对分兵，

---

<sup>①</sup> 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57—5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sup>①</sup>到11月中旬，红四军在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下，利用根据地内作战的有利条件，避强击弱，连战皆捷，基本上恢复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原有地区。实践证明，毛泽东“以宁冈为大本营”的方针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完全正确的。

有的文章无视上述毛泽东同湖南省委以至中央的根本分歧，硬说井冈山时期的毛泽东在贯彻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方针以及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战略口号上同湖南省委及中央是一致的，并断章取义地摘引毛泽东的某两句话，来说明毛泽东也要来参加“湘省之总暴动”，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我认为毛泽东7月4日给湖南省委的报告，充分反映了他同中央以及湖南省委在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策略上的不一致。湖南省委命令红四军“毫不犹豫”地向湘南发展，实现湖南全省总暴动。毛泽东说：“我们接受了这样硬性的指示，不从则迹近违抗，从则明知失败，真是不好处。”<sup>②</sup>他坚持以宁冈为大本营，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不同意湖南省委的错误指令，要求省委重新讨论，考虑红四军的意见后再作决定。同时，他又不是硬顶硬地违抗上级命令，最后表示：等四军基础巩固，外边又有机可乘时，自可参加湘省总暴动。毛泽东既实事求是，敢于据

---

① 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5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② 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80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理力争，又讲究纪律，尊重上级，表现了高超的领导艺术。

应当说，在领导创建井冈山根据地时期，毛泽东还没有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思想。当时红军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生存、在哪里生存的问题。即或朱德、陈毅同毛泽东会师时带来了十一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议，毛泽东当时考虑的还是“一万人的群众拖泥带水，纪律大糟”的队伍如何“大加整顿”才能站住脚的问题，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问题还提不上日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证明了毛泽东“以宁冈为大本营”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这里，还涉及一个问题，即对井冈山根据地在1928年9月至12月的工作如何评价。1929年6月召开的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认为，9月至12月“是一种单纯的军事割据，没有很好的计划游击战争，割据区域还是边界各县，只是井冈山的周围百余里……含有保守主义的错误”。同年9月28日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也肯定和支持了上述观点，认为“在统治阶级政权未崩溃以及革命高潮未到来的时期，红军应该是采取经常游击的政策，若停留在一个地区，或企图固守一个地带，求其继续存在，这不但不可能而且必然陷于失败。过去罗霄山脉政权的经验告诉了我们”，“农村的政权或游击队应该是一个斗争的单位，实行游击四向发展的策略。保守必然要失败”。红四军党的七大的决议和党中央九月来信中对这个问题的批评是不正确的。如上所述，毛泽东当时主张建立根据地的坚实



基础是正确的。9月至12月，国民党新军阀还没有分裂和战争，湘赣两省敌人正筹划着对红四军大规模地“会剿”。红四军刚经过“八月失败”的打击，如不依靠井冈山地区的有利地形，打击进犯的赣敌，以恢复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并赢得时间整顿红军和党组织，加强对官兵的思想教育，而要红四军很快离开井冈山根据地，外出游击，后果是很难设想的。事实上，湘南八月失败造成的损失到同年11月中下旬才基本上得到弥补。红四军中某些领导人对毛泽东正确的战略方针缺乏认识，坚持流动游击的错误主张，正如陈毅后来回忆中所说的，他们对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如何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还缺乏深刻的了解，这一点没有毛泽东做得好。年轻的党中央同样也是如此，加上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因而在这一点上出现不正确的意见也是难免的。

## 二、“争取江西”口号的提出

1928年12月，由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平江起义的主力700余人到达井冈山，同红四军会师。

1929年1月初，红四军在永新接到了党的六大的决议案。当时，正值湘赣两省敌人策划以6个旅约3万人的兵力，分5路进攻井冈山，同时加紧对井冈山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前委、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红五军军委举行联席会议，讨论了党的六大决议，同时进一步讨论了当务之急的问题，即如何粉碎敌人对井冈山的“会剿”。会议决定采取“攻势的防御”战略，即由毛泽东、朱德、陈

毅率领红四军主力向赣南出击，先求打破敌之封锁，解决经济困难，在敌“会剿”开始后，则在外线作战，配合留守井冈山的部队打破敌之“会剿”，以巩固和发展井冈山根据地。

1月14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部队离开井冈山向赣南出击。由于敌我形势的变化，原定的内外线配合已无实现可能，红四军转向赣闽边界地区游击。3月，红四军进至福建长汀地区。

这时，蒋、桂军阀混战已经开始，蒋介石为从桂系军阀手中夺取湖南、湖北两省地盘，将在江西的正规军大部抽调至九江一带，赣南、闽西一带兵力空虚。红四军前委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于3月20日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在新军阀混战时期，“前敌委员会决定四军五军及江西红军第二第四两团之行动，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用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

这个报告中毛泽东还未提出争取江西的设想，只是根据军阀混战的形势，提出更多更快地建立苏维埃区域的问题。报告中说：“对一般的计划，我们意见：在全国范围内要猛力的夺取群众，……除工农外，兵士群众的夺取，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一般工作的重心，我们的意见：宜在江苏直隶，红军小区域苏维埃使个数加多，这不仅在湘赣粤闽等地，江苏北皖鄂北豫南直隶，都应有红军及小区域苏维埃之创立。”“福建全省，浙江全省，赣东赣南两边，统

治阶级的力量非常薄弱（在全国比较），未知中央曾讨论以此三地方为目标，首先创造公开割据的计划否？三地统治力量既弱，又通海口，这是值得注意的”。

报告坚持在赣南、闽西一带建立根据地，再次强调说：“红军第四军大概十天内尚在闽边工作，十天外须赴赣边瑞金宁都一带游击，那时须看湘赣战局的形势，从有利于红军的发展及有利于工农群众发展的标准上去决定行动。或再回闽边，或在赣南作较久时间的游击；或往吉安去接近国民党的战区。惟闽西赣南一区内之由发动群众到公开割据，这一计划是决须确立，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础。”提出要在江苏、直隶、浙江等地也建立苏维埃区域这在当时是做不到的。但报告的基本精神是利用军阀混战的机会，在更大范围的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这个思想是正确的，这比井冈山时期以宁冈为大本营的思想又前进了一步。

1929年2月7日，为了贯彻党的六大精神，同红四军取得联系，党中央写信给毛泽东、朱德及湘赣边界特委，信中依据下述两点理由要求红四军分编武装力量，散入乡村中去。

第一，国内的革命形势是：“工人斗争很难造成广大的革命发展。农民斗争在南方则因城市工作未能建立和发展得不到城市领导致许多苏维埃区域都相继失败”，“北方农民运动多还停在和平发展的道路”，“兵士的阶级觉悟在南方逐渐发展但在北方则甚落后，且其对土地革命的认识还



未深切”；“中国革命的高潮仍是必不可免的要到来。只是党的领导力量薄弱，工农群众的组织和斗争都还未能有健全的较平衡的发展，故革命的主观力量反不能促进这一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有时因主观力弱，任凭客观的形势如何有利，反会延缓或阻碍了革命高潮的到来。”

第二，党的工作重心应该放在城市。信中指出：我们党若不能团结广大的工农群众尤其是产业工人群众于党的周围，就不能促进这一革命潮流的高涨。“故目前党的主要工作在建立和发展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主要的是产业工人支部）与领导工农群众日常生活的斗争和组织群众。但这并不是说土地革命我们不求深入，农民自发的暴动我们不去领导，乡村的游击战争我们不去发动，农民的武装组织我们不去工作，而是说我们这些工作，必须与目前党的中心任务中心工作相适应，必须与日常生活斗争和群众组织相联系。然后这些群众斗争的发展才能在我们党的领导之下较平衡地前进，才能促进全国的革命高潮。”

因此，信中指出：“中央依着六次大会的指示，早就告诉你们应有计划地有关联地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你们必须认清目前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坚决地执行有组织地分编计划。但你们切须弄明白：中央决不是要你们采取失败主义的精神将红军遣散回乡，而是要你们在适当的环境中（即是非在敌人严重的包围时候）可能的条件下……分编我们的武装力量散入各乡村去”，“尽可能地散在农民



中间发动农民的日常斗争走入广大的土地革命。”“不然，东窜西奔，这一武装力量将日益与广大农民群众的日常斗争隔离而成为农民群众以外的一个武装力量。”

信中最后提出：“中央依据于目前的形势决定朱毛两同志有离开部队来中央的需要”；“一方朱毛两同志离开部队不仅不会有更大的损失且更便于部队分编计划的进行，因为朱毛两同志留在部队中目标既大，徒惹敌人更多的注意分编更多不便，一方朱毛两同志于来到中央后更可将一年来万余武装群众斗争的宝贵经验贡献到全国以至整个的革命。两同志得到中央的决定后，不应囿于一时群众的依依而忽略了更重大的更艰苦的责任，应毅然地脱离部队速来中央。”<sup>①</sup>

信是周恩来起草的。从革命感情以及对朱毛两人地位和经验的重视方面来说是无可非议的。但信中对形势的分析和党的工作重心的认识就未必恰当了。毛泽东“争取江西”的策略思想就是基于上述与中央有不同意见的情况下提出来的。

4月3日，红四军前委接到中央2月9日的指示信，4月5日，毛泽东代表前委写了复信。其中心内容是：认为党中央“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都太悲观了”，我党的战斗力组织力虽然弱，“但在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形势之下，恢

---

<sup>①</sup>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29-37页，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

复一定很快”，“群众对国民党的幻想一定很快的消灭，在将来形势之下，什么党都不能和共产党争群众的”。“在大混乱的时局之下，只有积极口号积极精神，才能领导群众。党的战斗力的恢复也一定要在这种积极精神之下才有可能。”“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的唯一关键，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之建立，大区域产业支部之创造，是目前党在组织方面最大任务，但同时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苏维埃之建立，红军之创造与扩大，亦是帮助城市斗争，促成革命潮流高涨的条件，所以抛弃城市斗争沉溺于农村游击主义是最大的错误，但畏惧农民势力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领导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不得工人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发展超过工人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

信中认为：“中央要求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理想”，中央并不了解实际情况。毛泽东根据井冈山根据地斗争的经验，说明分兵容易被敌人击破，集中则胜利大于损失。“我们用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展是一天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

信中认为，蒋桂军阀“大战爆发即在目前，国民党统治从此瓦解，革命高潮很快的会到来。在这种时局之下来布置工作，我们觉得南方数省中，粤湘二省中买办地主的军力太大，湘省则更因党的盲动主义政策的错误，党内党外群众几乎失尽。赣浙闽三省则另成一种形势，第一、三省军力最弱……第二、三省党的盲动主义错误比较少，除浙江情况我们不明了外，江西福建二省党及群众的基础都比湖南好些。赣北之德安修水铜鼓尚有相当基础，赣西宁冈永新莲花遂川等县党及赤卫队的势力是依然存在的，赣南的希望更是很大的，吉安、永丰、兴国等县的红军独立第二团第四团有一天天发展之势，赣东方志敏的红军独立第三团并未消灭，如此已造成了向南昌包围的形势。我们建议中央在国民党混战的长期战斗中间，我们要和蒋桂二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群众的割据，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

这封信是反映毛泽东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过程中一份重要的文献，党史学界褒贬不一，我认为一概肯定或一概否定都是不妥的，应该说有正确也有错误。

第一，在革命低潮时期，强调要有积极的精神、积极的口号，才能领导群众斗争，才能恢复和发展党的战斗力，这一点很重要。如果按照中央来信精神去做，赣南、闽西以及后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就不会取得那样重大的成绩。另一方面，如果说，中央对形势的估计有些悲观，而毛泽东认为蒋桂大战会使国民党统治从此瓦解，革命高潮



很快的会到来，这种估计又过于乐观了。

第二，正是对形势的这种乐观的估计，促使毛泽东产生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的想法。应当说，毛泽东提出争取江西的一些理由还是比较实际的。但他只是想蒋介石可以争，桂系可以争，冯玉祥、阎锡山也准备争，红军已经具备了某些条件，为什么不能争呢！他没有想到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新军阀是不能允许代表工农利益的红色政权存在的，即或存在或发展了，他们也会联合起来加以消灭的。更何况是要“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头脑是有些发热了。

第三，信中虽然也有“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之建立，大区域产业支部之创造，是目前党在组织方面最大的任务”，“红军之创造与扩大，亦是帮助城市斗争”等语言，说明毛泽东此时还没有完全摆脱城市中心的思想，但此信的基本精神是强调了农村革命根据地斗争的重要性，认为同样是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条件，批评那种担心农民斗争超过工人的错误思想。毛泽东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实际出发，指出轻视农民革命的意见是错误的。正是立足于这一最基本的问题上，使毛泽东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不断前进。

红四军前委为了实现争取江西、兼及闽西的战略计划，决定红五军仍在井冈山地区，协同原地坚持斗争的部队，恢复和发展湘赣边苏区；红四军主力和江西红军独立第二第四团在瑞金、于都、赣州、兴国、宁都、吉安、永丰、乐安等县，发动和组织群众，消灭地主武装。1929年6月1



日，毛泽东给中央的报告中称：“我们五月一日退出汀州到瑞金，在瑞金零都赣州（东乡）宁都兴国五县作消灭反动武装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为四十五天，五月十五日再到瑞金，每到一县，每到一地，把队伍分散往各乡，往一乡的队伍再分小支，这样集中分散的容易于争取群众对付敌人之计兼发展不偏于一边。”<sup>①</sup>

报告中还说：“我们在宁都时东江特委曾有一信给我们，说东江准备暴动，要红军分兵去彼帮助，前委复了他们一信，说不赞成此时举行总暴动，此时只能发动游击战争，红军实不能分兵去助，因彼反动势力很大，且不能很远路线发兵，来到闽西时又去了一信，要他们作群众工作”，这说明毛泽东是审时度势的。经过一个半月的艰苦斗争，赣南苏区初步建立起来。

5月，蒋桂战争基本结束，国民党江西省主席朱培德下令以3个旅的兵力由赣州、泰和、临川向于都、兴国、宁都、瑞金推进，企图将红四军消灭于赣南地区。这时，闽西敌军力量薄弱，红四军前委为了避开赣敌进攻锋芒，立即推进闽西，因“闽西党有相当基础，群众也好，各县斗争日益发展，前途希望很大”，前委决定发展闽西的游击战争，创造革命根据地。红四军三打龙岩，连续胜利，闽西各界区普遍建立了工农兵政权和赤卫队，闽西苏区基本上

---

<sup>①</sup>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14册第221页。

建立起来。

这时，原来就存在于红四军领导人之间关于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和建军原则的不同认识，在中央2月9日来信以后又激化了。6月下旬，红四军在龙岩召开了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希图解决这些问题，由于领导人的认识未能统一，会议所作的决议对于一些具体问题的结论虽大部分是正确的，但涉及政治策略等重大原则问题未能正确解决。会后，毛泽东被迫离开了红四军领导岗位，到闽西协助指导地方工作。

红四军七大决议指出：1929年5月于都会议，“前委决定一年内夺取江西全省，这个政策是未曾对主观情形有很好的估量，是不对的。”

1929年9月28日，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也指出：“预定一年内夺取江西全省政权的决定，也是错误的”。

对于上述批评，毛泽东只接受了一年为期不对，而认为争取江西还是正确的。1930年1月，他在给林彪的信中说：“关于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也是去年四月前委向中央提出的，后来又在于都有一次决定”。一年“争取江西的话，不对的是规定一年为期。至于争取江西，除开江西的本身条件之外，还包含有全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条件。因为如果不相信革命高潮快要到来，便决不能得到一年争取江西的结论。那个建议的缺点就是不该规定为一年，因此，影响到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所谓‘快要’，也不免伴上了一些

急躁性。至于江西的主客观条件是很值得注意的。除主观条件如给中央信上所说外，客观条件现在可以明白指出的有三点：一是江西的经济主要是封建的经济，商业资产阶级势力较小，而地主的武装在南方各省中又比哪一省都弱。二是江西没有本省的军队，向来都是外省军队来此驻防。外来军队‘剿共’‘剿匪’，情形不熟，又远非本省军队那样关系切身，往往不很热心。三是距离帝国主义的影响比较远一点，不比广东接近香港，差不多什么都要受英国的支配。我们懂得了这三点，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江西的农村起义比哪一省都要普遍，红军游击队比哪一省都要多了。”<sup>①</sup>

毛泽东给林彪的信，对形势的估量上有些过于乐观，但他在对中国革命的探索上却比“四·五”复信时前进了一大步。这是由于赣南闽西根据地的开辟，其它根据地的建立，工农运动发展的不平衡，以及红四军七大以后红四军出击闽中、挺进东江的失利，促进毛泽东进一步考虑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和党的工作重心问题。在以什么工作为重心去促进中国革命高潮的问题上，他同红四军某些领导人以及党中央的认识上是有距离的。因此，红四军九大以后，他写了这封信。这封信说明毛泽东初步形成了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思想，表现在：

第一，当时全党都在探索促进革命高潮的途径。党中央是主张以城市工作为中心，加强工人运动，争取工人阶

---

<sup>①</sup> 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06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级的大多数，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再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夺取全国政权。毛泽东则强调以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并认为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显然是主张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农村。

第二，夺取全国政权主要依靠什么武装力量？党中央是主张象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那样，把罢工工人组成赤卫队，包括从国民党军队中起义或哗变的士兵，再加上农村的红军，显然，主力不是农村的红军。毛泽东则认为只有创造一支为建立和巩固农村根据地服务的工农红军，才能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毛泽东这里所说的“将来大革命”，我认为是指夺取全国政权。在中国的条件下，要夺取全国政权，没有一支经过长期武装斗争锻炼的人民的正规军队是不可能的。

第三，毛泽东指出那种主张象俄国革命那样，把“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这种理论“是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这就清楚地表明了只有走中国式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才适合中国国情。

根据以上三点我认为毛泽东此时已经摆脱了城市中心的思想，初步形成了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农村，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夺取全国政权的思想。他关于争取江西的战略计划显然也包括大城市南昌和九江，但他与党中央以城市为中心的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思想是有所不同的。



### 三、争取江西的实践

1930年1月，赣闽粤三省敌军以14个团的兵力对闽西我根据地实行第二次“会剿”。红四军前委决定就地击破敌人。当时的政治目标是“扩大闽西赤色区域，完成赣南闽西东江的赤色联系”，以闽敌或赣敌为主要作战对象。因此，前委和毛泽东率第二纵队在龙岩的小池准备阻击敌人，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一、三、四纵队从古田向连城开进，筹备给养。1月5日，朱德率部队刚到距古田50里的庙前时，江西敌军分别从长汀、上杭进到涂坊、旧县，准备进攻新泉、庙前；福建敌军由龙岩、坎市进到小池、灌阳地区，准备进攻古田；广东敌军已推进到永定、武平地区。1月6日，红四军主力到达连城，敌人跟踪向连城进攻，隔断了同前委和第二纵队的联系。红四军主力决定入江西。“我们到江西的政治目标，是打闽赣粤三省联军，扩大赣西南赤色区域”。<sup>①</sup>9日从连城出发，16日占领广昌。前委和毛泽东率第二纵队在小池地区给闽敌以打击后，从古田地区北进，经姑田、宁化、清流、归化县境，翻越武夷山进入江西，于1月下旬在广昌的东韶同主力会师。

红四军西进赣南时，蒋介石正加紧准备对阎锡山、冯玉祥的战争，敌军第七师已调往皖北，江西全省敌军只有第十二师、第十八师两个旅和五十师一个旅。这时，赣西、赣南地区的革命武装力量已大大增强。红五军主力在赣西

---

<sup>①</sup> 《红四军部队情况报告》（1929.7—1930.4）。

吉安、泰和地区，红六军也在这一地区的赣江两岸积极活动。在这一形势下，红四军前委认为：“蒋阎战争爆发在即，两广混战仍然相持，金贵银贱，蒋政府危机加重，军阀混战日益形扩大。遂决定要计划夺取江西全省，我们未接到中央指示，不知道全国工作布置，我们认为在目前局势中，全国有一省或两省首先胜利夺取政权的可能，在南方各省中，我们以为首先胜利的省分便是江西，江西的主客观条件都有这种可能。”<sup>①</sup>

1930年2月7日，红四军前委在吉安东南的陂头召开赣西、赣南特委和红军第四、五、六军军委联席会议（赣南特委未赶到）。会议认为革命高潮很快的到来，党和红军当前的主要任务是：猛烈扩大苏区和革命武装力量，深入土地革命，为夺取江西全省政权而斗争。会议根据赣西地区的敌情，决定集中兵力先打吉安。打吉安的第一步，是占领吉水、安福、泰和等县。会后，红四军经水南准备攻取吉水。

蒋介石得悉红军集中在吉安、泰和附近的赣江两岸，急令驻吉安的第五十师第一四八旅加强防御，并从武汉调独立第十五旅到江西，前锋已到永丰，调第十八师第五十四旅主力和第五十二旅一部在乐安、宜黄地区集中，令第十二师集中宁都地区。独立第十五旅于2月20日到达吉水县城和乌江镇之线。形势骤见严重，红四军前委认为不宜在

---

<sup>①</sup> 《红四军部队情况报告》（1929.7—1930.4）。

此作战，果断地放弃原定计划，决定不打吉水，诱敌深入到赤色区域消灭之，因此立即率部向富田退却。在富田的口号是：进攻敌人、消灭军阀混战、武装拥护苏联、建立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彻底分配土地、扩大工农武装、夺取江西全省政权。这时，敌独立第十五旅发现我军后撤；随即兵分三路，向红四军进逼，其左路两个营进至水南，右路两个营在直夏，中路两个营进至富滩。前委乘敌人兵力分散之机，集中兵力经一天激战，歼敌大部。这一胜利，促进了赣西南革命形势的发展。3月15日，赣西南特委组成，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同时成立。

打败了敌第十五旅后，红四军前委召开一扩大会议，“估计此时在政治上当然是北进好”，但是，敌人在吉水阻碍不能过河，在吉安扼险固守。红四军到了水南，又同赣西南特委开一联席会议，进一步分析了形势，认为向北的前途是取消了，向西的前途也是没有，只有向南与向东。讨论结果，决定采取由广昌入建宁的建议。部队经东周到兴国，探知金汉鼎全部入闽打卢兴邦，赣州空虚，遂决定乘虚攻取赣州。敌第十二师一个团和地主武装共数千人顽强固守，毛泽东在关山坪视察了情况，为避免陷入被动，决定主动撤出战斗。当晚，前委和红四军军委召开会议，计划下一步行动。有人主张向北走泰和、万安与红五军会合再打吉安，或打吉安不下，即由袁州出赣北入鄂南；有人主张到广东北江。大家认为，“我们还是在夺取江西的目标下进行工作好了”。因为向北虽然在政治上有很大影响，但



经济上无法解决；向南，广东的各种条件不及江西成熟。“最后大家决定，目前的蒋阎战争决不是马上可以结束，我们要夺取江西，应乘此时金汉鼎入闽之际，打通闽粤赣三省的赤色联系，把这一区域广泛地赤化起来，作为一个基础。遂决定在此目标之下，以3个月为期，分兵发动群众”，<sup>①</sup>开展游击战争。会后，前委于3月18日发了通告（第三号），提出“同时扩大，同时深入”、“伴着发展”的方针。认为只求扩大不求深入是严重的机会主义路线。根据过去斗争的经验，“红军到了这些县内，要有计划地帮助原有红色区域的党及群众去组织政权，建设武装，分配土地，加强党与团体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将原有区域扩大到全县，并扩广到邻县”，“在一定时间，指定区域内集中精力扩大这地区，同时即深入这地区，是很有效力的工作方法”。“伴着发展的工作路线从我们的经验中是显示工作效力的。伴着原有小块红色区域发展，及成立新的小块红色区域”，<sup>②</sup>即“凡有党或有一点小政权的地方，红军一去，配合起来，傍着这一块区域发展立刻大得成效，政权也建立了，土地也分配了，群众的武装也扩大了。尤其这一块分了田的政治影响深入群众，及这一块政权在敌人数次会剿之后不但不消灭，还继续扩大与发展，使群众更能认识他本身的力量，而奋勇的斗争起来，更便利更有实效地扩大

---

① 《红四军部队情况报告》（1929.7—1930.4）。

② 《前委通告》（第三号），1930年3月18日。



赤色区域，达到我们的任务”，“傍着发展有成效，流动游击只徒劳”。<sup>①</sup>红四军在这一方针指导下，至1930年6月上旬共消灭敌正规军与靖卫团1000多人，同时帮助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建立武装，分配土地，进行根据地建设，使寻乌、安远、于都等县苏区连成一片。6月初，红四军进入闽石，占领武平、长汀城，为尔后形成中央苏区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上述史实说明，毛泽东在1930年初，由于对形势估计过于乐观，不仅明确地把争取江西全省政权做为红四军主要任务提出来了，并且也有过北攻南昌的打算和南攻赣州的举动。但是，一旦形势不允许，他还是审时度势，注意从实际出发，还是坚持赣南闽西的斗争。其着眼点是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而不是单纯地为着夺取大城市。他的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思想同中央以夺取大城市为中心的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思想基础是不相同的。

1930年6月11日，党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主持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标志着“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取得了统治地位。决议认为“没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的胜利”，并提出“布置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首先胜利”，作为“目前党的策略总路线”；要求红军“坚决进攻打击敌人的主力，向着主要城市与交通道路发展”，进而“与主要城

---

<sup>①</sup> 《红四军部队情况报告》（1929.7—1930.4）。

市的武装暴动配合，夺取政权，建立全国革命政权”。为此，要求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

接着，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又制定了以夺取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计划规定赣西南、赣东北和闽西地区的红军以主力侧击南浔路，取南昌，攻九江，夺取整个江西，以切断长江；然后与其他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毛泽东此时虽然并未放弃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思想，但他总结了3月攻打赣州的经验，不赞成此时进攻中心城市的错误方针，这从1930年6月15日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信可以说明。信中说：“（一）中央过去曾经屡次把新的路线传递给你们，写了几次信，同时又委托蔡申熙同志口头传递，虽然我们的信都比较简单，蔡同志口头传达又不充分，但完全都是根据中央的路线，可是这一个路线，直到现在你们还完全没有懂得，还是在固执你们过去的路线。（二）你们固执过去的路线，主要的原因是你们没有了解整个革命形势的转变。这的确也难怪你们，因为你们处境太偏僻了。现在整个形势都有极大的不同……显示了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革命形势正在成熟，在革命成熟复兴的时候，任什么一个问题，都有可能爆发一个革命高潮，因此争取全国革命胜利的任务，已经摆在我们的前面了。目前党的中心策略——组织政治罢工，组织地方暴动，组织兵士暴动，就是针对这一个革命形势，极力促进各种革命势力汇合的总暴动，争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三）党对

于红军的策略，亦完全是针对着这一个形势。现在红军的任务，不是隐于农村中作游击战争，它应当积极进攻，争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四）我们过去对于四军的指示，完全是基于革命形势的转变，与中央对红军的新的策略的基础。你们因为没有了解现在革命的形势，所以不能明白中央的指示。你们过去的路线是对的，的确也获得了成功，但是你们在今天还固执过去的路线，完全是错误了！因为革命形势已经转变。同时你们过去也有错误，这些错误在今天表现着尤为严重：你们现在完全反映着农民意识，在政治上表现出来机会主义的错误。”你们的错误：（一）站在农民的观点上来做土地革命，如像你们认为：‘农村工作是第一步，城市工作是第二步’的理论，你们甚至机械的认为只有把武装分配给农民以及红军在农村杀尽土豪劣绅，才能保证土地革命的胜利，你们没有懂得，现在土地革命已走入更高的阶段——准备夺取全国胜利的时期，土地革命的彻底完成，只有推翻豪绅资产阶级国民党的统治才有可能，你们因为反映了农民意识，所以忘却了这一真理。（二）你们的割据观点，这同样是一个农民观点，如像你们认为先完成三省边境割据再打南昌，你们认为打南昌以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理由是：一，江西资产阶级比较全国弱；二，江西没有当地军阀；三、不与帝国主义直接冲突；你们提出打南昌与中央指出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立场，完全不同。你们的意见是错误，尤其是你们打南昌的理由，更包括着严重的错误。（三）你们对于资产阶级更完全是一



种机会主义的路线，如你们提出保护大小商人的口号，以及不强迫缴商团的武装，这完全是武汉时代的机会主义的残留，你们应当完全站在阶级利益上来转变这一个策略……（四）你们对于帝国主义更是机会主义的观点，你们非常怕帝国主义，所以过去我们指示你们到东江，你们说东江帝国〔主义〕力量大，中央指示你们应当准备争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向南昌发展，争取武汉的胜利，你们说武汉帝国主义力量大，不可能。你们完全没有懂得，现在国际形势与一九二七年国际形势完全不同……（五）你们应当深刻的了解自己的错误，按照中央的指示转变你们今后的路线。你们一定要坚决地猛烈的扩大红军。要决心歼灭军阀力量。但在这里我们还申明一句，我们现在所提出向中心城市与交通区域进攻的战略，与你们过去有的同志主张打大城市的理论完全不同的。中央新的路线到达四军后，前委须坚决按照这个新的路线转变，四军的路线转变对于全国有极大的意义，希望四军能坚决的执行，如果前委有谁不同意的，应即来中央解决。”<sup>①</sup>

这封信虽然毛泽东、朱德等没有及时收到，但6月9日中央特派员涂振农在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了中央的指令：不同意也必须坚决执行。当时，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红一军团（此时红军第四军、第六军和第十二军合编

---

<sup>①</sup>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100—103页，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



为第一军团)夺取南昌、九江,毛泽东根据实际情况作了灵活处理。毛泽东、朱德率领红一军团从长汀出发,并没有直接去打南昌,而是经广昌,到了兴国。7月11日,红一军团总部发布命令:“进略樟树,窥袭南昌,以响应武汉工人暴动”,24日攻占樟树镇。这时敌十八师加强了南昌的守备,并准备进犯樟树镇。口号是口号,实际则不然。毛泽东、朱德认为此时红军不宜攻南昌,遂率部队西渡赣江,于30日进到南昌对岸的万寿宫、生米街地区。8月1日,他们派出两个纵队攻击牛行车站,隔江向南昌鸣枪示威,以纪念南昌起义3周年。随后,率一军团转到安义、奉新地区休整待机,同时进行筹款和发动群众的工作,这就避免了强攻南昌、九江可能遭到的损失。

“此时报载何键向五军前进”,<sup>①</sup>为了消灭敌人,援助红三军团,红一军团决定从江西安义、奉新地区西进。西进湖南,这反映毛泽东的头脑发热了。8月3日,一军团总部于奉新发布的训令中说:“南昌之敌仍守防御工事中,尚不敢向我前进,湖南何键部于7月17日由长沙向平江移动;有对我第五军前进之势,武汉白军悉数北上参加蒋阎战争”,“本军团以绝对急进攻击敌人之精神,决先取浏阳,进略长沙,以威胁武汉”。8月19日,毛泽东在给赣西南特委转闽西特委并转中央的信中也说:“我军为达到消灭敌人援助五军,开展湘鄂赣之交大局计,乃决定去浏阳击敌,直

---

① 《毛泽东给赣西南特委转闽西特委并转中央信》。

取长沙，由株萍路回师袭击赣敌（我们此时预计敌兵已集中向我），夺取吉安，再回南浔，进取武汉”。毛泽东错估形势，准备直取长沙之后，回师夺取南昌、九江，然后进攻武汉，于是才有二打长沙之举。从8月底到9月11日，敌人除在9月3日以第三十一师由猴子石等地出击，被我军歼灭两个多团外，其主力始终没有脱离坚固阵地。其间，红一方面军（8月23日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在浏阳永和市会师时组成第一方面军，朱德为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和总前委书记）曾两度攻击长沙，均未奏效。总前委决定全军于9月12日撤长沙之围，转到株州，同时发布命令：要以“最火速最勇敢地夺取南昌、南浔路以至湖口，消灭鲁涤平及江西反动统治，截断长江，向右进攻南京，向左保证夺取武汉。”并决定以第一军团攻取吉安，三军团攻取峡江、新淦。二打长沙的战役停止了。

9月17日，毛泽东于醴陵给中央的报告中分析了二打长沙不克的原因有三：“一是未能消灭敌人主力于打工事之前……因此敌有余力守城；二是群众条件不具备，城内无工人暴动，无士兵暴动以为响应；三是技术条件不具备，敌之工事是欧式的重层配备，铁丝网、壕沟等计八、九层，我们只有肉搏没有重炮破坏之工事，交通器具如无线电等我们也没有，以至两个军团联络不好。以上三点以第一点为主要原因。”报告在总结了二打长沙的经验教训之后，也给中央提出了意见，指出：“夺取武汉是全国性质的阶级大战，若没有全国尤其是湘鄂赣等省的革命条件，则夺取武汉很

难持续与扩大。”报告中毛泽东重申了他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思想：“第一军团的任务是夺取南昌、九江，占领南浔铁路，建立江西政权及全国性政权。”具体的部署是：“第一军团应扩大数量到十二万以上，目前应迅速的攻下吉安，引导赣西南千百万革命群众，从樟树、抚州两路向南昌、九江前进，第十军应出湖口马当，第二十二军应出抚州、丰城，第二十军应出樟树、临江，向南昌包围前进，二、三两个军则以一个军团占领南浔路直取九江，以一个军团攻南昌，第三军团在江西工作一个时期后再去湖南或湖北。”9月29日，中共中央长江局代表周以栗到达袁州，带来了中央长江局要红一方面军回过头去再攻长沙的指示。总前委又举行会议，详细讨论一番，经毛泽东再三说服，周以栗终于同意了总前委的决策。于是，一、三军团于9月底由袁州分别向吉安、清江开进。

10月4日，红一军团进占吉安城，建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补充新兵，筹措给养，做群众工作。10月14日，毛泽东在给中央的信中过高地评价了吉安的胜利，他认为：“吉安暴动的胜利，无疑地是赣西南豪绅军阀国民党统治的最后消灭，赣西南地方暴动的完成，是江西全省首先胜利的开始”，“一军团三、四两军、十二军总部与五、八军会合，即行占南浔路进攻南昌，在那一带将有大规模决战。”同日，红一军团按计划移师北进，17日抵达峡江。总前委召开了全体会议，讨论了形势、行动方针、土地革命、对于资本家的政策等问题。毛泽东给湘东特委的信报告了会



议情况。信中说：“对于时局，我们认为统治阶级的军阀混战，暂时绝不能调和停顿，但也不会继续扩大到底。这就是说，中国革命形势日益吃紧的条件之下，反动统治阶级中的任何一派都觉得需要来一个改良主义的政纲。但这改良主义政权的领导问题，决不能用和平的方法解决。最近的将来军阀战争必有一场惨酷的爆发。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不能离开阶级立场来分析，以为军阀混战会扩大下去，继续到底。要知道阶级矛盾超过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时，反动统治阶级必联合起来进攻革命。但是，我们决不容悲观，因为这是革命高潮的表现。所以我们的任务是要在反动统治阶级争取改良主义的领导权未解决之前，来一个一省首先胜利，继续此胜利之发生与扩大，来冲破消灭反革命的联合进攻。我们目前的行动，是前去占领南浔铁路。进攻南昌、九江消灭敌人。”

10月下旬，红一方面军进到新余地区，同红三军团靠拢。这时，毛泽东进一步分析了形势，总前委讨论决定停止进攻南昌、九江的原计划。红军第一方面军10月24日发布的命令中称：红军要“有计划有配合有步骤的夺取南昌、九江争取江西全省胜利之任务，决先在袁水与瑞州河间布置工作”，将部队部署在清江至分宜段的袁水两岸地区，以战备姿态开展群众工作和筹措给养。决定停止进攻南昌、九江，这对下一步顺利转入反对敌人第一次“围剿”作战有重要意义。

1930年10月间，蒋介石在取得对冯玉祥、阎锡山战争



的胜利之后，即调转兵力，组织对红军和苏区的大规模的“围剿”，并把重点放在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20日前后，准备“围剿”红一方面军的敌军大部进入江西境内。这时，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查明敌人情况后，同江西省行委讨论如何粉碎敌人的战略方针问题。讨论中，有的主张仍按中央和军委8月初的指示，进攻南昌、九江，以迫使敌人转入防御，放弃其“围剿”计划。毛泽东认为，在红军和苏区还不巩固的情况下，红军应先向苏区内退却，依靠苏区人民的支援和有利的地形条件，发现和造成敌人的弱点，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变化，然后集中兵力实行反攻，各个歼灭敌人于运动中，以粉碎敌人的“围剿”，即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10月26日，总前委在罗坊召开了会议，通过了《红一方面军前委会、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的指示》。决议对当时形势估计仍过于乐观，认为“长沙的占领与继续严重的进攻，一、三军团的汇合与吉安主要城市的夺取，这一红军势力的猛力发展，配合全国各主要城市无产阶级尖锐斗争，农村中苏维埃的发展，已使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形成总的爆发，特别是吉安的夺取是完成赣西南数百万有组织的群众，二十余县苏维埃政权最有群众最有基础的暴动。吉安胜利就是江西一省胜利的开始。”根据对形势的乐观估计，又提出红一方面军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要求。决议指出：“在争取武汉的中心附近省区首先胜利的前提下，目前应争取江西胜利继续实现武汉的胜利。江

西胜利，自然决不能离开全国革命高潮，不过在江西本身说来，这种条件有更多的可能，江西有六十余县的苏维埃区域，农民暴动已成为普遍的革命高潮，一、三军团的汇合与红军第十军向鄱阳湖口的继续进攻，特别是最近吉安夺取，是汇合一切革命势力，成为夺取南昌严重的威迫形势。江西地主资产阶级在农村中的经济基础，大都破坏干净，而且在革命形势日益发展威迫之下，更促进其动摇崩溃”，“而且在长期混战之余，士兵极端疲惫动摇，只要我们加紧政治上组织上的领导，无疑的可以消灭敌人进攻的主力。所以江西党与一方面军的任务，无疑的是配合江西群众有计划的有布置的实行阶级决战，坚决争取江西首先胜利。”要争取江西首先胜利，决议认为一方面军和江西党必须做好以下五个方面的工作：1、加紧反对军阀压迫革命与武装暴动夺取江西政权的宣传鼓动。2、建立南昌、九江、南浔路的工作，无产阶级的暴动在今日成为争取主要城市、不可缺少的主要力量。3、完成地方暴动：首先应将赣西安福、太和、新余、分宜、袁州，赣东吉水、永丰、乐安、新干，赣南的赣州等县的地方暴动完成，把所有的赤色区域联合起来。4、动员广泛群众参战扩大苏维埃。5、加紧白军士兵运动，发动士兵的阶级觉悟，组织士兵暴动。决议虽然对当时形势估计过于乐观，继续坚持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方针，但根据以往进攻城市的经验教训，提出必须完成上述5项任务才能实现江西首先胜利，这比之两个月前是冷静多了。

特别是决议提出反对争取一省政权的游击路线问题，是毛泽东关于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决议指出，争取江西一省政权，“必须转变过去红军游击时代所留下的游击路线——就是由单纯军事观点发生的轻装袭击路线。这一路线由于对军阀混战估量不正确，不了解争取一省胜利是阶级决战的工作。因而走到离开群众，不注意争取群众，建立群众工作，不注意扩大红军与加强红军的力量。在军事技术上仍专门利用游击方式，不懂得阶级决战时所必须准备的条件。单纯的轻装袭击（这里所讲的袭击，是指争取一省的战略路线，不是反对军事战术上的袭击），结果表面上似为坚决进攻的左倾路线，但实际上延缓了革命首先胜利的到来”，二打长沙“因为仍然缺乏群众条件与敌方士兵的配合，成为单纯的红军的攻坚。所以猛攻半月不能胜利。吉安就在相反的条件之下，有了广大群众基础，所以就能真正的夺取。”“目前在敌人大举增兵与南昌、九江固守工事的形势之下，单凭红军轻袭南昌、九江，而且红军相当给养都不具备，运输条件十分缺乏。这无疑的要成为游击的进攻，结果攻不下，又转而他往，反使一省胜利延期实现。所以这一轻装袭击的游击观点与争取一省首先胜利有计划的有布置的战略绝不相容，应加以严重的纠正。”这里明确指出了由于敌我力量的对比，形势与条件的限制，红军当时不能贸然进攻南昌、九江，必须扎扎实实地作好争取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的工作。决议还论述了战略与战术的关系，指出：“战略是依客观形势



与主观力量而决定，战术是依据当时各种实际条件运用一切手段，以达到战略的实现，因而战术在不违背战略之下，是时常可以转变的。在夺取南昌的任务下面，首先争取吉安，这一战略是非常正确，就不应简单机械地说本是打南昌，为什么打吉安？又如战略是确定占领南浔路，在战术上，或采取一直袭入或在赣江两岸适当地点消灭敌人主力，再行进占，这都归并于当时主客观两方实际条件，不能一定拘泥，这在红军下级干部及士兵群众尤要使之明了，否则群众只知道总目标，亦有因战略与战术上的变化，便怀疑动摇起来，甚至要使上级指导机关迁就群众的落后意识，妨碍战略战术的活泼运用”。<sup>①</sup> 这就是说，战略上要争取江西首先胜利，要进攻南昌、九江，但在战术上要灵活运用，不具备进攻南昌、九江的条件，就不应冒险进攻。因此，决议最后把红一方面军目前的工作规定为：A、目前的战略是在占领南浔路占领南昌九江的总目标之下，继续吉安的胜利，争取进一步的胜利，即在吉安南昌之间一带地区发动广大的群众，筹措给养，同时加紧后方的群众调动与给养筹措，准备与敌人作大规模的决战，消灭敌人主力，实现全省胜利。B、加强军队中政治训练，目前应集中实行阶级决战，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政治鼓动，以提高官兵斗争的决心。C、加强实用的军事训练，成为创造红军铁军的严重

---

<sup>①</sup>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6册第182—185页。



工作之一。这三项任务的规定是比较实际的。30日，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即主力红军全部东渡赣江，在苏区幅员较大、地形对我有利、群众条件又好、又便于以后发展的赣江以东地区作战。

罗坊会议以后，红一方面军即全力投入紧张的反“围剿”准备工作。如何粉碎敌人大规模的“围剿”，巩固现有苏区，已成为党和红军的当务之急。“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口号显然是不实际了，因此，在三次反“围剿”作战中，总前委的文件中再没有作为奋斗目标提出这个口号。

#### 四、“争取江西首先胜利”口号的放弃

1931年1月，在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正确方针指导下，红一方面军在中央苏区广大群众支援下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2月，蒋介石又调动20万兵力，组织对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进行第二次大规模“围剿”。这时，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派代表项英到达中央苏区，根据中央决定，于1月15日撤销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成立了中共苏区中央局，项英任代理书记。同时成立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任主席，朱德任副主席兼第一方面军总司令，毛泽东任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和第一方面军政治委员。

对于如何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问题，苏区中央局内部意见是不一致的。毛泽东坚决主张继续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把敌人引进苏区内，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苏区中央局经过多次讨论，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1931年3月20

日，关于如何粉碎敌人这次“围剿”问题，毛泽东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名义发表了通令。通令也提到了争取一省几省首先胜利的问题，但已经不是作为行动口号，而是作为贯彻中央的口号提出来的。通令指出：“一次围剿以来敌人是一种攻势，我们在大体上说始终是一种守势”，“因此，转变攻守形势，成为二次战争的中心任务。必须取得比龙冈更大的胜利，使敌人退守中心城市，我们才能彻底解决苏区的巩固问题，广大的发展一步。只有苏区有了切实的巩固，有了广大发展，才能使红军得到进一步扩大与精练的形势下，才能给全国政治局面一个大的影响”，只有“斗争实质的加深，斗争范围的推广，扩大旧有的红色区域与红军，创造新的红色区域与红军，使革命发展在全国内更加扩大起来，由此去争取一省几省首先胜利，以至于发展到全国的胜利”。经过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教训和反“围剿”战争胜利的经验，毛泽东进一步强调只有红军的扩大，农村根据地的巩固与扩大，才能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以至全国的胜利。这里，毛泽东实际上放弃了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思想。因为实践已经证明，在全国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即或江西革命条件较好，红军也不可能夺取南昌、九江这样的城市。红军必须从实际出发，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广大农村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并不断向外发展，形成对中心城市的包围。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了他的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思想。

以王明为首的“左”倾中央多次提出夺取中心城市，争

取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冒险主张。1932年1月9日，临时中央作出了《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从此以后，以毛泽东个人署名的文件，或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名义，或以周、毛、朱、王（即苏区中央局成员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名义发的电报中，也有过“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实现江西首先胜利”的提法或口号，但这些已经不是毛泽东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原意，而是照抄临时中央的口号了。

综上所述，我认为1927至1928年毛泽东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同党中央提出的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思想，没有直接的联系，毛泽东此时还未有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思想；1929年4月，毛泽东提出了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设想，历史证明亦未能实现。但他同当时中央以城市为中心的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思想还是有区别的，不能简单地视为等同。1930年初至罗坊会议之间，毛泽东也曾经头脑发热，为争取江西首先胜利而奋斗过，但一旦感到条件不成熟，他能审时度势，避免损失，亦不能同李立三为首的“左”倾冒险主义相提并论。

# 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

邓 礼 峰

1962年，印度政府坚持侵略扩张政策，蓄意制造边界紧张局势，大肆蚕食侵占中国领土，中国边防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进行自卫反击。这次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是新中国成立后在我国发生的第一个反侵略战争。它融军事、政治和外交斗争为一体，充分反映了边境地区反侵略战争的特点和规律，创造了我军在高山密林高原严寒地区作战的光辉范例，取得了军民共同保卫边疆的宝贵经验，为毛泽东军事思想增添了新的内容。值此作战胜利30周年之际，全面客观地介绍这场战争的起因和经过，对于总结其经验，进行国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

## 印度政府继承与扩大英帝的 衣钵，挑起边境冲突

中印边界全长约1700公里，习惯上分为东、中、西三段：东段，长约650公里，从中国、印度、缅甸三国交界处至中国、印度、不丹三国交界处的底宛格里；中段，长



约 400 公里，从西藏普兰县的中国、印度、尼泊尔三国交界处至札达县的 6795 高地；西段，长约 650 公里，从札达县的 6795 高地至新疆的喀喇昆仑山口。整个边界从来没有正式划定过，但根据双方历史行政管辖所及，形成了一条传统习惯边界线，东段是沿喜马拉雅山脉南麓，中段是沿喜马拉雅山脉，西段是沿喀喇昆仑山脉。中印边境战争的爆发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复杂的背景。

### 一、英国种下中印边界纠纷的祸根

西藏、新疆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与印度在历史上有着长期的交往和传统友谊，过去中印两国的地图均按照传统习惯线标画边界，两国人民亦遵守这条传统习惯线。只是在英帝国主义统治了印度以后，英属印度当局以印度为基地，把侵略扩张的矛头指向中国的西南和西北边疆地区，这才逐步使中印边界发生了分歧。英印政府利用中印边界从未正式划定的状况，对中国西藏和新疆进行侵略扩张活动，从而埋下了争执的种子。

1911 年，中国发生辛亥革命，西藏地方处于混乱的局面，英国殖民主义者认为这是向中印边界东段——从阿萨姆平原的边缘向喜马拉雅山进行侵略扩张的大好机会。于是，英印政府除了派遣“讨伐队”向中国这部分地区的部落种族进行武力镇压、金钱引诱以及所谓订立契约外，还派大批测量探险队，化装成僧人、商人、探险旅行者，窜入西藏东南部中印边境地区，偷偷地进行大量的侦察、测绘（偷测）等活动，为英印政府外务大臣麦克马洪画一条侵占

中国西藏大片领土的所谓印藏边界线作技术上的准备。

1914年3月，英国侵略者为了实现其侵略企图，施展阴谋手段，趁“西姆拉会议”之机，<sup>①</sup>英国代表麦克马洪及其助手贝尔诱惑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夏扎，背着中国中央政府代表在德里进行私下秘密交易。麦克马洪等人以赠给西藏5000支枪、50万发子弹，支持西藏“独立”，帮助西藏赶走汉军等条件为诱饵，胁迫夏扎在秘密换文上签字，骗夺中国9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1914年3月24日，麦克马洪在德里交给夏扎秘密换文，换文的附件以粗略红线划了一条划分印藏边界东段边界线的地图，要求夏扎在上面签字盖印。麦克马洪在换文中，对此图既没有文字上的描述，也没有说明是依据什么原则、条件画出的，而仅标划在比例尺为1英寸等于8英里的地图上。当夏扎在签字时，表现推委、迟疑不决时，贝尔马上变了脸色，发脾气。夏扎在威胁利诱之下，在“麦线”图上签字。牛津大学高级研究员内维尔·马克斯韦尔曾指出：所谓“麦克马洪线”，“是1914年西藏一个代表团与印度政府外交秘书亨利·麦克马洪爵士在德里所作的一桩未经授权的秘密交易的产物，麦克马洪以威逼利诱（表示愿意支持西藏反对中国中央政府）的手段，说服西藏人同意了一种边界线的划法——

---

<sup>①</sup> 英国趁辛亥革命鼎革之际，策划中、英、藏三方会议，于1913年10月至1914年7月在印度北部西姆拉召开，企图把西藏从中国领土分裂出去，由于中央政府代表未在正式条约上签字，英国阴谋未能得逞。

把边界线向北推移了大约一百公里。”<sup>①</sup> 麦克马洪划的这条粗略红线，西起不丹边境，向东伸延至西藏察隅。其范围包括西藏东南之门隅、珞瑜和下察隅三大地区，把历史上长期属于中国的 9 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约等于我国的浙江省，有着丰富的矿产、生物和水利资源）划归英属印度。划定后的印度东北边界，就从喜马拉雅山足向北推到了喜马拉雅山的山脊。对于这条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中国历届政府从未承认。后来，英国给西藏提出的两个承诺并未能实现，因此西藏地方政府对“麦线”也不承认。英国知道炮制这条“麦线”的非法性，所以英国政府长期对此保密，不敢公开。然而，英国侵略者既作贼心虚，又贪婪成性，在时隔 20 多年后，于 1938 年又故态复萌，干起偷偷摸摸的不光彩勾当来。他们采取伪造证据、偷梁换柱的手法，重新出版 1929 年出版的《艾奇逊条约集》第 14 卷，篡改该卷中关于西姆拉会议的原始记录，伪造有关“麦线”内容，塞进该卷的西姆拉会议内容之中，重新出版该卷，而出版日期仍用 1929 年原版日期。这样，1938 年印刷的标明 1929 年出版的《艾奇逊条约集》第 14 卷伪本中，出现了“麦线”秘密的非法文件。伪版本出版后，英印政府即下令把 1929 年的原版本大量销毁了。与此同时，英印政府在出版《西藏高原与周围国家的地图》中，第一次改变过去同中国主张的传统习惯边界线相同的画法，用“未经标定”的

---

<sup>①</sup> 1987 年 5 月英国《南方》月刊，载《中国藏学》1989 年第 2 期。



符号，画出了“麦克马洪线”。这样，臭名昭著的“麦克马洪线”就炮制出来了。由此可见，“麦线”是非法的，无效的，但从此埋下了中印边境东段争端的祸根。

在中印边境西段，1846年英国吞并查谟——克什米尔后，声称拉达克（原本属中国西藏地方政府管辖的地区），是克什米尔的一部分，应归英印政府统治。在未等清朝政府同意的情况下，便悄悄占领拉达克地区。后来，在标定拉达克和西藏的边界中，英国侵略者为了寻找一条侵略我国新疆腹地的捷径，于1865年派遣印度测量局官员约翰逊潜入新疆南疆地区，通过“勘察”，绘制地图，把阿克赛钦、羌臣摩河谷及喀喇昆仑山以北广大地区划入英属印度的克什米尔版图，即所谓“约翰逊线”。阿克赛钦是中国的领土，中国政府从不承认该线。英印政府的势力从未进入该地区，也未在该地区行使权力或建立行政机构。

英帝国主义在中印边境东段秘密炮制的所谓“麦克马洪线”，在西段围绕所谓阿克赛钦问题提出的边界方案，是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和新疆的产物。正如周恩来指出的：“英国企图抹煞中印之间长期形成的传统习惯线，用割裂中国领土、扩大英属印度领土的办法，来达到它的帝国主义的侵略目的。”

## 二、印度政府继承与扩大英帝的衣钵，挑起边境冲突

1947年印度获得独立后，印度政府不仅要中国政府承认旧中国历届政府都没有承认的英属印度当局对中印边界非法、无效的划分，而且进一步侵占我国政府管辖下的中



国领土，企图通过武力手段把极不合理的大片领土要求强加于中国。

印度独立后，西藏地方政府认为印度脱离了英国的管辖，西藏同样也应从英国侵占的特权下摆脱出来。为此，西藏地方政府与印度驻拉萨“代表处”进行了交涉。对西藏地方政府的合理要求，印度政府却以大国主义的傲慢态度宣布，它就是要继承英帝的衣钵。英国侵略者虽然炮制了“麦线”，但好长时间未敢侵入中印传统习惯线以北和非法的“麦线”以南地区，只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趁中国处于抗日战争困难时期，乘人之危派兵侵占了这个地区的一小部分，如瓦弄、噶拉塘等。印度独立后，印度当局不仅继承了殖民主义者对中国领土的侵占，而且还对中国领土进行新的蚕食，逐步向“麦线”推进。1951年2月，印度政府乘新中国成立之初忙于内务与抗美援朝战争，无暇顾及中印边界问题之机，派兵100余名越过西山口、达旺河，侵占门隅首府达旺，强迫一直在那里行使管辖权力的中国西藏地方政府搬出；印军在侵占达旺前后，还侵占了“麦线”以南门隅的马果等地。10月，印军一部又在直升飞机的配合下，侵占了上珞瑜的巴恰西仁地方，在梅楚卡等地强行建立兵营。西藏解放后，印军继续向传统习惯线以北、“麦线”以南各地开进，遭到当地居民的抵抗。1953年阿萨姆邦的印军一个来福敌连共70余名官兵，逆苏班西里河西而上，侵入塔吉村时，被埋伏在丛林中的珞巴族居民用弓箭将其全部射杀。到1953年，印军基本上侵占了门

隅、珞瑜、下察隅各地。在此基础上，印度政府于1954年在已被和即将被其侵占的“麦线”以南、传统习惯线以北9万平方公里的我国领土上，建立起它的“东北边境特区”，并修改官方地图，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原来一直标明的“未经标定边界”第一次改标为“已定界”，企图使其侵占的中国领土固定化、合法化。然而，印度军政人员自知“麦线”不合法而感到心虚。1955年4月6日，侵驻下察隅的印度官员发出一份绝密文件称：“我奉命通知，今后‘麦克马洪线’一词和‘边境线’的说法应停止使用，……‘麦克马洪线’的提法，应立即用‘东北边境’一说代替。”此后，印军又越过“麦线”向北推进，侵占了西藏的兼则马尼等地。

中印边境中段，印军除了占领英国殖民主义者侵占的桑、葱沙两地外，1954年又侵占了香扎、拉不底、乌热三地；1955年侵占了波林三多；1957年侵占了什布奇山口及附近的一块草地；1958年又侵占了巨哇、曲惹两地。这样，印方在中印边境中段共侵占我国约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

中印边境西段，1951年前后，印军趁我军刚进入阿里地区之机，侵占了爱尼山口以东的卖争拿马和碟木卓克附近约450平方公里的土地；1954年以后，印军又侵占了巴里加斯。

尽管印度在边境上对我国领土步步蚕食、侵占，我外交部也向印方提出过多次交涉、抗议，但由于我国坚持通过和平谈判解决有争议的边界的方针，所以，从1951年到

1958年间，中印边境地区基本上是平静的。

1959年3月，我国在西藏所取得的平叛、改革的胜利，打掉了中外反动势力阴谋制造“西藏独立”的社会基础，使印度幻想的“缓冲国”的企图破灭。于是，印度政府蓄意向我国挑起边境争端，制造边境紧张局势，使中印关系严重恶化。1959年3月22日，即西藏反动上层在拉萨发动的武装叛乱被我平息，拉萨战役结束的当天，印度总理尼赫鲁正式给中国总理周恩来写信，提出了大片领土要求。尼赫鲁不仅要求将已被其非法占领的东段边境“麦克马洪线”以南9万平方公里和中段边境2000平方公里的我国领土划入印度，还要把西段边境一直在我国政府有效管辖下的阿克赛钦等地区33000多平方公里的领土也划归印度。在1950年至1951年我军进军阿里、1956年至1957年我国在阿克赛钦地区修筑新藏公路时，印度政府并没有提出异议。但这时印方却说该区属于他们，并硬说我国“侵占了印度领土”。尼赫鲁无理要求的中国领土总面积约有12.5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福建省的面积。

印度当局在其无理要求遭到中国政府的拒绝后，继续推行“前进政策”，使用武力片面改变业已形成的边界状况，并不断制造流血事件。

在东段，印度派兵越过“麦线”，于1959年4月25日侵占了该线以北的朗久；4月28日侵占了塔马墩；8月13日侵占了兼则马尼（沙则），并在这些地区建立了哨所。接着，8月25日印军挑起朗久事件，向我驻朗久附近的工作队



开枪射击，在印军遭我还击2人毙命后，于27日仓皇撤退。

在西段，1959年10月20日，印军3人在空喀山口非法越境侦察，遭我边防巡逻队扣押后，60多名印军于21日越境围攻我巡逻队，我被迫还击，双方互有伤亡。在我击毙印军9人，俘7名后，印军余部狼狈逃窜。这就是空喀山口事件。

印度政府借朗久、空喀山口两次事件，掀起反华浪潮，配合当时联合国在辩论“西藏问题”时对我国的诬蔑。从1961年到1962年9月，印军先后在西段边境的我国领土上建立了43个入侵据点，侵占我国领土4000平方公里。这些据点，有的距我军哨所仅几米远，有的甚至建在我军哨所的后侧，切断了我哨所的后路。西段形成了印军入侵据点和我军边防哨所犬牙交错的对峙状态。在东段，1962年6月，印军又越过“麦线”，侵入西藏山南地区错那县的克节朗河谷，在扯冬地方建立了入侵据点，企图改变“麦线”走向，以线北约11公里的拉则山（印方称“塔克拉山”）脊作为边界。9月17日至19日，印军30余人向择绕桥头我军哨位疯狂挑衅，以刺刀、步枪、冲锋枪逼我执勤战士后撤。对峙至20日，印军终于首先开枪，打死我军干部1人，打伤战士1人，我被迫还击。双方交火至29日，我择绕桥头哨位主动后撤。印军得意忘形，得寸进尺。10月8日，印军越过克节朗河，于10日进攻我军各哨所。到20日前，共打死打伤我军边防干部战士47人。在西段边境，印军不断包围我巡逻小组，伏击我运输人员，射击我



哨所。印军飞机频繁侵犯中国领空，在 1959 年至 1961 年的 3 年间，入侵进行军事侦察活动就达 120 余架次。

## 中国政府被迫作出自卫反击的决定

中国政府以亚洲和平和中印友谊为重，对印度的武装侵占活动一直采取克制忍让态度，并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 一、周恩来总理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作了长期不懈的努力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奉行同世界各国特别是同邻国和平共处的原则，与邻国之间边界问题的处理，既照顾过去的历史，又照顾已形成的实际情况，通过友好协商，互谅互让，公平合理地解决。据此，中国同缅甸、尼泊尔等国顺利地解决了边界问题。

鉴于中印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和中国西藏地方与印度在宗教及商业上的紧密联系，中国政府争取印度的友好合作是极为重要的。1952 年 6 月 14 日，周恩来在中国已完成和平解放西藏的任务后，针对印度政府历次来的照会中所提它在西藏的各种“权益”，向印度驻中国大使潘尼迦就中国处理印度与中国西藏之间的关系问题，提出了一个原则和一项措施。周总理指出：“对于印度在中国西藏的关系的现存状况是英国过去侵略中国过程中遗留下来的痕迹，对于这一切，新的印度政府是没有责任的。英国政府与旧中

国政府缔结不平等条约而产生的特权，现在已不复存在。因此，新中国与印度在西藏的关系，通过协商重新建立起来。”1953年12月，周总理在接见中印两国代表团谈话时提出了互相尊重主权与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他说：发展两国友好关系，商谈印度与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谋求解决那些业已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也应该按照这些原则进行。印度代表团对这五项原则表示完全赞同。

对于1959年3月22日尼赫鲁在信中向中国提出大片领土要求的问题，1959年9月8日周恩来在给尼赫鲁的回信中明确指出：中印边界从未正式划定，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双方应根据“五项原则”，通过友好协商，全面解决边界问题。同时指出：中国绝不承认所谓“麦克马洪线”，但是为了维持边境的和睦，中国军队从未越过这条线。最近中印边境出现紧张局势，都是由于印军越境挑衅造成的，应该由印度方面负完全责任。希望印度政府立即采取措施，撤回越境印军和行政官员，恢复两国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

周恩来在接到尼赫鲁1959年9月26日的来信后，又于11月7日给尼回信。信中指出：如果两国政府不想出一个十分妥善的解决办法，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边境冲突今后还可能出现；为了有效地维持两国边界的现状，确保边境的安谧，并且为边界问题的友好解决创造良好气氛，建议两国武装部队立即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脱离武装接触。

周恩来接到尼赫鲁 1959 年 11 月 16 日的来信后，于 12 月 17 日又给尼回信。信中再次提出和平解决边界争端的具体步骤，建议两国总理举行会谈。经过一段交涉和安排，到 1960 年 4 月，周恩来亲赴新德里，与尼赫鲁举行会谈。然而，中方为争取公平合理地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真诚努力，仍然没有得到印方的响应。双方除同意由两国官员共同审查、核对和研究有关边界问题的事实材料并向两国总理提出报告外，未达成任何实质性协议。

尽管如此，周恩来本着求同存异的方针，并为推动中印双方沿着和平谈判的道路走下去，他在离开新德里前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了书面讲话，指出两国在边界问题上可以找到 6 个共同点或接近点。他建议把共同点或接近点肯定下来，以便于两国政府继续商谈。他提出的 6 点完全是对等的，没有任何一方强加于另一方的要求，但印方仍拒绝了中方这一建议。

1960 年 6 月至 12 月，中印两国官员举行会晤，分别提出和审查对方提出的边界主张的论据。我方用大量确凿的材料论证中国所指的传统习惯的中印边界线是有历史和事实根据的。但印方主要根据英国旅行家、冒险家的显然不足为凭的材料，硬说“麦线”是中心边界东段的传统习惯线，硬说历来在我国管辖下的阿克赛钦属于印度。由于印方坚持其狂妄主张，毫无解决问题的诚意，使两国官员的会晤也没有取得结果。

为避免边界局势进一步恶化，从 1962 年 8 月至 10 月，

中国曾反复建议中印双方在官员报告的基础上讨论中印边界问题，但印度却坚持要中国从西段自己的大片领土上撤出，甚至要中国东段撤出位于“麦线”以北的扯冬地区，以此作为同意谈判的先决条件，这就断然关闭了和平谈判之门。

## 二、印军发动大规模进攻，中国被迫作出反击的决定

印度政府策动和支持的西藏农奴主叛乱遭到失败，对中国西藏执行扩张主义的幻梦破灭后，尼赫鲁公然抛弃中印友好的旗帜，把中国政府谋求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努力和克制忍让视为软弱可欺，进而得寸进尺，对中国步步进逼。尼赫鲁扩张主义的逻辑是：“我已经侵占的地方是我的，我想要侵占的地方也是我的。昨天我可以侵占你一寸，今天我就可以侵占你一尺。”对尼赫鲁来说，中国要是不撤出他要侵占的土地，他就施行“前进政策”，直到采用战争手段。这样，从1961年开始，尤其是从1962年4月起，印军在中印边界西段中国境内先后设立了43个军事据点。印度政府侵占我国领土和部署对华战争的规模和程度，都超过了过去的英帝国主义。当时印度宣扬：在东段已将中国军队“赶回两英里”，在西段全线向前推进，欢呼并祝贺尼赫鲁取得了“拿破仑式的大胆的规划所取得的独一无二的胜利。”<sup>①</sup>在此情况下，尼赫鲁得意忘形，一再悍然拒绝中国政府多次提出的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建议，决心铤

---

<sup>①</sup> 见1962年7月7日印度《闪电》报。



而走险，诉诸武力。

1962年10月2日，尼赫鲁在新德里声称：印度政府要“以军事力量对付中国”。12日，他公开下令：要把中国军队从印军侵占的中国领土上全部“清除掉”。14日，印度国防部长宣称：要同中国打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支枪。接着，他又乘飞机赶到靠近中印边界东段的印度边境提斯普尔城，进行军事部署。随即，印军在东段大量增加兵力。17、18两日，入侵印军在东段和西段边境上，向中国边防部队进行猛烈炮击，挑起了大规模的边界武装冲突。

但是，印度方面毕竟错误估计了形势，它以为充当反华急先锋和南亚霸主，会得到美国和前苏联等国的援助和赏识；以为当时中国经济困难已严重到不可克服的程度；以为美国支持台湾国民党当局正企图窜犯我东南沿海，牵制了我主要国防力量，西南地区防务空虚；以为中苏裂痕加深，中国“孤立无援”。所以，它认定此时正是在中印边界全线进攻的“良好时机”，不管它怎样进攻，中国是不敢还手的，因而利令智昏，走上了军事冒险主义的道路。

中国政府 and 边防部队遵照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一贯立场，对印军的不断入侵挑衅和蚕食祖国领土的行径，始终保持了最大的克制和忍耐，采取了一系列避免武装冲突的措施。这就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了印度政府扩张侵略的野心，揭穿了它捏造“中国侵略印度”的谎言，争取了国际舆论的同情。当印军侵占中国领土、频繁挑起边界纠纷时，中国政府指示中国边防部队，必须作好两手准

备：力争好，准备坏。即在争取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同时，也必须作好应付印军进攻的准备。当印度政府大幅度右摆时，中央军委曾适时告诫边防部队，要提高警惕，加强边防，防范印军的进攻。当印军大肆占地设点，步步向前推进，严重威胁中国边防部队安全的时候，毛泽东主席指示：对印军的入侵，决不退让，力争避免流血；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当尼赫鲁政府大肆反华，疯狂挑衅，调兵遣将，集结部队，完全堵塞了和平谈判的一切渠道后，中共中央及时作出决定：为了打击印度反动派的嚣张气焰，保卫祖国边疆的安全，创造中印边界问题谈判解决的条件，决定对入侵印军进行反击。中央军委立即对反击作战作出指示：军事指挥工作，政治动员工作，后勤保障工作，务必精心计划，周密组织，切实做好。指出，此次对印度反动派作战，事关国威军威，务求初战必胜，只能打好，不能打坏。

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指示，中国西藏、新疆边防部队立即进入了战备状态。为了实施自卫反击作战组织指挥，由西藏军区组成了“西藏军区前线指挥部”，指挥部成员有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副司令员邓少东、赵文进，司令部副参谋长石伴樵，政治部主任吕义山，后勤部副部长于一星等，主要负责东段指挥。西段，新疆边防部队组成了“新疆军区康西瓦指挥部”，由副军长何家产负责指挥。西藏、新疆边防部队接到中央军委反击作战的命令后，迅速部署兵力，进行紧张的战前准备，迎击印军大

规模进攻。

## 自卫反击作战的经过

这次反击作战，是在号称“世界屋脊”的喀喇昆仑山上和喜马拉雅山主脉南侧地区进行的。该地区地势险峻，气候恶劣，人烟稀少，交通不便。这恶劣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对作战行动有严重的影响，作战的艰苦性是罕见的。中印边界自卫反击作战从1962年10月20日开始，至11月21日基本结束，作战经历了两个阶段。

### 一、第一阶段自卫反击战（10月20日至28日）

自卫反击作战在中印边境东段和西段地区进行。印军部署的兵力有1个军部、1个师部、4个旅部、21个步兵营，总计约22000人。印度陆军原是英国殖民地军队，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北非、南欧、东南亚诸战场作过战，自吹嘘为“打遍欧、亚的劲旅”。与我作战的印度第四师号称“王牌部队”，是“印军编制、装备、训练的试点部队”。第一一四旅长期驻防克什米尔，受过山地战训练。这些部队在印度陆军中具有代表性。其作战部署是：东段，第七旅4个营部署在克节朗地区；炮兵第四旅两个步兵营配置在棒山口、达旺地区；第四师战术司令部及1个营位于吉米塘、下地地区；第五旅8个营分布在“苏班西里边区”、“西安边区”和“鲁希特边区”；第四军军部和第四师师部位于提斯普尔。西段，印军第一一四旅以5个营分散配置



在边境全线，其中 1300 余人分布在入侵我境的 43 个据点；旅部及 1 个营位于列城。印度的企图是：在东段，依托已侵占的所谓“麦线”以南和以北的克节朗地区，继续向西藏内地扩大侵占范围；在西段，依托其入侵的 43 个据点，继续向我境内蚕食，逐步侵占新疆阿克赛钦地区。

中国边防部队的主要部署是：以西藏 4 个多团的兵力，首先粉碎克节朗地区印军的进攻，然后歼灭克节朗地区和可能由达旺地区来援之敌；以新疆 1 个多团的兵力，首先粉碎印军进攻，然后歼灭侵入加勒万河谷和红山头之敌，并视情况扩张战果；同时，以西藏昌都、林芝、山南分区部队，向当面之敌反击，配合主要方向的作战。

**克节朗地区反击作战。**克节朗，位于中印边界东段西藏山南地区，该地山峰比高 1500 米以上，海拔 4000 米左右，森林密布，气候恶劣，人烟稀少。该地区有印军第七旅、炮兵第四旅 2 个步兵营，共 6 个多营 6000 余人，部署在克节朗、棒山口、达旺一线，企图巩固已侵占之地，并继续侵占我克节朗河以北地区，实现其“以塔格拉（即拉则山）山脊为界”的梦想。中国西藏边防部队集结了 10300 余人的兵力，对印军第七旅实施反击。根据印军前重后轻、翼侧暴露、正面宽、纵深浅的布势特点，贯彻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原则，以 3 至 4 倍于敌的绝对优势的火力，采取从两翼开刀、迂回侧后、包围分割、各个歼灭的战法，于 20 日拂晓开始反击。实施主要突击的右翼部队在枪等、卡龙之间强渡冰冷刺骨的克节朗河，向枪等、卡龙、扯冬、绒



不丢的入侵印军进行反击。指战员们冒着枪林弹雨，互相掩护，交错前进，与印军展开激战。负责摧毁塞维拉河岸卡龙据点的我二连六班（班长阳延安）一往无前，勇猛反击，共攻克 27 个印军地堡，收复了卡龙据点，为驱逐入侵卡龙的印军第七旅创造了条件。战后，六班被国防部授予“阳延安班”英雄称号。负责清除克节朗河南岸扯冬据点的我三连二排，敢打敢拚，连续摧毁 14 个地堡，收复了扯冬据点。战后，二排荣立集体一等功。当天即清除了枪等、卡龙、扯冬、绒不丢等据点的入侵印军。

担任左翼助攻部队，向沙则、仲昆桥、克宁乃桥的印军实行反击。入侵沙则的印军在这里构筑了堑壕及百余个明暗地堡。攻占沙则可直接威胁克节朗地区的印军指挥机关。于是，助攻部队穿密林，攀悬崖，涉急流，迅速突入印军前沿，首先割断克节朗地区入侵印军指挥机关与沙则据点的联系。在沙则战斗中，九连二班班长张映鑫率领全班，连续攻克印军 4 个地堡，在攻击第 5 个地堡时，他身负重伤，向地堡投入最后 1 枚手榴弹，并用双腿堵住印军地堡射孔，壮烈牺牲，为后续部队歼灭印军创造了条件。战后，国防部授予他“战斗英雄”称号。

当天，克节朗地区的印军大部被歼，一部溃逃。22 日，中国国防部宣告；我军没有必要受非法的“麦线”约束。23 日，我山南地区部队歼灭棒山口之敌一部，占领棒山口。接着，我军兵分 5 路实施追击，直取达旺。印军仓惶向达旺河以南之西山口一线撤退。我边防部队又以一部渡过娘姆

江曲，昼夜兼程，沿下地、龙拉、沙泽一线急进。清除棒山口入侵印军的另一支反击部队，于24日占领了东新桥等地。25日，几支反击部队相继进占达旺。尔后，其中一部继续向南推进到达旺河北岸。克节朗——达旺之役遂告结束，首战告捷。全歼印军第七旅及其他一部，俘虏印军第七旅旅长季·普·达尔维准将，共歼印军1900余人，收复了克节朗河以南、达旺河以北、不丹以东、达旺以西的全部领土，并在事实上否认了所谓麦克马洪线。

**昌都、林芝、山南分区部队反击作战。**西藏昌都、林芝、山南地区的中国边防部队，也于10月20日分别向当面入侵印军实施反击。先后拔除了呷灵公、拉木多、林卡、拉曼、阿夏比拉等印军据点，歼敌一部，进占了易古通、马尼岗、塔克新等地，逼近瓦弄，有力地配合了主要方向的作战。

**加勒万河谷、红山头 and 班公湖地区反击作战。**加勒万河谷和红山头地区，位于中印边界西段新疆阿克赛钦西部，在喀喇昆仑山和冈底斯山山区，山高坡陡，交通不便，高寒缺氧，荒无人烟。印军第一一四旅5个营约5600人，分散配置在这一地区600公里正面的77个据点内，其中1300余人分布在侵入中国境内的43个据点内。印军第一一四旅旅部及1个营位于列城，查谟——克什米尔国民军第十四营侵占红山头，杰特联队第五营侵占加勒万河谷。印军在侵占的据点内设置障碍，组织较严密的火力，各点均有独立作战的能力。他们企图凭借其据点，伺机侵占新疆

的整个阿克赛钦地区。

我新疆边防部队针对入侵印军正面宽、据点分散、间隙大的弱点，集中优势兵力，采取迂回包围、近战夜战等打歼灭战的有效战法，决心首先粉碎入侵印军的进攻，然后采用拔点攻坚的战法，就地围歼，逐次清除加勒万河谷、红山头 and 新疆阿克赛钦地区西大沟以北河尾滩、天文点两防区内的入侵印军。为防止印军向我边防部队的薄弱地区进攻，又令空喀山口防区驻守分队在班公湖以南组织积极防御，牵制当面入侵印军。

**红山头攻坚战斗及天文点防区作战。**红山头是西段第一阶段反击战的主要方向。该地是斗拉特别奥里基地印军联系天文点地区据点的重要枢纽。印军构筑了 16 个地堡、5 个地下室工事，组成两层火力阵地，火力强，工事坚固。20 日，新疆边防部队首先实施炮火急袭，尔后从印军侧后西、南两个方向进攻反击。一部由正面佯攻，一部从侧后直插红山头主峰，另一部直捣入侵印军平台阵地，攻击分队以爆破筒、炸药包、喷火器歼灭负隅顽抗之印军。经 1 个多小时的战斗，驱除了入侵印军，夺回了红山头主峰。前来增援的印军眼看大势已去，于是半途撤回。红山头战斗后，我们乘胜扩大战果，担任打援、守卡、警戒的分队相继拔除 31 号、12 号、5 号、8 号、11 号、17 号等 6 个印军据点，全歼守军，收复失地。其他各点之入侵印军于当晚仓惶逃窜。至 21 日晚，天文点防区印军入侵据点全部被肃清，给印军第一一四旅第十四营以沉重打击。



**加勒万河谷拔点及河尾滩防区作战。**加勒万河谷地区，谷深沟窄，山高坡陡，悬崖绝壁，交通不便。印军以直升飞机空运补给。印军在此处构筑了工事、地堡，企图长期占领。新疆边防部队对其军情、地形了如指掌。20日，我边防部队向该处南、北两侧的入侵印军据点实施反击。首先利用夜暗隐蔽接近印军据点，尔后实施炮火急袭，随即一部从河谷北侧左翼插入印军前沿，向前推进；另一部从河谷南侧左翼发起反击，在工兵、防化兵密切配合下，经近40分钟激战，成功地拔掉了加勒万河谷地区入侵印军的据点。该处战斗结束后，我军乘胜扩大战果，兵分两路，一路顺加勒万河谷南进；一路北上向西大沟发展。至23日，拔除“河印27号、28号”据点，其余印军哨卡闻讯而逃。至此，河尾滩防区之印军全部肃清。

**班公湖岸四战四捷战斗。**印军第一一四旅廓尔喀联队第一营入侵班公湖南北两岸建立了据点。班公湖北岸为空喀山口防区，南岸为阿里防区。21日，担负空喀山口地区反击作战的边防部队，抓住战机，向位于班公湖北岸中国一侧的西里扎普、安拉沟等地的印军进行反击；22日，班公湖南岸新疆守卡分队一部，清除了占据南岸及其以西另一据点的入侵印军。在班公湖西岸的西里扎普、4400高地、绝拉沟、野营地的拔点攻坚战斗中，我军四战四捷，全歼印军。战至24日，全部拔除了班公湖南北岸及其以北地区的31个入侵印军据点。

**转战巴里加斯。**巴里加斯位于西藏阿里噶尔县西北，为



狮泉河河谷，距传统习惯线 18 公里，河谷宽 200—300 米，河谷有公路经东提通列城，两侧为高山。印军查漠—克什米尔国民军第七营入侵该地，建立据点 6 处，企图长期占领并作继续蚕食其它地区的基地。23 日，班公湖地区入侵印军据点全部肃清后，我西线新疆边防部队奉命挥戈南下阿里，歼灭巴里加斯地区入侵印军。受领任务的部队不顾几天几夜连续作战的疲劳，以惊人的意志挥师南下，对阿里之羌山口、约山口、巴里加斯等地的入侵印军进行反击。转移中，我边防部队在冰天雪地的环境中夜以继日地连续行军 1400 里，有的分队两次徒涉齐腰深的冰冷刺骨的噶尔河。工兵分队在零下 20 多度的冰河上架桥，保证部队开进。部队吃不上热饭，喝不上开水，吃冰雪，啃干粮，忍饥耐寒，于 26 日赶到甲岗——狮泉河一带集结。尔后，分兵两路：右翼由甲岗——且坎——拉干赫尔方向迂回印军侧后，断其退路；左翼沿狮泉河谷实施主攻，围歼印军于巴里加斯——卡日果之间地区。以阿支、且坎、扎西岗守卡分队配合主力作战。27 日，反击部队一部抵达羌山口与印军打响。机枪连班长司马义买买提在汽车上为掩护战友下车，用冲锋枪向印军猛烈射击，吸引印军火力，他两次身负重伤，仍坚持战斗掩护战友，直至壮烈牺牲。战后，被国防部授予“战斗英雄”称号。这次战斗毙、俘印军多人，占领了羌山口。27 日，阿支、且坎分队攻占约山口。同日，攻击部队对巴里加斯之印军形成合围。28 日，打退入侵印军的进攻后，收复了拉多和磔木卓克等地。尔后，又收复了巴

里加斯、卡日果等地。巴里加斯地区作战遂告结束。

至此，新疆边防部队在环境、气候异常恶劣的情况下，从喀喇昆仑山到冈底斯山，转战千余里，拔除入侵印军据点 37 个，收复部分领土，歼敌一部，有力地配合了东段主力部队的反击作战。

## 二、中国政府提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

中国边防部队第一阶段自卫反击作战取得了重大胜利，军事斗争已处于十分有利的态势。但是，中国政府本着和平解决边界争端的一贯立场，为了中印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缓和由印度当局造成的严重局势，于 10 月 24 日发表声明，提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其最主要之点是，双方武装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 20 公里，脱离接触。当日，周恩来总理致函尼赫鲁总理，希望印度政府对中国的三项建议作出积极反应。三项建议，使全世界人民更加看清了我国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诚意。中国边防部队遵照政府声明，东段于 24 日停止追击，在达旺河以北集结；西段于 28 日停止了对入侵印军的反击，在甲岗、日土宗地区集结休整。11 月 4 日，周恩来再次致函尼赫鲁，呼吁印度积极响应中国的三项建议，指出，中国的三项建议对双方来说，是对等的而不是片面的，是平等的而不是屈服的，是互让的而不是强加于人的，是相互尊重的而不是欺凌一方的，是友好协商的而不是武断专横的。中国政府的三项建议和停止反击的行动，得到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及人民的热烈欢迎和赞扬，动员了国际舆

论支持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敦促印度政府响应中国的建议。三项建议不仅再次表明中国的和平诚意，而且剥下了尼赫鲁自我标榜的和平中立、不结盟的外衣，暴露了印度当局侵略的真面目，进一步揭露了印度和国际上的反动势力对中国的诬蔑。

印度政府在第一阶段作战中虽遭惨败，但仍不认输，悍然拒绝了我国政府的三项建议，公然要求恢复到1962年9月8日以前的即印军侵占中国大片领土后的边境状态，攻击中国的和平建议是“一种骗局”。印度政府进一步掀起反华浪潮，加紧战争动员和准备，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成立了“应付紧急情况的”内阁，公开向美国等西方国家乞求军事援助，从全国各地调兵遣将，日夜向边境增派军队，赶运武器，一心要扩大边界武装冲突，与我国再作军事较量，与我军一决雌雄。到11月中旬，印军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增加了2个师部、9个旅以及炮兵、装甲兵部队各一部，总兵力增至3000人。其部署是：东段，以第四师4个旅部署在西山口——邦迪拉公路沿线；以第二师之第十一旅部署在瓦弄地区；第五旅分布在“苏班西里”和“西安”两边区；第一九二旅布置于提斯普尔。西段，第七十旅部署在东堤及其以西地区；第一一四旅部署在楚舒勒及其以北地区；喜马拉雅第三师师部位于列城。尼赫鲁满以为这样能有把握击败我军。在印度政府大吹大擂之下，瓦弄、西山口等地印军于11月14日和16日又向我军发动猛烈进攻。鉴于此，要缓和边境紧张局势，创造用



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条件，还必须再给印军以沉重打击。因此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再次反击入侵印军。

### 三、第二阶段自卫反击战（11月16日至21日）

面对印军的再次武装入侵，中央军委即令西藏、新疆边防部队继续分别在东段、西段反击入侵印军。总部署是：东段，西藏军区前指指挥8个步兵团、3个炮兵团的兵力，向达旺河以南西山口——邦迪拉地区反击；为加强东段东部地区作战的指挥，决定组成昌都地区分前指（即丁指），由军长丁盛、副军长韦统泰、军副政委钟池、政治部主任蓝亦农、昌都军分区司令员郟晋武组成，指挥4个团的兵力，向瓦弄地区反击；西藏山南、林芝分区部队，在东段中部地区反击，以配合主要方向作战。西段，新疆军区前指指挥1个团的主力，在班公洛地区反击。

**西山口——邦迪拉地区反击战。**这个地方靠近不丹王国，印军沿公路摆成南北一条“长蛇”，布势特点正如刘伯承元帅所概括的，是“钢头、锡尾、背紧、腹松”。据此，西藏边防部队以2个多团从正面攻击西山口，打敌之“头”；以3个多团从敌两翼夹击申隔宗、略马东，击敌之“背”，剖敌之“腹”；以2个团实施大迂回，直插德让宗、邦迪拉之间，切敌之“尾”，形成对西山口、德让宗地区之敌多路向心合击，将其分割包围，各个歼灭。参战各部于11月10日至15日分别向指定位置开进，至17日，先后与印军警戒、侦察分队接触，但印军未发觉我军企图。17日晚，我迂回部队在登班击溃印军1个营，切断了德让宗——



邦迪拉公路。此时印军才发觉我军已多路逼近，彼处于不利地位，遂于18日晨全线撤逃，但已陷于我军合围之中。18日晨，我军发起总攻。在激战中，副班长庞国兴为追歼一股溃逃印军与连队失去了联系，深入印军纵深地区15公里，作战5次，攻占2个炮兵阵地，击毙7个印军士兵，缴获7门火炮和2辆汽车。战后庞国兴被国防部授予“战斗英雄”称号。当日，我军占领西山口、申隔宗、德让宗，歼灭印军一部，一部溃逃，其四师战术司令部率直属部队乘我军未截断通往打陇宗道路的空隙逃脱。19日，我军占领邦迪拉，并于略马东地区围歼印军近千人。随即我军主力便在西山口——邦迪拉地区展开搜剿，一部向南追击，于21日进占吉莫山口、比里山口、鹰窠山口一线。至此，在西山口——邦迪拉地区，全歼印军3个旅，共毙俘印军准将旅长豪尔·辛格以下官兵5200余人。

**瓦弄地区反击战。**瓦弄，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以北，其东、南与缅甸、印度相邻。该地区山高林密，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断崖峭壁，河流交错，水流湍急，易守难攻。入侵印军第十一旅4个营2000余人凭险扼守，并不断向我军出击。中国边防部队以1个团向瓦弄扎公西北之印军左翼实施迂回包围；以1个团又1个营分别向瓦弄扎公、曲子扎公反击，居高临下，直插瓦弄；以4个连从察隅河以东反击，分割歼灭瓦弄地区之敌。11月16日晨，我军发起反击。我军一部攻占扎公、曲子扎公等地，打乱了印军部署。印军十一旅旅长等人见势不妙，惧

我全歼，即下令全线撤退，旅长本人随四军军长考尔乘飞机仓惶逃跑，部队大部溃散。在反击战中，我军排长周天喜带领一个加强班冲在最前面，经3小时苦战，打下了印军第一个地堡群，当向印军第二个地堡群冲击时，周天喜不幸牺牲。战后，国防部授予周天喜“战斗英雄”称号。战士陈代富奉命执行摧毁地堡任务，当他将爆破筒塞入地堡时，被印军推了出来，在危急时刻，他爬上地堡，扒开堡顶积土，将爆破筒从顶盖圆木间隙插入，并用胸口顶住爆破筒，不让印军推出，当爆破筒即将爆炸的一瞬间，他迅速滚下地堡，地堡被炸毁了，打开了部队前进的道路，人们称赞他是活着的黄继光。战后，国防部授予陈代富“战斗英雄”称号。16日17时许，中国边防部队进占瓦弄。另一部向东村地区之敌发起攻击，进占敌能。我部进驻瓦弄后，主力转入搜剿，一部乘胜向南追击。到21日，我军进至萨木维尔和金古底，逼近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追击部队奉命停止追击，就地转入搜剿。瓦弄之战，共歼灭印军1200余人。

**里米金、梅楚卡、都登地区反击战。**东段中部地区，西藏山南边防部队以约1个营的兵力，于18日向里米金方向反击；林芝边防部队以3个营的兵力于19日向梅楚卡、都登方向反击。我军先后拔除印军据点16处，占领里米金、梅楚卡、更仁等地，歼敌一部，有力地配合了主要方向的作战。

**班公洛地区反击战。**班公洛（今斯潘古尔）位于中印边界西段西藏阿里日土县斯潘古尔湖西侧地区，西面与印

度实际控制区的拉达克相接，是入侵印军的一重要前进基地。印军在这里建立了6个据点，其中3个据点分布在山脊梁上，可以控制西藏阿里边防分队的哨卡，威胁阿里纵深之安全。18日上午，印军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向驻守斯潘古尔湖地区的新疆边防部队发起进攻。新疆边防部队作出部署：迂回入侵印军侧后，摧毁其据点，清除侵入班公洛地区之印军。我军一部冒着零下40度的严寒，顶着大风雪，翻越海拔5200米的冰大坂，按时进抵反击出发阵地。18日上午，以连为单位分别向3个据点发起冲击。攻打第一个据点的部队，一鼓作气战斗30分钟即摧毁了敌工事和地堡21个，攻克了据点；攻打第二个据点的部队，冒着印军猛烈的机枪射击，英勇顽强，前仆后继，激战1小时，攻克了25个地堡，拔除了据点；攻打第三个据点的部队，以果敢迅猛的动作，扫荡印军连部，摧毁了据点。拔除据点后，我军在转向印军炮兵阵地的攻击中，工兵战士罗光燮在排长排雷负伤的情况下，奋勇冲入雷区排雷。在排雷中，他的左腿、右臂相继被地雷炸断，排雷器材已用完，眼看雷还未排完，部队无法前进，他以大无畏的献身精神，用身体向雷区滚进，为部队开辟冲锋道路，最后壮烈牺牲。战后，国防部授予他“战斗英雄”称号。经两个多小时激战，我军清除了印军廓尔喀第十一联队第一营第三连的大部兵力。与此同时，反击部队以炮火压制破坏了入侵印军另3个据点，其守敌于19日逃窜，我军于20日占领该3个据点。至此，班公洛地区作战胜利结束。西段入侵印军据点全部



清除。

为了高举和平谈判的旗帜，促成我国三项建议的实现，中国政府于11月21日宣布，从22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全线主动停火，主动后撤。从12月1日开始，我军回撤至1959年11月7日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我侧20公里以内。其后，又将缴获的印军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交还给印度，并释放了全部印军战俘。中国政府的这一举动，在战争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得到了世界上许多国家和人民的高度赞扬。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历时1个月，我军在西段清除了印军全部入侵据点，在东段进到了非法的“麦线”以南靠近传统习惯线附近地区。作战中，全歼印军3个旅，基本歼灭印军3个旅，另歼灭印军5个旅各一部，俘印军第七旅旅长季·普·达尔维准将，击毙印军第六十二旅旅长霍希尔·辛格准将，总计歼灭入侵印军8900余人。缴获各种火炮300余门，飞机5架，坦克10辆，汽车400辆，各种枪6300余支（挺），及其它许多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在反击作战中，我军共伤亡2400余人。在这次自卫反击战中，我边防部队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英明领导和指挥下，同仇敌忾，英勇战斗，以较小的代价，取得了重大的胜利，驱逐了入侵的印军，维护了中国的领土和主权，打击了当时印度扩张主义者的嚣张气焰，大扬了国威军威。

和平谈判是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唯一途径，这是中国政府一贯的立场。中印边界这场战争，中国方面完全是被



迫的。中印两国是两个伟大的国家，边界问题是英国殖民主义者遗留下来的复杂问题。1979年2月邓小平接见印度外长时指出：“中印两国应该求同存异，边界问题可以通过友好协商，互谅互让，公平合理地一揽子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只要双方以诚相见，按照上述原则，是能够圆满解决的。希望中印边界成为和平友好的边界。

## 从中英联合声明到香港基本法的诞生

魏 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实现祖国统一大业，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台湾问题、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已日益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邓小平同志的直接指导下，创造性地提出了用“一国两制”的方针来解决台湾问题、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1984年12月中英两国政府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1990年4月香港基本法制定完成并被中英两国政府正式通过。根据中英两国达成的协议，中国政府将从1997年7月1日起正式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

香港问题的圆满解决，不仅一洗中国人民百余年来蒙受的殖民耻辱，而且也为解决澳门问题和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展示了极为光明的前景。

本文仅就香港问题解决的过程作一扼要的介绍。

### 香港问题的由来及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

香港，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界”，自古以来就是中

国的领土。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强迫清政府于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1856年英国又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于1860年缔结《北京条约》，割让九龙半岛南部地区给英国。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英国又趁火打劫，逼迫清政府于1898年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租九龙半岛北部大片土地及附近200多个岛屿（统称为“新界”），租期99年，到1997年6月30日期满。

以上3个不平等条约都是英国对清政府进行武装侵略的产物，中国人民历来不承认这些不平等条约。辛亥革命以后的历届中国政府也都没有承认过这些不平等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也曾多次阐明对香港问题的立场，即：香港历来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不承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对于这一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在适当时机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在未解决之前暂时维持现状。

1972年3月8日，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在致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主席的信中，重申了中国政府的立场，指出：“香港和澳门是被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是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根本不属于通常的所谓‘殖民地’范畴。因此，不应列入反殖民地宣言中适用的殖民地地区的名单之内。”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于同年6月15日通过决议，向联大建议从殖民地名单中删去香港和澳门。1972年11月8日，第二十七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批准了该特委会的

报告。

70年代末，随着“新界”租期届满日趋接近，英国方面希望了解我国对解决香港问题的态度。香港的中外投资者对香港的前途也表示关注。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香港问题，就正式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

根据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一贯立场，并考虑到香港的实际情况，我国政府确定了解决香港问题的基本方针，这就是：一、一定要在1997年收回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不能再晚；二、在恢复行使主权的前提下，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

为了实现这个基本方针，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又提出要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式，采取一系列特殊政策来解决香港问题。后来邓小平同志把它精辟地概括为“一国两制”的方针。

“一国两制”方针的产生，有一个长期的酝酿过程。时间可以追溯到1979年。最初是为了解决台湾问题而提出来的。

1979年，香港总督麦理浩访问北京，邓小平同志接见了。麦理浩问邓小平同志，1997年以后，中国对香港是什么政策？邓小平同志只说了一句话：不管将来香港怎么解决，总之会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投资者可以放心。第



二年，英国外相访问北京时，邓小平同志除了重申对麦理浩讲过的那番话，还说了一句：你们可以研究我们对台湾的政策（即指1979年元旦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大常委会发布的《告台湾同胞书》和之后叶剑英委员长宣布的对台湾的九条政策）。

1979年1月1日《告台湾同胞书》指出：“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已经表示决心，一定要考虑现实情况，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

同年4月11日，邓颖超同志在东京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重申了这个政策，她说：“我们根据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遗愿，一再申明：在解决我国统一问题的时候，将尊重台湾的现状和现行制度，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不改变台湾人民的生活方式，也不影响外国在台湾的经济利益。”

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委员长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进一步阐明了我国政府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其中第三条指出：“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第四条又指出：“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

1981年12月23日，廖承志副委员长在回答日本《产经新闻》记者的提问时也明确指出，实现祖国统一，我们并不要求改变台湾现行的社会制度，大陆的社会主义和台湾的三民主义可以并存。大陆也不会派一兵一卒去台湾。

正是考虑到台湾问题和香港、澳门问题的解决，邓小平同志在1982年修改宪法的时候指出，要对香港、澳门和台湾留有余地，可以实现不同的社会制度。这实际上就已经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方针，不过没有使用“一国两制”这个词罢了。

1982年12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1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这就为尔后用“一国两制”的方针解决香港的问题提供了法律依据。

在中英两国政府正式开始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以前，邓小平同志约请了香港各界人士到北京来，听取他们对解决香港问题的意见，亲自做调查研究工作。中国政府并派人多次往返香港，做了大量的调查，广泛听取了各界人士的意见。

“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正是在经过了长期的酝酿、周密的调查研究和深思熟虑之后，才正式提出来的。1984年以来，邓小平同志作了多次重要谈话，对“一国两制”方针的内容、根据及意义进行了精辟的概括和深入的阐述。

1984年6月22日和23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香港工

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等人时指出：我国政府在1997年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后，香港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法律基本不变，生活方式不变，香港自由港的地位和国际贸易、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变，香港可以继续同其它国家和地区保持和发展经济关系。我们对香港的政策50年不变。我们说这个话是算数的。我们对香港政策长期不变，影响不了大陆的社会主义，中国主体必须是社会主义。大陆10亿人口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但允许国内某些区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比如香港、台湾。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看只有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我们采取“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解决香港问题，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也不是玩弄手法，完全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充分照顾到香港的历史和实际情况的。

同年8月31日，邓小平同志会见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时指出：“一国两制”的构想不是今天形成的，是几年以前，主要是在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形成的。这个构想首先是从中国解决台湾问题和香港问题出发的。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就必须充分照顾到香港和台湾的历史和实际状况。我们提出要保存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就是实行“一国两制”。台湾也是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不会改变的。但是，不保证香港和台湾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就不能保持它们的繁荣和稳定，也不能和平地解决问题。因此，我们在香港问题上，提出要保证其现行资本



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在1997年后50年不变。

同年10月3日，邓小平同志会见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时说：我们的政策不会变，谁也变不了。因为这些政策见效，对头，人民都拥护。既然是人民拥护，谁要变人民就会反对。我们在协议中说50年不变，就是50年不变。我们这一代不会变，我们下一代也不会变。到了50年以后，大陆发展起来了，那时还会小里小气地处理这些问题吗？所以不要担心变，变不了。如果有什么要变，一定是变得更好，更有利于香港的繁荣和发展，而不会损害香港人的利益。“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在国际上是一种新的构想。我们提出这一方针不仅因为面临香港问题，而且因为我们对外政策的总方针是维护世界和平。在当今世界上要解决各种国际争端，就要有新的办法。当然，“一国两制”能否成功，要靠香港同胞的努力，但我相信时间将证明会取得成功的。

同年10月22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时指出：“一国两制”是从中国的实际提出的，中国面临一个香港问题，一个台湾问题。解决问题只有两个方式：一个是谈判方式，一个是武力方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总要各方都能接受，香港问题就要中国和英国，加上香港居民都能接受。什么东西能接受？就香港来说，用社会主义方式去改变香港，就不是各方都能接受的。“一国两制”，这是从我们自己的实际提出来的，但是这个可以延伸到国际问题。香港这个问题的解决会直接



影响到台湾问题。用“一国两制”的方式，他们应该是能接受的。“一国两制”的方式，你不吃掉我，我不吃掉你，这不很好吗？

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全体委员时又进一步深入阐明了“一国两制”的方针。他指出：香港回归祖国后它的现行制度50年不变，50年后更没有变的必要。这个精神同时适用于澳门，也适用于将来按照“一国两制”方针解决统一问题的台湾。我们的一些政策，包括对香港、澳门的政策，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制定的。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谁能够搞这样的政策？制定这样的政策是需要胆略的，这个胆略的基础是社会主义制度，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可以制定“一国两制”的政策，允许两种制度的存在。没有勇气是不行的，这个勇气是建立在人民拥护的基础上的。人民拥护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党的领导。看中国变不变，要看这个方面变不变。老实说，如果这个方面变了，也就没有香港以后的50年不变。“一国两制”要讲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国家里允许一些特殊地区搞资本主义，不是搞一段时间，而是几十年、成百年不变。另一方面，也要确定整个国家的主体是社会主义。两制是两个方面，不是“一制”，而是“两制”。

邓小平同志还说，任何国家，包括一个国家的地区，一定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决定自己的制度和管理方式。还有

一个问题，切不要以为香港的事情全部由香港人来管；中央一点都不管，就万事大吉。这种想法是不实际的。中央确实不会干预特别行政区的具体事务，中央不需要干预。但是，如果香港发生了危害到国家根本利益的事，或者出现损害香港自己的根本利益的事情，那时，北京能不过问吗？如果中央把什么权力都放弃了，就可能出现一些混乱，损害香港的利益。所以，保持中央的某些权力，对香港有利无害。

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上述关于用“一国两制”方式来解决祖国统一问题的伟大构想，在中英两国于1984年达成的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中得到充分体现，并由1990年正式通过的香港基本法以法律形式肯定下来。

### 中英谈判与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

从1982年9月到1984年9月，中英两国政府就香港问题进行了长达两年的外交会谈，终于达成了有关协议。

会谈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外交会谈正式开始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应我国政府邀请来华访问，同中国领导人就香港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双方领导人阐述了各自的立场，并同意经过外交途径继续进行商谈。但是，撒切尔夫人访华后于9月27日在香港却又发表了不负责任的谈话，一再强调说上个世纪英国同中国签订的涉及香港地区的3个不平等条约是“有效的”，应该“继续遵守”。对

此，我国政府立即作出了回答。当日，中国政府外交部发言人就香港问题答记者问时指出：“香港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过去英国政府同中国清政府签订的有关香港地区的条约是不平等条约，中国人民从来是不接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一贯立场是，不受这些不平等条约的约束，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收回整个香港地区。中英双方都希望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为此将通过外交途径进行商谈。”10月1日，新华社发表评论员文章，再次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香港问题的严正立场。中国共产党的坚定立场，使得英国政府不得不放弃继续对香港进行殖民统治的幻想，坐下来同我国政府进行外交会谈。

会谈分为两个阶段。从1982年10月到1983年6月为第一阶段，双方主要就一些原则问题进行了商谈，并就会谈的议程和其它程序问题达成了协议。

从1983年7月到1984年9月，会谈进入了第二阶段。中英两国政府代表团共进行了22轮会谈。会谈期间，1984年4月和7月，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爵士应中国政府邀请两次来北京访问。邓小平同志和中国政府领导人亲自同他会晤，对推动谈判的进展起到很大作用。此后，两国政府代表团又继续就协议的文字措词进行了反复磋商，终于在9月18日全部达成协议。两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在9月26日进行了草签，协议全文也于当日公布。

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协议包括一个主体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

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以及三个附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的具体说明》、《关于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和《关于土地契约》。此外，中英两国政府还就部分香港居民的国籍问题交换了备忘录。

中英两国政府在联合声明中郑重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联合王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将香港交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政府在联合声明中详细阐明了对香港的12条基本方针政策：

（一）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并考虑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决定在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1条的规定，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

（二）香港特别行政区直辖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除外交和国防事务属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

（三）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现行的法律基本不变。

（四）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由当地人组成。行政长官在当地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主要官员由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提名，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原在香港各政府部门任职的中外籍公务、警务人员可以留用。香港特别行政区各政府部门可以聘请英籍人士或其他外籍人士担任顾问或某些公职。



(五)香港的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保障人身、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旅行、迁徙、通信、罢工、选择职业和学术研究以及宗教信仰等各项权利和自由。私人财产、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以及外来投资均受法律保护。

(六)香港特别行政区将保持自由港和独立关税地区的地位。

(七)香港特别行政区将保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继续开放外汇、黄金、证券、期货等市场，资金进出自由。港币继续流通，自由兑换。

(八)香港特别行政区将保持财政独立。中央人民政府不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征税。

(九)香港特别行政区可同联合王国和其他国家建立互利的经济关系。联合王国和其他国家在香港的经济利益将得到照顾。

(十)香港特别行政区可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单独地同各国、各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经济、文化关系，并签订有关协定。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可自行签发出入香港的旅行证件。

(十一)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社会治安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负责维持。

(十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的上述基本方针政策和本联合声明附件一对上述基本方针政策的具体说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之，并在 50 年内不变。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的具体说明》，共 14 节。第 1 节：说明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依据及其享有的高度自治权；第 2 节：法律问题；第 3 节：司法体制问题；第 4 节：公务员的权利、义务和聘用等问题；第 5 节：财政税收政策；第 6 节：经济、贸易及关税等方面政策；第 7 节：金融及货币政策；第 8 节：航运政策；第 9 节：航空政策；第 10 节：文化、教育制度及有关的规定；第 11 节：对外经济、文化关系及参加有关国际组织等规定；第 12 节：驻军及社会治安问题；第 13 节：居民权利义务及宗教政策等规定；第 14 节：居民身份及出入境的有关规定。

《关于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主要说明为保证 1997 年政权的顺利交接，同意成立联合联络小组。双方各派 1 名大使级的首席代表和另外 4 名小组成员，及不超过 20 名工作人员。联合联络小组是联络机构而非权力机构。联合联络小组的职责为：就《联合声明》的实施进行磋商；讨论与 1997 年政权顺利交接的有关事宜；就双方商定的事项交换情况并进行磋商。联合联络小组未能取得一致意见的问题提交两国政府通过协商解决。经双方协议，联合联络小组可设立专家小组处理具体事项。联合联络小组将继续工作到 2001 年 1 月 1 日为止。

《关于土地契约》，主要就处理关于香港土地契约及其

他有关问题作出了规定。决定成立土地委员会，由双方各派同等人数官员组成，辅以必要的工作人员。

中英两国政府签订的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及其附件，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倡导的“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并使之进一步具体化。它体现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的高度结合，在维护国家的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原则方面毫不含糊，同时在具体政策、措施方面又充分照顾到香港的实际情况和各方面的利益。香港问题的成功解决，不仅有助于推动澳门和台湾回归祖国，同时也将在国际上产生深远影响。中国政府领导人当时就指出：中英联合声明是中国和世界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其意义在于：有利于香港的长期稳定和繁荣；有利于中国的统一和四化建设；有利于远东和世界和平；为中英友好合作开辟了更加美好的前景；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了新的经验。因此，《联合声明》受到了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的拥护和世界各国的普遍赞扬。

### 香港基本法起草经过及主要内容

在中英两国政府签订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之后，起草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工作便提上了议事日程。

按照“一国两制”的方针，我国在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后，将采取一系列特殊政策，以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由于我国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是一项长期的政策，在香

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后 50 年不变，因此，需要以法律的形式来保证这些基本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

1985 年 4 月 10 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决议，决定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起草委员会，负责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工作。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在全国人代会闭会期间，向全国人大常委会负责。

1985 年 6 月 8 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共 59 人。其中有关部门负责人 15 人，各界知名人士 10 人，法律界人士 11 人，香港工商、文教、法律、工会和宗教等各界人士 23 人。姬鹏飞任起草委员会主任委员；安子介、包玉刚、许家屯、费彝民、胡绳、费孝通、王汉斌、李国宝为副主任委员；李后为秘书长；鲁平、毛钧年为副秘书长。

1985 年 7 月 1 日，起草委员会正式成立并开始工作。在制定了工作规划，确定了基本法结构之后，起草委员会设立了 5 个由内地和香港委员共同组成的专题小组，即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关系专题小组，居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专题小组，政治体制专题小组，经济专题小组，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体育和宗教专题小组，负责具体起草工作。在各专题小组完成条文的初稿之后，成立了由包玉刚、胡绳主持的总体工作小组，从总体上对条文进行调整和修改。



1988年4月，起草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草案)》征求意见稿，用5个月的时间在香港和内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有关部门广泛征求了意见，并在这个基础上对草案征求意见稿作了100多处修改。1989年1月，起草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对准备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基本法(草案)以及附件和有关文件逐条逐件地进行了表决。除草案第19条外，所有条文、附件和有关文件均以全体委员2/3多数赞成获得通过。同年2月，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决定公布基本法(草案)包括附件及其有关文件，在香港和内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中央各部门、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有关专家、人民解放军各总部中广泛征求意见。经过8个月的征询期，起草委员会各专题小组在研究了各方面的意见后，共提出了专题小组的修改提案24个，其中包括对第19条的修正案。在1989年2月举行的起草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上，对这些提案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逐案进行了表决，均以全体委员2/3以上多数赞成获得通过，并以此取代了原条文。至此，基本法(草案)包括附件及其有关文件的起草工作全部完成。

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区徽图案的征集、评选工作，由起草委员5人以及内地和香港的专家6人共同组成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区徽图案评选委员会负责。在评委会对7147件应征稿进行初选和复选后，起草委员会对入选的图

案进行了审议、评选，由于未能选出上报全国人大审议的图案，又由评委会在应征图案的基础上，集体修改出3套区旗、区徽图案，经起草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表决，从中选出了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的区旗区徽图案（草案），同时通过了基本法（草案）中关于区旗、区徽的第十条第二、三款。

从1985年至1989年的4年间，起草委员会先后举行全体会议9次，主任委员会议25次，主任委员扩大会议2次，总体工作小组会议3次，专题小组会议73次，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区徽评选委员会也先后召开会议5次。

在香港基本法的起草过程中，委员们和衷共济，群策群力，每项条文的起草都是在经过了调查研究和充分讨论后完成的，做到了既服从大多数人的意见，又尊重少数人的意见。每次召开各种会议，都随时向采访会议的记者吹风，会后及时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通报情况。基本法起草工作是在全国，特别是在香港广大同胞和各方面人士的密切关注和广泛参与下完成的。尤其是由香港各界人士组成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对基本法的起草工作给予了积极有效的协助，他们在香港收集了大量有关基本法的意见和建议并及时向起草委员会作了反映。咨询委员会的工作得到起草委员们的好评。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于1990年4月4日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七届三次会议讨论通过。其内容包括序言，第一章总则，第二章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关系，第三章

居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第四章政治体制，第五章经济，第六章教育、科学、文化、体育、宗教、劳工和社会服务，第七章对外事务，第八章本法的解释和修改，第九章附则，共有条文 160 条。还有 3 个附件，即：《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序》和《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的全国性法律》。

下面扼要介绍一下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主要内容。

### 一、关于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关系

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关系，是基本法的主要内容之一，不仅在第二章，而且在第一、第七、第八章以及其他各章中均有涉及。

基本法第 12 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行政区域，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这条规定明确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地位，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是中央人民政府直辖的地方行政区域，同时又是一个实行与内地不同的制度和政策、享有高度自治权的特别行政区。

香港基本法规定，特别行政区的国防和外交事务由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管理，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少数有关国防、外交和不属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的全国性法律要在特别行政区公布或立法实施，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宣布战争状态或因特别行政区发生其政府不能控制的危及国家统一或安全的动乱而决定特别行政



区进入紧急状态，中央人民政府可发布命令将有关全国性法律在香港实施。除此以外，基本法还规定，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特别行政区进行政治活动，禁止特别行政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这对于维护国家的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维护香港的长期稳定和繁荣也是非常必要的。

香港基本法规定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包括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此外，经中央人民政府授权还可以自行处理一些有关的对外事务。

在行政管理权方面，基本法在規定特别行政区自行处理香港的行政事务的同时，还具体规定了特别行政区在诸如财政经济、工商贸易、交通运输、土地和自然资源的开发和管理、教育科技、文化体育、社会治安、出入境管制等各个方面的自治权。例如，规定特别行政区保持财政独立，财政收入不上缴中央，中央不在特别行政区征税；自行制定货币金融政策，港币为特别行政区的法定货币，其发行权属于特别行政区政府。又如，规定特别行政区政府的代表可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的成员，参加同香港有关的外交谈判；特别行政区可在经济、贸易、金融、航运、通讯、旅游、文化、体育等领域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单独地同世界各国、各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关系，签定和履行有关协议。



在立法权方面，基本法规定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经行政长官签署、公布即生效。全国人大常委会只是在认为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不符合基本法关于中央管理的事务及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关系的条款时，才将有关法律发回，但不作修改。法律一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回，立即失效。这样规定，既符合“一国两制”的原则和宪法的规定，又充分考虑了香港实行高度自治的需要。

根据宪法规定，解释法律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为了照顾香港的特殊情况，基本法在規定基本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同时，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本法关于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的条款可自行解释。

## **二、关于居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基本法第三章规定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和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境内的其他人享有的广泛权利和自由，包括政治、人身、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等各个方面。基本法关于香港居民的权利和自由的规定有以下两个基本特点：

(一) 对香港居民的权利和自由赋予了多层次的保障。针对香港居民组成的特点，不仅规定了一般香港居民所享有的权利和自由，也规定了其中的永久性居民和中国公民的权利，还专门规定了香港居民以外的其他人依法享有香港居民的权利和自由。

(二) 基本法所规定的香港居民的权利、自由和义务，

是按照“一国两制”的原则，从香港的实际情况出发的。如保护私有财产权、迁徙和出入境的自由、自愿生育的权利和对保护私人 and 法人财产的具体规定等等。

### 三、关于政治体制

主要规定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立法以及司法机关的组成、职权和相互关系，规定了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主要官员、行政会议和立法会成员、各级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员以及公务人员的资格、职权及有关政策，还规定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可设立非政权性的区域组织等等。

(一) 关于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的关系。二者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既互相制衡又互相配合。为了保持香港的稳定和行政效率，行政长官应有实权，但同时也要受到制约。

(二) 关于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基本法规定，行政长官在当地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要根据香港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而规定，最终达到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的目标。

(三) 关于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立法会对法案和议案的表决程序。立法会由选举产生，其产生办法要根据香港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而规定，最终达到全体议员由普选产生的目标。

(四) 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主席、政府主要官员、终审法院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以及基本法委员会香港委员的资格。有关条文规定，担

任上述职务的人必须是在外国无居留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这是体现国家主权的需要，也是体现由香港当地人管理香港的原则的需要，只有这样才能使担任上述职务的人切实对国家、对香港特别行政区以及香港居民负起责任。

(五)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根据体现国家主权、有利平稳过渡的原则，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成立须由全国人大设立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负责主持。考虑到筹备工作须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和立法会成立之前进行，而基本法要到1997年7月1日才开始实施，全国人大对第一届政府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作出专门决定，此项决定与基本法同时公布。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由香港人组成的推选委员会负责产生，报请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原香港最后一届立法局的组成如符合全国人大关于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中的规定，其议员拥护基本法，愿意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并符合基本法规定条件者，经筹委会确认后可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立法会议员。

此外，还规定行政长官、主要官员、行政会议和立法会成员、各级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员在就职时必须宣誓拥护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 **四、关于经济和教育、科学、文化、体育、宗教、劳工和社会服务**

基本法的第五章主要从财政、金融、贸易、工商业、土



地契约、航运、民用航空等 8 个方面，就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经济制度和政策作了规定。这些规定对于保障香港的资本主义经济机制的正常运行，保持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和自由港地位很有必要。如在金融货币方面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实行外汇管制政策，继续开放外汇、黄金、证券、期货等市场；保障一切资金的流动和进出自由；保障金融企业和金融市场的经营自由；确定港币为特别行政区法定货币，可自由兑换，其发行权在特别行政区政府等等。又如在对外贸易方面规定，一切外来投资受法律保护；保障货物、无形财产和资本的流动自由；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征收关税，香港特别行政区为单独的关税地区，可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参加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关于国际纺织品贸易安排等有关国际组织和国际贸易协定，包括优惠贸易安排；香港特别行政区所取得的各类出口配额、关税优惠和达成的其他类似安排全由香港特别行政区享用。同时还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财政预算要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参照现行的低税政策，自行立法规定税制。此外对主要行业、土地契约、航运、民用航空等方面作了比较详尽的规定。

基本法的第六章就保持或发展香港现行的教育、科学、文化、体育、宗教、劳工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制度和政策作出了规定。这些规定涉及香港居民在社会生活多方面的利益，对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 五、关于对外事务



基本法第七章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涉外事务作出了具体规定，主要有：在外交事务属于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原则下，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代表，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成员，参加由中央人民政府进行的同香港特别行政区直接有关的外交谈判；可在经济、贸易、金融、航运、通讯、旅游、文化、体育等领域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单独地同世界各国、各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关系，签订和履行有关协议；对以国家为单位参加的、同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的适当领域的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可派遣代表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成员或以中央人民政府和上述有关国际组织或国际会议允许的身份参加，并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发表意见；可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参加不以国家为单位参加的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可自行签发护照和其他旅行证件；可根据需要在外国设立官方或半官方的经济和贸易机构，报中央人民政府备案等。

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区旗，是一面中间配有五颗星的动态紫荆花图案的红旗。红旗代表祖国，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花蕊上的五颗星象征着香港同胞心中热爱祖国，红、白两色体现了“一国两制”的精神。区徽呈圆形，其外圈写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和英文“香港”字样，其中间的五颗星动态紫荆花图案的构思及其象征意义与区旗相同，也是以红、白两色体现“一国两制”的

精神。

1990年4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发布第26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正式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3个附件，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区旗区徽图案。

从1982年中英外交会谈开始，经过长达8年之久的艰苦卓绝的工作，在有关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一部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法律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终于诞生了。在基本法起草过程中，邓小平同志就指出：我们的“一国两制”能不能真正成功，要体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里面。这个基本法还要为解决澳门问题、台湾问题作出一个示范。在世界历史上没有这样一个法，是个新事物。基本法的起草过程自始至终是在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它的诞生标志着香港问题取得了完满解决。它不仅受到广大香港同胞的普遍欢迎和好评，而且也在国际上引起巨大反响。基本法起草完成后，邓小平同志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这是一部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法律著作。说它具有历史意义，不只是过去、现在，而且包括将来；说国际意义，不只是第三世界，而且对全人类具有长远意义。这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杰作。

# 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和三月会议

王 秀 鑫

## 一、中共中央预防右倾情绪的滋长

国共两党的军队并肩作战后，经过共产党的一再催促，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于1937年9月22日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发表了实际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共产党的《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宣告了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然而，在统一战线中共共产党的洛川会议制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军事方针，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实行的片面抗战路线和单纯防御的军事方针，完全是对立的。在共产党的合法地位问题上，蒋介石则采取“溶共”政策。他在1937年9月23日的谈话中，一方面承认各党各派的合法地位，另一方面，又说共产党是个派，不承认是个党，强调要集中在国民党领导之下，以三民主义为抗战建国的最高准绳，妄图要中国共产党放弃共产主义，只信仰三民主义。国民党统治集团还主张速决战，反对持久战，幻想依

靠国外的援助来抗日。南京沦陷前，蒋介石打电话给斯大林说：“啊呀！我这个地方已经不能苟安了，请你赶快出兵吧！”<sup>①</sup>他们依靠国外力量抗战，其目的是保存实力，准备将来再次发动反革命内战。南京失守时，蒋介石对抗日动摇了，想对日求和。英美出头调解。当时，日本提出的条件是：（1）沪占领区划为租界。（2）华北自治。（3）内蒙独立。（4）取消中国捕鱼权。只因日本侵略者的条件苛刻，全国抗日高潮汹涌澎湃，蒋介石才不敢投降。此外，国民党还进行“共产党投降”等种种反动宣传，甚至采用升官发财、酒色逸乐等手段引诱腐蚀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企图加以“溶化”。

国共两党两条抗战路线的存在和斗争，充分说明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的条件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仍然存在着深刻的阶级斗争。中国共产党既要抓住民族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又不可忽视阶级矛盾。共产党如何正确处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统一和独立、团结和斗争的关系，成为能否贯彻洛川会议的路线、方针，对抗战成败具有决定意义的关键性问题。

在从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转变的过程中，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国民党在策略上的某些转变，党内一些同志由于对蒋介石反动本质认识不够，产生了右倾情绪。洛川会议前后，在一些具体工作和地区工作中，表现出右

---

<sup>①</sup> 转引自《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97页。



倾思想在滋长。8月底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由于一度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和把政治部改为政训处，党的集体领导削弱了，个别干部独断专行，出现了军阀主义等不良倾向。有的共产党员主张参加国民政府，个别人以接受国民党委任为荣耀。在救亡工作中，有些人同意章乃器“少号召，多建议”的意见。9月间，湘鄂赣边区有的负责人在谈判游击队改编时，接受国民党提出的由武汉行营派遣副司令、军需主任等条件（中共中央发现后制止）。10月间，西安地方党组织受国民党市党部欺骗，将西北救国会组织无原则地取消。

中共中央及时注意到了右倾情绪的滋长，对已经发生和可能发生的右的倾向，进行了纠正和必要的预防。

红军改编时，共产党拒绝了国民党派人来八路军当干部的要求。1937年10月下旬，在八路军中恢复了政治委员及政治机关制度，并开始向新军阀主义倾向作斗争。在参政问题上，中共中央于1937年9月25日通过了《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议草案》，明确指出：“只有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转变为全民的统一战线的政府的时候……中共才能去参加。”“在原有红军中及一切游击队中，共产党绝对独立领导之保持，是完全必要的；共产党员不许可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任何原则上的动摇。”

1937年9月下旬，八路军总指挥部到达太原，中共中央北方局向八路军高级干部及地方党干部，提出了广泛准备游击战争、扩大八路军数十万人、建立广大根据地的任

务和方针。当时，少数有右倾情绪的同志，不同意北方局的意见，他们认为：华北不至于全部沦陷，也许用顽强的正规战还可能阻止敌人前进，因此，没有必要在全华北准备游击战争；扩大八路军数十万人是做不到与不可能的，而且这将给国民党以受不了的刺激，一定要引起统一战线发生大破裂；在华北建立我党领导的根据地及统一战线政权，更是统一战线政策所不能允许的行动。这些同志提出的方针是：“要集中一切力量联合国民党进行正规战，抵住敌人前进”。“游击战争只能在敌人侧后不大的地方去进行一些，辅助华北正面作战，它的意义与前途是不大的。”<sup>①</sup>接着，在平型关战役胜利的影响下，1937年10月8日，华北军分会发出一个错误的指示。这个指示有轻敌速胜观点，过低地估计了日军的进攻力量，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军队的力量及其进步性，否认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主张运动游击战，放松了以共产党为主，自力更生，发动群众，组织游击战争和进行长期艰苦奋斗的精神准备。针对这个错误指示，刘少奇于10月16日写了《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一文，指出：游击战争将成为华北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主要斗争方式。今后华北的游击战争，是有胜利前途的。11月15日，北方局作出《关于目前形势与华北党的任务决定》，再次确定了坚持华北敌后游击战争的方针。

---

<sup>①</sup> 见《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56页。

11月，朱德在前线总司令部接见来访记者，回答了记者提出的问题。在回答有关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时，强调了利用山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性。朱德说：“我们要发动全国群众作战！敌人有的是武器，我们有的是人员；敌人有的是火力，我们有的是活力。”“我们有了山，不可敌的器具也就可敌了。”“我们只需要有游击战、侧面战，不论多少人，来了就敢打”，“这样，抗战前途是乐观的，是胜利的。”

为了教育全党同志克服右倾情绪的滋长，1937年11月12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在延安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强调党要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反对片面抗战路线，指出要实现共产党领导抗战，当前具体的政治任务，是把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所主张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全面抗战路线上来，决不能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的地主资产阶级专政和片面抗战路线上去。毛泽东还阐明了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重要任务，提醒全党注意克服右倾思想。

## 二、十二月会议出现王明右倾投降主义

正当洛川会议确定的路线、方针胜利贯彻和中共中央注意纠正党内右的倾向的时候，1937年11月29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王明被派回到延安。在1937年十二月中央政治

局会议上，开始出现王明右倾投降主义。

早在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前夕，王明的右倾投降倾向已有所滋长。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制定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政策，及支持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于8月1日发表《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对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一定作用。但是，共产国际对当时的形势却估计为帝国主义发动反苏战争，认为日军向中国的进攻“是更加向前作反苏战争的一步”，<sup>①</sup>因而，共产国际的基本政策是要求各国党服从“武装保卫苏联”的政策。斯大林认为，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作为反侵略斗争中的领导者还是弱的，中国共产党要把群众争取到自己方面来还需要时间，究竟需要多少时间还很难说。因此，他们把中国的抗战寄托于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军队，要中国共产党服从国民党的领导，把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改编为蒋介石的军队，去打阵地战，以便牢牢地捆住日本侵略者的手脚。王明是坚决执行共产国际的政策。1937年3月，王明在莫斯科写的题为《救中国人民的关键》一文，提出红军改编“不仅仅是改变红军的名称，而且要相当地改变红军的性质”；陕甘宁边区改为特区后，“这个政权将其活动同意于全中国统一的中央政府”。这里很明显是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王明回国前，共产国际书记处于1937年8月10日召

---

<sup>①</sup> 见《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三）第262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开专门会议，讨论中国抗战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季米特洛夫认为，中国红军是一支农民军队，党内的工人比例很小。他担心中国共产党能否适应新的环境和任务。在共产国际看来，中国共产党难于作抗日战争的领导者，他要求中国共产党运用法国共产党“一切服从人民阵线”和“一切经过人民阵线”的经验，把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改编为国民党军队，做到共同领导，进行阵地战。

王明到达延安后，竭力贯彻共产国际这一“新政策”，反对洛川会议的路线和方针。王明回国不久，中共中央于1937年12月9日至14日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和陕甘宁边区负责人共13人。他们是：毛泽东、张闻天、王明、周恩来、陈云、博古、林伯渠、彭德怀、凯丰、刘少奇、项英、康生、张国焘。王明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如下指示：季米特洛夫建议中国共产党在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中，运用法国共产党组织人民阵线时期的经验，采取“一切服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王明还在会上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和会议结论，除在坚持抗战和国共合作方面发表了一些正确意见外，在如何进行抗日战争和如何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比较系统地提出了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极力否定洛川会议以来中共中央所制定和执行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反对毛泽东关于《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一文的基本观点。

王明在会上的报告和结论的主要内容是：（1）抹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同阶级集团的存在，极力夸大蒋介石集团在抗战中的进步性。王明说，国民党在抗战中是有进步的，南京政府开始走向统一的政府，开始实行国防的任务，中国政治制度已走上了民主自由，救国运动已在各地发展。对于CC与复兴社，过去是叫法西斯，现在应当公开纠正过来，法西斯是侵略殖民地的，复兴社是民族独立与社会进化的。（2）否认无产阶级在抗战中的领导权，鼓吹蒋介石集团在抗战中的领导作用。王明说，在统一战线中，两党谁是主要力量？在全国政权与军事力量上，要承认国民党是领导的优势的力量，我们不能提要把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的地位，空喊领导，只有吓走同盟军。（3）提出一系列与中共中央根本对立的方针和政策。王明说，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今天不是组织群众狭小的团体，而是利用现在合法的团体，要利用合法，取得合法。现在我们不是反对党，而是政府党。过去提国民党片面抗战，使他们害怕，现在要提政府抗战很好，要动员武装广大人民来帮助政府和军队抗战。在抗战的条件下，不怕国民党的限制，我们一定要取得合法，到国民党去立案。我们对政权问题，不要提出改造政权机构，而是要统一的国防政府，共产党员及一切反日派别中有威望有能力的代表，加入国民政府。我们反对地方不服从中央，八路军也要统一接受蒋介石的指挥，建立真正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供给

和统一作战计划的军队。目前中国战争胜利的根本因素之一是全国军队的统一指挥，没有统一的国防军与统一的正规军是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游击战争不能战胜日本。(4)攻击中共中央在洛川会议到十二月会议期间在统一战线工作中犯了“错误”，并把所谓“错误”归纳为七条：即“对抗战后国民党的基本估计不足”；“把民主民生与抗日问题并列起来”；“没有抓住国共合作为中心”；“没有强调发动群众也须经过统一战线这个主要环节”；“没有提出共同领导、共同负责、共同发展，对国民党态度有错误”；“强调独立自主，妨害了统一战线”；“宣传工作中还有党八股，如独立自主地游击战的宣传”。事实上，王明所攻击的，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的抗战路线。

从上述王明的报告和结论的内容可以看出，他在十二月会议上所主张和鼓吹的方针政策是系统的右倾投降主义：只认识日本帝国主义这个民族敌人，忘记了国民党这个阶级敌人；只提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任务，不讲建设新中国的革命任务；主张依靠国民党军队抗战，反对依靠发动组织人民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宣扬国民党在抗战中的领导地位与作用，否认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领导责任；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反对无产阶级的独立自主。

在这次会议上，和王明一起从莫斯科回国的康生，极力支持王明的主张。他说，现在要内部团结，须提出下列口号：拥护蒋委员长继续领导全国抗日，拥护中央政府继



续抗日，共产党要帮助国民党改造军队，帮助国民党购买军火，帮助蒋介石创设军事工业。关于片面抗战与全面抗战，今后最好不用，现在最好都用反日民族自卫战争，不用反日民族革命战争。

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由于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来源于共产国际，因此使参加会议的一部分同志产生了盲目信赖，一时没有辨明是非，支持王明的主张，并把“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口号写进了会议《传达大纲》——《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的总结与精神》，并向下面传达。正是因为以上情况，所以党的十二月会议标志着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开始出现。

党的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在组织上决定：王明、康生等留中央书记处工作；由周恩来、博古、项英、董必武组成长江中央局，领导南中国工作。当时，会议鉴于蒋介石打电报要见王明，决定王明去武汉一次，限1个月返回延安。会后，王明即赴武汉。1937年12月21日，王明等见到蒋介石，向蒋说明了目前抗战形势、国共两党关系、合作抗战的任务和共产国际的某些提议。接着，蒋介石留王明“在汉相助”。在这种情况下，12月23日，中央代表团与长江中央局召开了第一次联席会议，为工作集中和便利起见，决定中央代表团与长江中央局合为一个组织，对外为中央代表团，对内为中央长江局，以周恩来、项英、博古、叶剑英、王明、董必武、林伯渠7人组成，王明为书记兼党



报委员会主席。后来，周恩来曾说：“长江局书记，本来是我，我错误地推给你（指王明——引者）。”<sup>①</sup>

王明在中共中央长江局工作中，把自己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不执行中共中央洛川会议所制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自行其是。1937年12月25日，王明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对时局的宣言》，27日，又发表了《挽救时局的关键》一文，大肆吹捧国民党蒋介石，公开宣扬国民党在抗战中的领导地位。他说：“自卢沟桥事变以来，我国军民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先生领导之下，对暴敌已进行了五个半月的英勇抗战；……相当地打击了日寇的凶焰，部分地消耗了日寇的力量，增加了日寇前进的困难，助长了日寇内部的矛盾，……因而也就奠定了我们今日继续抗战和争取最后胜利的基础。”“如果国共两党以合作的力量和方式达到驱逐日寇出境的胜利，那么，国民党在实际上证明其为中国人民的民族生存而奋斗的最大政党，国民党的领袖蒋先生及其他坚决领导抗战的人物，将成为中国的不朽的民族英雄”。不仅如此，而且王明公开提出六大纲领，与洛川会议通过的十大纲领相对抗。他的六大纲领是：（1）动员全中国的武力、人力、智力、财力、物力，继续守土抗战，巩固国防，保卫武汉，阻止敌人的深入，以便争取时机，加强力量，准备进行决定的战斗。（2）巩固和扩大全中国的统一的国民党命军——统一指挥、统一纪

---

<sup>①</sup> 见1949年3月周恩来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律、统一武装、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的国防军队。(3) 充实和加强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4) 实行国防的经济政策。(5) 建立巩固后方，动员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协助军队和政府积极抗战。(6) 扩大国际宣传和增加国际援助。从总体上看，这六大纲领否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地位，是完完全全的投降主义的纲领。

### 三、王明在三月会议上发展右倾投降主义

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会议，在党的历史上称为抗战初期的三月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王明、张闻天、周恩来、康生、凯丰、任弼时、张国焘。会议的中心内容是讨论抗战形势和如何继续抗战。

王明在会上继续坚持并发展他的右倾投降主义。他在会上作的《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政治报告和会议结论，虽然承认他发表的《对时局的宣言》向国民党让步太多，但仍继续坚持和宣扬他的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他主要讲了以下几个问题：(1) 抗战形势和第二期抗战的任务。王明认为，8个月抗战造成了我国空前未有的进步，即全民族的空前觉醒和空前团结；统一政府和统一军队的建立；政府与人民关系开始逐渐改善；武力开始与人民结合；中华民族和国家地位在国际上的增高；世界先进人类对我国同情的空前增长。因此，保卫山

西、河南、陕西，以达到保卫武汉的目的，是一切抗日党派和全国军民今天最紧急最重要的任务。我国军民现在应当尽一切可能用一切力量来达到武汉不被敌占领的目的。同时，应当对保卫武汉事业具有最高的热忱和抱着最坚强的信心。（2）第二期抗战的军事问题。王明对进行第二期抗战的意见是：确定和普遍地实行了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建立真正统一的、政治坚定的、战斗力强的国民革命军，统一军队必须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和统一作战行动；要建立几十个师团的有新式武装的部队作为全军的骨干；应迅速建立和扩大军事工业和加速军事交通线。并说，国民党现在提出只要一个军队，我们也不能反对这个口号，须在党内进行教育。（3）对国民党的希望。王明说，国民党现在在政府和军队中均居领导地位，为我国第一个大政党。对于我国领导军民抗战的第一个大友党——国民党，抱着诚挚的友谊，充满着热烈的希望。国民党愈加改进，愈加强，愈有力量，就是等于抗战事业的愈改进，愈加强，愈有力量。（4）关于统一政府与服从中央政府问题。王明认为，为了确保抗战事业的胜利，必须有全国统一的政府，这是我们自始至终的坚强信念。陕甘宁边区政府是中华民国的地方政府之一，服从统一的中央国民政府。我们要立即表示不愿地方与中央分裂，我们要说明反对不要中央政府的倾向，在全国解释民主共和国，即中华民国。现在陕甘宁边区要开放党禁，允许国



国民党公开活动，现在特区不允许国民党活动是不好的。八路军新占领的区域，还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必须要服从中央政府。在我们政府统治区域的民众运动的总方针，应该是动员与组织民众去帮助国民党政府和军队进行抗战和取得抗战的胜利。总之，王明在三月会议上的政治报告和结论，是继续坚持其右倾投降主义，并把他的右倾投降主义作了进一步的阐述。3月11日，王明写了《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一文，在《群众》杂志上公开发表，把他在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的基本内容公之于众。

会议期间，毛泽东曾提议：“王明同志在今天的形势下，不能再到武汉去”。但是，到会过半数的同志仍然同意他去。

王明再次到了武汉后，继续对抗党中央。1938年3月底，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王明于3月21日起草了题为《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阐述了关于巩固与扩大各党派的团结、关于健全民意机关、关于动员与组织民众等三个问题的意见。说什么“贵党（按：指国民党）为中国第一大政党，在政府和军队中均居于领导地位”。文件写好后，一面送中共中央，一面于3月24日擅自送给了国民党。中共中央收到《提议》后，认为这个《提议》没有提到坚持抗战、坚持武装群众、坚持改善民生，不同意这个文件，并于3月25日另行起草了一个题为《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电》。此电发到长江局后，王明不仅不将电报转交国民党，反而于4月1日复电党中央，说什么“我们起草的提议书已送去，国民党临时



代表大会已召开，你们所写的电报，既不可能也来不及送交国民党，望你们在任何地方不要发表你们所写的第二个建议书。”王明不服从中共中央，反而要党中央服从他。

1938年上半年，华中地区具备大规模发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条件。当时，华中地区也是日军战略进攻的主要方向。1937年11月和12月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后，日本侵略者为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日军由南京、镇江等地渡江北上，1938年1月，占领蚌埠。1938年3月，李宗仁指挥的国民党军队在台儿庄一役中曾取得某些胜利，但没有扭转整个战争被动挨打的局面。4月上旬，日军发动徐州战役，5月19日，国民党军放弃徐州要地。1938年6、7月间，日军先后占领了安徽省的安庆、潜山、六安以及江西省的马当、湖口、九江等重要城镇。从6月中旬开始，日军即由长江南北和平汉线兵分多路围攻武汉。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在华中地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和建立抗日根据地是极为有利的。如：上海、南京、徐州失守后，国民党在苏、皖、浙、鄂、豫等省的反动统治已经瓦解，日伪政权还没有建立或巩固；中共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已在华中广大人民中发生了很大影响，华中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国民党军队撤退时，沿途丢弃了大批枪支弹药；大江南北有党的领导的十余支游击队，保存了一批长期坚持游击战争、经验丰富联系群众的革命干部，并且，中共中央决定南方八省的红军和游击队编成新四军，它是发展敌后游击战争

的骨干力量；在各大小城市中，有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和工人是同情和支持中国共产党的，白区党的组织逐步地在恢复和发展，等等。

这期间，中共中央多次致电长江局和东南分局，明确指出新四军的行动方针，要求王明等认真组织 and 领导华中地区敌后游击战争。1938年5月4日，毛泽东致电项英，指出：“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敌情方面虽较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也会能够克服这种困难，这是河北及山东方面的游击战争已经证明了的。”“在一定条件下，平原也是能发展游击战争的。”5月14日，中共中央又致电长江局、东南分局，指出：“根据华北经验，在目前形势下，在敌人的广大后方，即使是平原地区，极便于我们的游击活动与根据地的创造。”“新四军正应利用目前的有利时机，主动的、积极的深入到敌人后方去，以自己灵活坚决的行动、模范的纪律与群众工作，大大的去发动与组织群众，建立地方党，组织与团结无数的游击队在自己的周围，扩大自己，坚强自己，解决自己的武装与给养，在大江以南创立一些模范的游击根据地。……在大胆的向外发展与积极的抗战行动中，来扩大与巩固统一战线。”5月22日，中央书记处再次致电长江局和东南分局，指出：“厦门失守，福州危急，福建沿海一带区域即将变为战区，请即指示闽粤赣省委、浙闽边省委派得力干部到这些地区指导工作，发展那里的游击战争，组织游击队与创立游击根据地。”同日，中央书记处发出《关

于徐州失守后华中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一）立刻成立鄂豫皖省委，领导津浦路以西、平汉路以东、浦信公路以南的广大地区的工作；……该省委的中心任务，是武装群众，准备与发动游击战争，有计划地建立几个基干游击区”。“（二）即指示河南省委，动员平汉、陇海两铁路线上所有中心城市的大批学生、工人、革命分子到乡村中去，组织与领导群众，准备与发动游击战争”。“（三）应大批动员住在武汉的鄂豫皖三省的学生、失业工人、革命分子回到自己的家乡去，领导保卫家乡与反抗暴敌的游击战争；应鼓励集中在武汉的人才大批的到长江以北的乡村中去工作。长江局应有计划地分配党员到这些地方，建立各地党的领导机关，大大发展党的工作与党的组织。”

然而，王明右倾投降主义没有在上海、南京、徐州及其他重要的敌占城市附近大力组织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没有集中力量在敌后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乡村工作也非常薄弱，而且，就是在城市工作中，王明也只注意上层统战工作，并要地下党公开活动。结果，暴露了党的组织，使党的工作处于被动地位。

总之，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是：根本抹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不同阶级的存在，信任国民党超过信任人民群众，极力否认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独立自主原则；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企图通过单纯的让步来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否认持久战，把抗

日战争的胜利希望完全寄托在国民党军队的正规战上，不重视中共领导的人民敌后武装斗争。归根结底，王明是把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

抗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内部，1937年十二月会议出现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1938年三月会议上，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继续发展。但是，由于这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1927年春的党，因而王明右倾错误一出现，中共中央即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



# 红军长征史史料研究概述

曾景忠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是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和红军战史上的极其重要的事件。半个世纪以来，关于红军长征的史料非常丰富。为了便于红军长征史的研究，本文拟对长征史料做一概述，着重以专门记述长征的著述为探索对象，按著述发表出版时间的先后划分阶段，同时结合分类来理清红军长征的史料。由于水平有限，本文对长征史料的论述不免有阙漏，欢迎识者赐教补正。

##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阶段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对红军长征史的记载就已开始了。索尔兹伯里认为，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首次向世界介绍了中国红军的长征”，<sup>①</sup>这一说法未必准确。事实上，《红星照耀中国》（英文版）1937年10月首次在英国出版，而在此之前一年多，在莫斯科出版的《共产国际》（中文

---

<sup>①</sup>（美）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自序，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5月出版。

版) 1936 年第一、二期合刊上就已登载了施平的《英勇的西征》一文, 它是最早发表的关于红军长征的报告。有的研究者认为, “施平” 即是陈云的化名。陈云参加了长征, 他在 1935 年 5 月底参加过泸定桥会议后, 受中共中央派遣离开长征队伍, 在地下党组织的护送下, 经过成都、重庆前往上海, 后取道去苏联与共产国际联系。《英勇的西征》一文主要叙述中央红军长征初期的情况, 并总结了一些经验教训。因该文距其亲历的长征时间很近, 故其史料价值极高。1935 年秋, 陈云署名“廉臣”, 撰写了《随军西行见闻录》, 假托一名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的口气, 叙述红军长征的历程。1936 年它发表于中国共产党在巴黎办的《全民周刊》。同年 10 月 7 日, 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这应是第一本问世的长征专著。1937 年 3 月, 王福明在北京编辑出版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书中, 曾将《随军西行见闻录》列于书后, 并附有照片、歌曲和《红军长征路线图》。1938 年, 《随军西行见闻录》一书首次在国内单独出版, 书名改为《随军西征记》, 由生活书店、新知书店发行。1949 年 6 月, 又以《红军长征随军见闻录》的书名, 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群众图书公司发行。这时上海刚刚解放, 此书的出版有重要的政治意义。1985 年 1 月, 《红旗》杂志首次署名陈云发表了《随军西行见闻录》全文。同年 6 月, 红旗出版社重印此书单行本。

在国外, 1936 年至 1937 年间, 由中国共产党在巴黎主办的《救国时报》上曾登载过《雪山草地行军记》、《从甘

肃到陕西》等文，<sup>①</sup>记述了红军长征英勇艰难的历程。

就在红一方面军主力长征到达陕北后不久，1936年8月，一方面军（此时已为与十五军团合编的序列）政治部发起撰写长征回忆录的活动，并成立了编辑委员会。毛泽东和杨尚昆为出版《长征记》征稿，发出给各部队电。电文说：“现有极好机会，在全国和外国举行扩大红军影响的宣传，募捐抗日军费，必须出版关于长征的记载。为此，特发起编制一部集体作品。望各首长并动员与组织师团干部，就自己在长征中所经历的战斗、民情风俗、奇闻轶事，写成许多片断，于九月五日以前汇交总政治部。”另外，在给参加长征的同志信中说：“现在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sup>②</sup>后来在此基础上编了《二万五千里》一书，分为两册，一册为回忆录，一册为资料（由各种命令、日记和报纸资料编成）。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一书中，曾称颂“由红军各级人员百余人所写的故事、诗歌、特写和日记所编纂的两卷本《长征》”，说“长征不仅是革命战

---

<sup>①</sup> 此二文连载于《救国时报》108期（1937年7月5日）至184期（1938年1月2日）。

<sup>②</sup> 毛泽东、杨尚昆：《为出版〈长征记〉征稿》（1936年8月5日），《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37—38页，新华出版社1983年12月出版。

争史上伟大的史诗，还孕育了伟大的民间文学。”<sup>①</sup>此外，还编写了《长征大事记》（1934—1935），黄克勤写了《长征记》（1936年9月7日于预旺堡），朱瑞写了《长征》（甲）（1936年6月17日）。

当然，从国外来说，斯诺的《Red Star over China》的出版在英语国家中的影响要比中文版的《共产国际》、《全民周刊》和《随军西行见闻录》等书刊大得多。斯诺此书是他于1936年6月秘密进入陕北苏区后，采访了许多中共和红军领导人，以朴实生动的笔触报道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的革命业绩。书中第五篇专门叙述了红军长征的情况。毛泽东看过该书的全译本，说这本书正确地报告了党的政策和他本人的观点，称此书忠实地反映了我们的情况。该书英文原作于1937年10月首次由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1938年1月在美国由兰多姆出版社出版。它问世后1年内连续再版5次。1938年2月其中译本在上海由复社出版。<sup>②</sup>当时为躲避检查，取书名为《西行漫记》。应该说，这也是早期载有红军长征史料的重要著作。此书中有关红军长征的内容，曾以《二万五千里长征》为书名于1949年5月30日由上海文学出版社出版。

1938年1月由文摘社出版、黎明书局发行的《二万五千里》一书，标明为史诺著，汪衡译。该书前言中说，材

---

① 见《伟大的道路》第356页，三联书店1979年版。

② 系由胡愈之组织胡仲持等翻译成中文，发起组织了“复社”出版（见《今晚报》1988年5月25日）。



料系以 E·Snow 在 Asia 杂志（《亚细亚》）上分四期发表的 Long March（《长征》）为主，兼及其在美国 The New Republic（《新共和》）上发表的《中国苏维埃》一文编写的，补充了许多细节。此书篇幅虽不大，但比较系统概要地介绍了长征过程。前言中还总结了红军长征的经验，说到：“中国民族的吃苦耐劳的精神，是今日世界上任何民族都赶不上的”。“具有高度机动性而政治水准很高的军队，可以战胜在武器、资源、经济等方面远占优势的敌人，只要自己能站在主动的地位，采取主动的战略，与民众打成一片。”

《西行漫记》中关于长征的内容多次以小册子形式印行。1949年8月，香港启明书局以《长征25000里》的书名再版，比《西行漫记》多《旭日上的暗影》一章。抗战时期还有误将廉臣与斯诺同视为美国人的，或摘录斯诺和廉臣二书中片断合编为小册子的。如：明月出版社1938年1月出版（美）廉臣著：《从东南到西北》；大文出版社1939年1月出版（美）史诺廉臣等著：《长征两面写》。

在国内公开报道红军长征情况的，当首推著名记者范长江。范从1935年7月起，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的名义赴中国西北地区考察旅行。他是除美国记者斯诺之外，正式以新闻记者身份进入陕北苏区的第一个人。他的旅行游记陆续在《大公报》发表。他所写的《陕北之行》（1937年4月21日写于上海）介绍了博古、毛泽东与他所谈从反五次“围剿”失败到长征的情况，包括渡乌江、渡金沙江、过

彝族区、越大渡河、过腊子口等情形，其所记扼要简约。“他第一次公开报道了正在进行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打破了蒋介石的新闻封锁，增进了广大读者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了解。”<sup>①</sup>

抗战初期，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后，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能公开活动，于是在上海、武汉等地相继出版了有关红军长征事迹的著作多种。黄峰编的《第八路军行军记：长征时代》（1937年11月12日印行，上海光明书局、东方图书杂志公司经售），辑录了有关红军长征和陕北边区的生活及有关中共统一战线的情况。赵文华编著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记》（1937年12月由大众出版社发行）和朱笠夫编著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记》（1938年1月由抗战出版社出版），不仅书名相同，内容也基本上一样，均简要叙述了红一方面军长征的历程，书后附有《红军第一军团西行中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唯朱著书前印有毛泽东、朱德照片各一帧。类似的小册子还有救亡研究社编的《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上海救亡出版社1937年12月出版）；大华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记》（复兴出版社1938年1月再版）；洛夫著《长征集》（故事新编）（由胜利出版社江西分社1942年6月出版）。

抗战时期在解放区，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于1942年

---

<sup>①</sup> 《范长江同志小传》（东辑）、《中国的西北角·序言》（沈潜），载范长江著《中国的西北角》；范长江：《塞上行》，二书均为新华出版社1980年出版。

出版过《红军长征记》(上、下二册),作为党内参考资料。与斯诺齐名的还有美国作家爱格丽丝·史沫特莱,她也曾亲赴中国革命根据地采访,写成了《伟大的道路》一书<sup>①</sup>,其第九篇专写长征。朱德曾提供给她刘白羽写的《朱德传》部分草稿、《长征》故事两卷和抗日战争时期的部分写作,书中有许多朱德自述资料。

在国外出版的由外国人撰写的涉及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内容的著作中,应当提到阿尔弗雷德·勃沙特所写的《The Restraining Hand》一书。此书1936年8月在伦敦出版,1937年译成法文在瑞士出版。1978年重写,定名为《Guiding Hand》。勃沙特原为在贵州镇原城的法国传教士(天主教牧师),1934年10月初在黄平旧州被西征六军团当作帝国主义间谍俘获,后随六军团到湘鄂川黔根据地,又随二、六军团长征,直至1936年4月到达云南富民才离开红军。其后勃沙特即将这段经历写成了此书。书中也介绍了有关红军及长征的一些情况,系其亲历。此书现已被译为中文,以《一个被扣留的传教士自述》为书名,由昆仑出版社于1989年2月出版。

1938年,上海风雨书屋出版的《文献》月刊陆续刊载过黄镇长征途中的画作(当时并不知为黄镇所作),后辑印成《西行漫画》一册,书前附印了长征地图和纪事。它虽

---

<sup>①</sup> 此书于1945年至1949年春写成,1955年首先以日译本问世,1956年纽约出版英文本。中文本于1979年4月由三联书店出版。

然是美术作品，但是以画笔描绘了长征中艰苦卓绝的战斗生活和红军战士的高度乐观主义精神，用绘画语言记录了长征历史。它既是珍贵的艺术品，又具有史料价值，正如肖华所言：“是伟大长征的片断记录，是真实的革命史料”。其中有些画幅上的题记，则是长征过程中留下的文字性史料。此画册1958年重印。1962年7月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时，始知为黄镇所作，改名为《长征画集》。1977年7月再版。

抗战胜利后至全国解放前夕，解放区陆续出版过一些有关红军长征的小册子。如阿大等人著的《长征的故事》，辑录有华元、白刃、肖华等人的回忆。此书在1945年至1949年间先后由韬奋书店、东北抗日联军总政治部自卫出版社、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东北书店、华东胶东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和西北新华书店出版发行。类似的红军长征故事版本较多，山东新华书店、华东新华书店、北平万国书店、大连新华书店、中原新华书店、新民主书店均出版过。晋察冀边区西北印刷局还翻印过阿大等人著的《中国红军长征的故事》。此外还有：陆定一等著《长征的回忆》（冀中新华书店，1947年），杨定华著《雪山草地行军记》（佳木斯东北书店，1948年；中原新华书店、苏南新华书店，1949年），关青编著《二万五千里长征记》（一名《二万五千里长征》）（冀东新华书店、天津知识书店，1949年），这些小册子均记述了红一方面军长征过程中一些重要的战斗情节。



##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曾陆续出版发行过记述红军长征的小册子和红军长征的故事读本，有一些是再版。如李震一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记》，武汉通俗图书公司1950年12月出版；应力著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增订本），由中国青年出版社于1951年12月出了第五版。以《红军长征的故事》为书名的有很多。1951年由北京开明书店印行周振甫撰的《万里长征》一书，综述了红军长征历程。

建国初期，陆续出版过两种系统的红军长征回忆录资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一为1955年5月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此书分三部分。第一辑汇集了红一方面军同志在长征结束后不久所写的一部分回忆录，共51篇。第二辑为《二万五千里》一书，有根据长征中各种命令、日记和报纸编成的关于红一方面军长征的统计资料三则，系一军团长征中经过的地点及里程一览表、所经过的著名山水关隘封锁线一览表、所经过的民族区域表。第三部分是附录，有《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概述》（缪楚璜撰）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线图》。此书1958年2月再版，第一辑之末有定一、拓夫1935年10月在陕北吴起镇合编的《长征歌》。

二为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年征文编辑委员会所

编的《星火燎原》第三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0 年 2 月出版）。此书是全面反映一、二、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长征情况的大型回忆录合辑，含刘伯承《回顾长征》等文 70 篇，所辑文章生动地描写了红军指战员斩关夺隘、抢险飞渡、翻越雪山、跨过草地的英雄事迹和崇高的革命品质，时间跨度为从长征开始到三大主力会师，凡长征中的重要情况和关键战役在文中均有所反映。

遵义会议纪念馆编的《红军长征在贵州》（1960 年 6 月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系根据沿红军长征在贵州的行军路线征集采访的材料编写而成，它记述了红军长征在遵义和贵州各地的斗争历程和事迹。

五六十年代陆续出版了一些红军长征亲历者个人的回忆录著作。如张爱萍的《从遵义到大渡河》（北京作家出版社 1960 年出版），刘亚楼的《渡乌江》（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6 年 4 月出版）。毛泽东的警卫员陈昌奉口述、赵骜整理的《跟随毛主席长征》，1957 年 8 月 1 日先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在《新观察》连载，1958 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1973 年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被译为 16 种文字在国外广为发行。1986 年 9 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重新出版此书。类似的著作在 70 年代也出版过，如周恩来的警卫员魏国录的《随周恩来副主席长征》（中国青年出版社 1976 年 12 月出版），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的《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77 年出版）。

原一方面军八军团电台工作人员黄良诚，后调至五军

团，随四方面军长征，西路军失败时被捕入狱，后脱险归队。他的《忆长征》（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 1959 年 9 月出版）叙述了他从离开中央苏区直到脱险归队的历程。长征时在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电台工作的戴镜元口述的《长征回忆》（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0 年 3 月出版），也回顾了其长征的经历。

1960 年 1 月，地图出版社出版了由该社历史地图编绘室编制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线图》（大张），使人们比较清楚地了解了红军长征的路线。

自 1966 年起的“文革”十年中，学本研究完全瘫痪，红军长征研究亦不例外，只是偶而应景出版过几本小册子或回忆录。

1975 年红军长征胜利（实际上是一方面军长征胜利）40 周年时，出版了一批有关红军长征的书。是年 10 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纪念长征胜利四十周年》，收录了《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与书名相同的联合社论一篇，刘伯承《回顾长征》和署名的《论四渡赤水》一文。同年，贵州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了《红军四渡赤水之战》一书。江西大学历史研究室编印了《纪念长征胜利四十周年》回忆录一册，复旦大学政治理论课教研室编印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四十周年》回忆录一册。1975 年及其后几年中，一些省和自治区出版了一些长征回忆录。

“文革”一结束，1977 年 1 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成仿吾的《长征回忆录》，作者写作时参考了一些回忆录和著述，

因而带有撰著性质。1978年3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李安葆撰写的《长征史话》，以通俗的形式简要叙述了红军长征的经过。

对比建国前和建国后出版的红军长征史料著作，有着明显的不同。建国前的史料著述主要突出红军长征中英勇艰苦的奋斗，一般不涉及党内路线斗争；建国后的著述则突出了红军长征中党内路线斗争，即使是记述红军战士艰苦战斗的历程，也贯穿了党内路线斗争，突出批判遵义会议前的“左”倾错误，强调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党内军内领导地位的作用，批判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在长征史实的叙述中这种情况也有所反映。比如，廉臣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和史诺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均具体叙述了长征前的各项准备工作，说红军战略转移“显系有计划之行动”，“确已进行了充分准备”，“他们在这种艰苦的情势中将各方面准备完成以后，就开始了这著名的长征。”而建国后的回忆录中称红军长征“实行了逃跑主义”，“猝然决定离开中央根据地”，未作“必需的准备工作，即仓促转移。”<sup>①</sup>在写法上，初期的一些回忆记述长征的文章，多数是一件事情的片断回忆，写作质朴无华，真实生动，包括写到某些挫折、失误，甚至闹笑话亦不隐饰。如有的著作写到“茅台逸事”：有的红军战士因不知茅台酒

---

<sup>①</sup> 《星火燎原》（三）第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



为何物，曾将它当作洗脚汤。<sup>①</sup>建国后发表的著述则注意到系统性、全面性，取材有所选择，写作注意提炼，描述长征过程更加细致。从写作者来说，建国前发表的回忆录以一般干部战士为多，建国后元帅将军和高级干部写出了大量回忆录。

## 新 时 期 阶 段

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党逐步纠正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学术研究恢复了生机，有关红军长征的史料著述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1986年10月为红军长征三大主力会师50周年，在此前后出现了长征史研究的高潮。

许多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和中国现代史著述中有相当篇幅叙及红军长征内容，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不能一一提及，只简单介绍几种中共党史和军战史的资料和著作。关于红军长征的文件资料，在1957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印的《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197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共中央党校编的《中共党史参考资料》（197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编的《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中均收集了不少。由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编辑部编著

---

<sup>①</sup> 朱笠夫编著：《二万五千里长征记》第36页，抗战出版社1938年1月出版。

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1987年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对红军长征历程有系统的叙述。这些史料和著作对研究红军长征均有重要参考价值。在一些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的文集中也有有关红军长征史的文献资料,如张闻天、董必武、任弼时等人的文集中。

1979年以来,有关红军长征的史料搜集整理取得很大进展,公布了不少档案,发表了大量回忆录,研究长征的著述也不断涌现。下面从几个方面分别叙述。

### (一) 红军长征原始资料及所经各省资料

#### 1. 红军长征所经各省资料

红军长征所经过的一些省份,相继编纂了红军长征经过该省的有关文献资料。在这方面贵州省着手最早,成果亦最为丰富。贵州省革命文物历史文物调查征集办公室编辑的《黔山红迹——红军在贵州的革命活动》(1981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内容包括红七军转战湘黔边,红二军团在黔东,红一方面军长征在贵州,红二、六军团会师黔东及在贵州的活动等几个方面的情况概述,另有各路红军在贵州制订和印发的各种文献资料。中共贵州省委党史办公室编辑了《红军在贵州》资料汇编三册,第一辑为红二军团西征、红二、六军团会师和九军团在贵州转战情况的考订、调查资料和综述;第二辑为红一方面军、红二、六军团在贵州的活动,四渡赤水的资料,包括标语歌谣、访问综述;第三辑为一些专题研究、考订和访问资料。《贵州社会科学》编辑部、贵州省博物馆合编的《红军长征在贵州

史料选辑》(1983年编印),内容为红军文献(文件、电报)、历史回顾(回忆录、访问记、日记)、敌方资料(电文、文件及旧报刊资料)、其他综合专题参考资料、考订、综述等四大部分。此书计60万字,编辑体例严整清晰。贵州师范学院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学小组1979年6月编印过一本《遵义战役资料汇编》,书中搜集有文件资料52件,有关遵义战役的回忆录、调查访问记录及敌伪档案资料等。贵州省一些地区还编印了红军长征经过该地区时活动的资料。中共黔东南州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著的《红军在黔东南》(1985年7月印行),包括红七军、六军团、一方面军和二、六军团征战于黔东南地区的活动情况综述,红军的文献、回忆,敌方的文电资料、回忆等。中共毕节地委党史办公室编印的《红军在黔西北》(1986年3月),内容包括中央红军和二、六军团在黔西北地区征战的经过,收集有文献资料、访问记录和国民党政府方面的档案资料。黔西南州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了《红军长征路过黔西南州》(载黔西南州文史资料第4辑,1985年1月)。中共遵义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印了《长征火种:一九三五年遵义县革命委员会》(资料)(1987年10月印),收录了红军长征经过遵义时建立革命委员会的活动资料。

中共湖南怀化地委党史办公室编的《红军长征在怀化》(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出版),内容为红二、六军团长征过怀化的经过,中央红军进通道的有关资料,包括文电、回忆、怀化地区各县党史办公室的调查报告。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地委和红军长征经过该地区八个县委的党史办公室编写的《红军长征过广西》(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6 年出版),内容包括红六军团和红一方面军过广西概述、文献资料(中央文电、中央负责同志有关论述、宣传资料、《红星报》资料、长征日记等)、回忆录(调查访问记录、国民党将领回忆)、国民党军队方面的电文档案、报告演说、报刊报道、大事记及专题研究文章,篇幅较大。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的《红军长征过云南》(资料集)(云南民族出版社 1986 年出版),内容有遵义会议后红军在川滇黔边境战斗和后来渡金沙江的资料,红二、六军团过云南渡过金沙江的战斗经过资料,分红军文献(文电、布告、标语)、回忆录、有关县委、州委党史办公室的调查资料和国民党方面的文电几部分。云南省军区党史办公室编的《红二、六军团长征过云南》(资料集)(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出版),辑录有红二、六军团过云南期间的文电及回忆录、综述,还附有敌军概况。

甘肃省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的《三军大会师》资料二册(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2 月出版),系红军长征经过甘肃和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师的资料,时间跨度为从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分手,直至山城堡战斗为止。分概述、回忆录、大事记、历史文献资料(文电)、图表、国民党军队围堵资料(档案、报刊、国民党军方面作战回忆)。会宁县纪念红军会师 50 周年筹委会编印了《会师颂歌》资



料（1986年10月）。天水市委党史办公室编印的《红军长征途经天水》资料（1985年8月），含回忆录、访问调查等。迭部县委党史办公室编印了《红军长征经迭部》资料（1986年4月）。

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党史办公室、博物馆、档案馆选编了《红军长征在宁夏资料选编》（1982年6月）。

中共陕西延安地委党史办公室编了《红军长征到延安》（1986年8月）；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辑的陕西党史资料丛书第四辑为《红军长征胜利到陕北》（文件、回忆录集），由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出版。

## 2. 国民党军政档案资料

近10年中，在编辑红军长征史料过程中，党史、档案工作者亦注意选编国民党军政档案资料，从中既可了解到国民党政府的军队如何部署围追堵截长征中的红军，亦可从敌方窥见到有关红军长征活动的一些记载。

贵州省档案馆编的《红军转战贵州——旧政权档案史料选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5月出版），内容分五部分。前编：红三军与红六军团黔东会师；甲编：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及贵州省政府关于围追堵截中央红军的文件电报；乙编：宜昌行辕及驻黔绥署关于围追堵截红二、六军团的文件、电报；丙编：国民党地方官员及邮局长呈报红军过境情形；后编：有关川滇黔游击纵队、贵州抗日救国军各支队活动情形的敌方档案。此书内容比较全面、系统，分类清晰。

四川档案馆编了《国民党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四川部分）》，由档案出版社1986年11月出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的《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中央部分）》上、下二册，由档案出版社分别于1987年5月、9月出版，内容为国民党中央军政机关“追剿”红军长征的战略部署、计划作战方案、蒋介石与各省军政要员的来往电报、文件、讲话等。

红军长征所经过的其它一些省份的档案部门亦编辑出版了一些该省有关国民党军队追堵红军长征情况的档案资料。

### 3. 长征日记

长征中红军指战员写下的日记是极珍贵的长征史料。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了肖锋的《长征日记》（1934年10月16日—1936年12月23日）。肖锋长征时曾任红一军团一师三团党总支书记、一师政治部巡视团主任、一军团直属队党总支书记、一师三团政委等职。现在出版的肖锋《长征日记》已非其长征日记原貌；它是作者根据其长征中的日记原作，从1945年2月起花了3个多月时间找领导和战友核对，作了一次较大的补充，解放后又陆续进行了几次誊写和整理才搞出来的。

陈伯钧、童小鹏、伍云甫、张子意4人的日记合集《红军长征日记》（中国革命博物馆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6月出版），是一份重要的长征史料。陈伯钧长征时先后任红五军团十三师师长，五军团参谋长，四方面军九军、四

军参谋长，二方面军六军团军团长。陈伯钧日记起于1934年10月18日，止于1935年7月7日。童小鹏长征时任红一军团政治部秘书，其日记时限为1934年9月1日至1935年10月31日。伍云甫长征中任中革军委总部三局副局长、政委、二局政委。其日记起止时间为1934年11月8日至1936年10月30日。张子意长征中任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其日记时限为1936年7月10日至同年12月5日。他们在红军中均担任过重要职务或在重要岗位，因此所记资料具有重要研究参考价值。另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年还出版过《陈伯钧日记（1933—1937）》；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6月出版过童小鹏的《军中日记》（1933年1月1日——1936年12月16日），其长征日记包含在内。

长征时期红九军团军团部文书参谋林伟的日记《“战略骑兵”的足迹》（战士出版社1983年10月出版），是红九军团1934年7月至1935年7月和红军总部1935年7月至1936年11月的战地日记。红九军团掩护过由红七军团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队，长征中在左后侧掩护中央纵队，一度又单独留在黔北作战，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被编入左路军，曾三过雪山草地。这本日记对党中央的战略战斗部署、全军的方向及变动和重大事件记述甚详，对途经的山水地形风土人情均有描述，对了解研究红军长征的斗争历程有重要参考价值。

1990年6月，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赵镕的《长征日记》（1933年12月4日—1936年10月24日）。赵镕长征

期间曾任红九军团供给部长、红四方面军供给学校校长、红三十二军供给部长。

另外，在一些刊物上曾陆续发表过某些红军指挥员的部分长征日记。如：1983年第3、4期《党史研究资料》登载了曾任中央红军国家保卫局保卫总队（政治保卫团）政委的张南生的日记（1930年5月18日—1934年12月14日）；1985年第2期《军史资料》登载了曾任红一方面军一军团一师政委的赖传珠的长征日记（1989年7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赖传珠日记》）；1987年第1期《军史资料》登

载了曾任红一方面军政委的关向应的长征日记；《遵义会议纪念馆馆刊》第2、3期登载了曾任中央红军少共国际师师长、一军团教育科长、三军团教导营长的彭绍辉的长征日记。

#### 4. 文物图录

现在我们见到的反映红军长征的文物图录有七八种。按出版时间先后为序有：

中国革命博物馆编著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文物出版社1958年9月出版，辑录了红军长征中的遗址、实物、文件、标语的照片。

中国历史博物馆编的《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文物出版社1977年7月出版，这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文物选辑。

湖南省红军长征调查办公室编的《红军长征在湖南文物图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出版，收有从1934



年至 1936 年红一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长征通过湖南省 9 个地区 43 个县（市）时遗留下来的 2000 件文物中选辑的 190 幅图片。

四川省博物馆肖第忠、沈果正、杨亮升、高文清编写的《红军长征过四川》革命文物选辑，收有长征遗址、文物、标语等图片 61 幅，书面文字介绍较长，达 113 页，由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7 月出版。

甘肃省博物馆编的《红军长征在甘肃的文物》，有文物图片 100 余幅，由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5 月出版。

贵州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贵州省博物馆编的《红军在贵州》文物图集，收有红军在贵州革命活动的文物（决议、文告、标语、传单、重要会议旧址）照片，由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7 月出版。

中共贵州省遵义地区委员会党史资料征集研究领导小组办公室和遵义会议纪念馆为纪念遵义会议 50 周年合编了一本《红军在黔北》文物图录摄影资料，由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4 年 12 月出版。

此外，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编的《中国革命历史资料图集》第 1 集中“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部分收录了相当多的有关红军长征的图片资料。该馆还编制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线图（1934 年 8 月—1936 年 10 月）》，1977 年 2 月由地图出版社出版。

## （二）红军长征回忆录

回忆录是红军长征史料中最丰富的一部分内容。1979

年以来发表和出版的有关长征或含有长征内容的回忆录很多，报刊丛书中发表的回忆录无法尽述，这里只能提到重要的、着重于长征专题的若干回忆录。大体可分综合的和个人的两类。

### **综合性回忆录：**

1985年1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回顾长征》，是一本大型的长征回忆录的汇编，近54万字。书中收有87位老红军战士的回忆文章95篇。从红七军团北上和红六军团先遣西行，包括中央红军、二十五军、四方面军、二、六军团（后二方面军）的长征，直至三大主力会师，一切重大的事件均有所反映，读者能从中比较系统全面地了解长征中各路红军的战斗历程。

北京军区红四方面军革命回忆录编辑组编的《艰苦的历程》上、下二册，由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出版，共收回忆录42篇。除少数几篇是回忆红二十五军、二十八军的历程外，大部分是回忆红四方面军长征及西路军战斗历程的。书中附有长征路线示意图、西路军行军路线示意图。

芦振国、姜为民编的《红二十五军长征纪实》，由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出版，收录了徐海东、程子华等人对红二十五军长征的回忆等22篇。

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宁夏军区政治部编的《红旗漫卷：红军长征西征在宁夏》，亦系回忆录集，由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8月出版。

曾志主编的《长征女战士》一书，分为两卷，由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分别于1986年9月和1987年8月出版。书中汇集了对67位长征女战士的采访记录，有的是长征女战士本人所写的回忆。第二卷末附有未作采访的118人名单。

### 个人回忆录：

个人对长征的回忆，多半是参加长征的红军指战员在本人回忆录中以或多或少的篇幅写出，专门回忆长征的著作比较少。如杨成武的《忆长征》，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2年5月出版。杨成武系红一方面军一军团二师四团政委，该团多次承担过艰险的开路任务。此书记述了该团所经历的惊险战斗和艰苦卓绝的征程，也写出了作者个人的思绪感受。此书已收进《杨成武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6月出版）。程世才的《万里征途》，由辽宁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出版，回忆了红四方面军三十军长征的征程。谢良曾任红五军团十三师三十七团政委，其《铁流后卫》（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77年12月出版）和《独脚将军传奇》（华夏出版社1987年6月出版）两本书，回忆了中央红军长征前段历程、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随四方面军征战及三爬雪山、三过草地，直至西路军失败等情况。

在个人回忆录中含有回忆长征内容的就比较多了。如《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出版）中第11节就是回忆长征的。彭德怀长征中先后任红一方面军三军团军团长、陕甘支队司令，是长征中的重要将领，其回忆显

然是很重要的。不过此书系其身后别人代为整理的。再如：解放军出版社 80 年代出版的《许世友回忆录》、《李聚奎回忆录》、《萧劲光回忆录》、《何长工回忆录》、《陈再道回忆录》、《黄克诚回忆录》等书中，均有对长征的记述。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3 年出版的萧华的《艰苦岁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84 年出版的杨得志的《横戈马上》，也有对长征的回忆。解放军出版社 1984 年出版的潘振武的《战歌春秋》，记述了红一军团“战士剧社”创建发展和活动的情况，反映了长征中红军战士的文化生活。

在个人回忆录中对长征回忆得比较详细，提供了许多重要史料的，当推徐向前、聂荣臻、李维汉等人的回忆录。他们身居重要工作岗位，了解长征中的许多重要情况。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 1985 年 10 月出版）中册第十二章至第十四章，内容为回忆红四方面军长征直至西路军失败的全过程。长征中徐向前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书中对红四方面军长征过程中的一些重要战略决策和具体战役指挥，均有全面介绍。书中真实记载了四方面军英勇曲折艰苦卓绝的斗争和西路军艰险悲壮的历程。《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83 年 12 月出版）第八、九章对红军长征至三大主力会师作了陈述。聂荣臻长征中任一方面军一军团政委，书中对一方面军特别是一军团的长征情况有比较全面的记述。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6 年 4 月出版）中有一节专门回忆长征。李维汉长征前任苏区中央局组织局长，长征中任中央纵队司令员，



他对长征准备和长征初期的情况有不少重要记述。伍修权《我的历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7月出版）中第六、七、八节回忆了长征情况。伍修权曾任李德的翻译，他对长征筹划准备到遵义会议这段时间内的许多重要决策情况是了解的，因此他的回忆对长征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谈到有关长征的回忆录时，应当提到（德）奥托·布劳恩的《中国纪事（1932—1939）》（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12月出版其中译本）和张国焘《我的回忆》（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12月出版）二书。他们二人均为长征的重要经历者，尽管其中一些观点和情节未必符合事实，但仍不失为值得重视的长征史料。

其他还有一些关于红军长征的重要回忆文章。如萧克《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载《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1期）、粟裕《回顾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载《解放军报》1981年7月26日）、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载《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1期）、王震《红六军团小史》（载《军史资料》1987年第3期）等，对研究红军长征均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这些文章一般均收入到有关红军长征的回忆录集里了。

此外，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的《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上下二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1月出版），收集了国民党军队方面追堵红军情况的回忆录。

### （三）红军长征专著

以研究者身份记述或论析红军长征历史的专著长期以来阙如。自1985年、1986年起，围绕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陆续出版了不少长征专著。

### 1. 综合性史论著作

1985年6月，四川省社科院出版社出版了王廷科的《红军长征研究》，书中收录了作者关于红军长征专题研究的论文七篇。与此书类似的还有国防大学党史政工教研室编的《长征新探》（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9月出版），收有长征论文8篇。成都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编的《红军长征回忆与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内容包括回忆录和研究论文，是长征资料和论文合在一起的著作。军事科学院历史研究部和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合编的《历史的丰碑》，是1986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87年11月由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

记述红军长征历史的综合性著作有：伊胜利著《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出版），力平、余熙山、志咸著《红军长征简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出版），李安葆在其《长征史话》基础上撰写的《长征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10月出版），郑广瑾、方十可著《中国红军长征记》（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6月出版），王景佳、张国琦、周炳钦著《截不断的洪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纪实》（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8月出版），金紫光、靳思彤主编的《伟大的长征》（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1年5月出版)。此外，尚有璞玉霍、徐爽迷合著的《铁流二万五千里——红军长征史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出版)，郑理、豫人编的《红军长征大事纪略》(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8月出版)，璞玉霍、徐爽迷、顾训中编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大事月表》(军事科学出版社1986年8月出版)。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著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是一本影响较大的红军长征史专著。作者系美国记者、作家，曾任《纽约时报》副总编辑。他先在北京寻访长征幸存的高级领导人和档案管理人员、历史学家，继而沿着长征路线旅行采访74天。根据文件档案和数百次采访乃写出此书，于1985年6月在美国由哈泼——罗出版公司出版，随后，被欧亚许多国家翻印出版。1986年5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其中译本。该书是外国人撰写的全面记述中国红军长征的重要专著，书中汇集了不少长征人物事件的背景材料，并作出了许多坦率的评断，当然，有些论断并不能获得我国中共党史和军战史研究者的赞同。索氏夫人夏洛特·索尔兹伯里，1984年曾随索氏在红军长征经过的路途采访，她将沿途见闻感受以日记体写出，辑成一集，以《长征日记——中国史诗》为书名在美国出版(纽约，1986年)。中译本于1987年9月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其中一些记述与索氏著作相互映照，对长征史研究亦不无裨益。

作家魏巍的长篇小说《地球上的红飘带》(人民文学出

版社 1988 年 5 月出版)，以文学笔触讴歌了红军官兵艰苦卓绝英勇奋斗的风貌，形象生动地描绘了红军领导人，是记述红军长征的文学专著。另外还有赵尉著的长篇小说《长征风云》，1987 年 7 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 2. 专题专著

就红军长征中某一方面的情况（某一支红军的长征、长征中某一片断、某一长征人物）写的著作，已出版有好几种。

马玉卿编的《红军长征中的七次会师》（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3 月出版），记述了长征中七次会师（七军团与红十军；二、六军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一、四方面军；一方面军与十五军团；二、四方面军；一、二、四方面军）的情况。

李立著的《远征万里——红二方面军长征记》（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10 月出版），系作者根据日记和收集的资料（作者曾在六军团政治部工作过）所写的红六军团长征的事迹。

周锡银编著的《红军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5 年 9 月出版），内容包括作者研究长征中党的民族政策、长征中建立的藏族革命政权——博巴自治政府的专题研究论文，一、二、四方面军经过少数民族地区的大事记，长征时期党的有关民族政策的文献资料，红军长征时期留下的宣传民族政策的标语口号和少数民族编唱的长征歌谣等。



《星火燎原》编辑部编的《老帅在长征中》（解放军出版社 1986 年 9 月出版），汇编了记述朱德、彭德怀、刘伯承、贺龙、罗荣桓、叶剑英在长征中活动事迹的文章，还有徐向前、聂荣臻回忆录中有关长征的部分内容。

平卓著的《长征中的张国焘》（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8 月出版），着重论述长征过程中中共中央与张国焘斗争的情形，对张国焘《我的回忆》中有关这一时期的违背事实的记述进行了驳斥。

郭晨著的《特殊连队：红一方面军干部休养连长征纪实》和《巾帼列传——红一方面军三十位长征女红军生平事迹》（均为农村读物出版社 1986 年 10 月出版）二书，以特写的方式，记述了长征队列中两支具有特殊性的队伍事迹。

红二十五军战史编审委员会编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 1990 年 2 月正式出版），从红四方面军由鄂豫皖根据地西移、红二十五军重建写起至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为止，以红二十五军长征为中心内容。

另外还有贺彪<sup>①</sup>著的《红二方面军从湘鄂边到陕北长征纪实》（华夏出版社 1990 年 3 月出版），记述红二、六军团及其后组成的红二方面军长征的历程。

### 3. 分地区记述红军长征的著作

在专题性的红军长征著作中，有一些是记述红军长征

---

<sup>①</sup> 贺彪，长征时任红二军团四师卫生部长。

经过某一地区活动情况的著作。

例如：湖南省红军长征调查办公室编著的《红军长征在湖南纪略》（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5月出版）；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3月出版的《红军长征过云南》；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的《红军长征在四川》（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出版）；中共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的《长征在雪山草地》（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年9月出版）；中共四川省雅安地委党史工委办公室编著的《从大渡河到夹金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9月出版）；中共四川省绵阳、广元二市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的《红四方面军在绵阳广元斗争纪实》（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10月出版）；秦生编著的《红军长征在西北》（兰州大学出版社1991年9月出版）等等。这些分地区记述红军长征的著作均较为详细地论述了红军在该地区的活动情况，有的还附有文献和回忆录，对研究红军长征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此外，还有一些非正式出版内部印行的地区性红军长征史著述。如云南曲靖地区1979年内部出版的《红军长征过曲靖地区史话》等等。

作家黎汝清著的《湘江之战》（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8月出版），是一部以文学形式再现红军长征史实的长篇小说，它对红军的湘江之战进行了详细生动的描述。

#### （四）遵义会议资料

在中共党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遵义会议，是红军长征

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因此，有关遵义会议的资料也是红军长征史料的一部分。

由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合编的《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出版），是有关遵义会议的系统资料。第一部分为遵义会议文件，包括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和陈云《（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部分传达提纲。后者系新发现的传达遵义会议情况的重要文献，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第二部分为中共中央和有关同志关于遵义会议的论述和回忆。附录有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系对遵义会议若干情节的考证分析。

1985年1月为遵义会议召开50周年。《文献与研究》于该年第一期编发了纪念遵义会议专刊，内有四组文电：1. 中共中央致二、六军团，四方面军及中央军委电（1935年2月28日）；2. 遵义会议部分参加者或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关于遵义会议的论述、回忆；3. 遵义会议前后中央有关重大战略方针的七个文件；4. 遵义会议前后我军作战情况的军事电报41件。《中共党史资料》第六辑也编发了遵义会议专题资料。

贵州大学、贵州民族学院、贵州农学院的部分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史教师集体汇编的《遵义会议资料选编》，选录了从长征开始至四渡赤水期间的党和红军的文献、回忆录及敌方资料，以有关遵义会议的内容为中心。此书于

1985年1月印行。

由丁芝珍等6人著的《遵义会议前后》(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出版),着重记述了遵义会议前后红军在贵州的革命活动,比较简略。

遵义会议纪念馆编的《张闻天与遵义会议》,收集了有关张闻天与遵义会议的资料和研究论文,1990年由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遵义会议纪念馆还自1986年起编印了《遵义会议纪念馆刊》,至1991年已出4期,主要围绕遵义会议发表论文资料。

有关遵义会议的回忆录均散见于长征回忆录之中。《遵义会议的光芒》(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0月出版)和《伟大的转折——遵义会议五十周年回忆录专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出版),均为回忆遵义会议及前后长征历程的回忆录合集。

《丰碑》为贵州省纪念遵义会议50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收论文29篇,由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出版。另外,中共遵义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1985年5月编印了《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学术论文选编》;中共遵义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领导小组办公室1986年1月编印了《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专辑》。

文物出版社1987年3月出版了费侃如编的《遵义会议会址》文物图片资料一册。

石永言著的《遵义会议纪实》(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以文学笔触叙述了从湘江之战到巧渡金沙江



这段时间红军在贵州征战的历程，着重写遵义会议，描述了红军人物和事件，特别是党中央领导的更换。

## 红军长征史料开发之展望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关于红军长征史料的挖掘搜集确已取得长足的进展，已经出版的史料数量繁多，内容细密，成绩是巨大的。但是与长征史研究发展的要求相比，现有的长征史料仍不敷研究之需要。以往长征史的整理出版基本上是各自为战，缺乏计划协调，因此也就没有能够形成完整系统的史料规模。面对这种情况，军队系统已开始组织编纂系统的红军长征史料，并将这项工作列为编纂系统的军史资料工作的一部分。全军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85年1月19日将《关于编纂〈八路军〉、〈新四军〉、〈长征〉史料丛书的意见》上报给中央军委，中央军委已经原则同意，同年将这一报告转发全军各大单位。<sup>①</sup>

全军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组织编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资料丛书》，其中《红军长征》卷拟编写五册，第一册为《综述·大事记·表》；第二册为《历史文献资料》，分上、中、下三部分，大部分为首次公布的电报；第三册为《回忆史料》，分上、中、下三册，辑录具

---

<sup>①</sup> 见《党史资料征集通讯》1985年第5期。

有史料价值的回忆录；第四册为《图选》，即照片、战例图；第五册为《反证资料》，即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红军的命令、报告、战斗详报、国民党将领的回忆录文章等。这套资料的出版，将是最完整的红军长征史料。

这套红军长征史料问世后，将会大大改变长征史料开发工作的局面，使红军长征史研究的资料条件大为改善。不过，军队系统编纂红军长征史料的工作，并不能终结长征史料的开发，广大中共党史、军战史研究者仍然不应忽视继续挖掘和整理长征史料的工作。

今后红军长征史料工作从大的方面说，应在以下两个方面着重进行。

一是进一步挖掘长征史料。

红军长征史既是中共党史的重要课题，也是军战史的重大课题，它的内涵丰富，其史料储藏也极丰厚。研究者深感不少史料犹未开发利用，资料的大门也尚未向研究者彻底敞开。不少人慨叹，索尔兹伯里写出了内容丰富充实的红军长征史著作，而国内研究者至今还未写出大型的内容丰富而深刻的红军长征史著作来，这并非因为国内缺乏具有较高研究水平和写作能力的人来完成这项工作，除了其他因素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接触不了那么多丰富的资料。现在国内一般研究人员查阅利用档案资料手续繁复，限禁较多，相当困难。采访某些重要当事者亦非易事。与索氏在中国搜集资料时到处为他大开绿灯是难以相比的。

从目前情况看，开发红军长征史料的潜力还是不小的，

许多资料犹待挖掘。比如，红军长征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过多次会议，许多会议是有记录的（有的同志认为，遵义会议也有记录），这些记录均未披露。如果公布了这些会议的记录，研究者对这些会议的情况和这些会议所决定的长征中的一些关键问题的了解就会清晰得多，一些因缺乏资料而争论不休的问题就会得以澄清。为了真实地揭示历史真相，资料的公布应当是完整的、全面的，而不应是片断的、肢解的、有保留的。除档案资料外，其他原始资料也应尽行刊布，如日记资料、报刊资料等等。另外，应抓紧采访尚健在的长征重要参加者和当事人。总之，红军长征史料还需大力加强挖掘工作。

## 二是整理编纂已刊布的史料。

现在长征史料的编辑出版，一般还限于将搜集到的原始资料从其性质和形式上分类，然后连缀在一起，这与系统地整理编纂还有相当的距离。五六十年代，中国史学会曾组织过对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若干重大专题的史料进行系统的整理编纂工作。像红军长征这样一个重大专题，也应当像中国史学会组织编纂中国近代史专题史料一样，编纂一套完整系统的史料丛书及分题的史料书。编入丛书的史料应是经过充分研究考订后筛选出来，并进行去粗取精的提炼，精当的分类整理编排，按照红军长征的经过和经纬线索，加工串连起来。经过这样一番功夫，才可能编纂出称得上是完整系统的红军长征史料集。这一任务有待红军长征史研究者共同努力。当然，这需要有计划有组织地

进行。

史料开发是史学研究工作的基本建设。我们展望，在红军长征史料研究这一基础工作真正取得重大突破之后，红军长征史的学术园地里必将会万紫千红，百花吐艳，并结出累累的硕果。



## 武汉工人纠察队的建立和失败

张 光 宇

自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后，为了镇压反革命，维持革命秩序，在北伐军占领的城市中，都逐渐建立了工人纠察队。1926年冬，湖北全省总工会设立工人纠察队总部，先后由项英、蒋先云、李立三担任总队长。省总工会下属的武汉工人纠察队也于1926年冬建立，下有两个大队，码头工人纠察队是其主力之一。当时全省各产业总工会设纠察大队，分工会设纠察分队，支部设纠察支队。省总工会成立了纠察委员会，以加强指导。

省总工会十分注意工人纠察队的建设。1927年1月，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听取了关于工人纠察队问题的报告，通过了纠察队决议案，肯定了纠察队在革命斗争中的功绩，提出了加强纠察队建设的措施。会议指出，工人纠察队为纠察工贼及防制反革命分子的组织，“过去纠察队的努力，大会认为是满意的，惟组织、纪律、训练三方面亟应整顿，并应以上列三事，为此后工人纠察队的中心工作”；“工人纠察队组织、调遣、命令，应完全统一在湖北全省总工会工人纠察队总部之下，有不服从者，总部得解散或改组之”；“组织上应即按照产业或职业总工

会之范围改组”；“纠察队总部应扩大训育处之组织及继续开办工人纠察队训练班”。根据大会的决议，省总工会于4月20日举办了纠察队训练班，有学生300余人。5月中旬，汉阳码头工会决定每日轮训纠察队员若干名，使每个队员都受到一次军事教育。为了充实纠察队，省总工会纠察委员会决定：汉阳兵工厂纠察队员扩充至210名，并函军事委员会请拨枪200支；汉阳人力车夫工人纠察队40名，于5月22日送省总工会受训。此外，4月11日，在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邓演达提议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人部及总政治部组织委员会担任纠察队内之政治训练工作，会议决定照此办理。

关于工人纠察队的枪支来源，一是从吴佩孚的溃兵中缴获得来的，二是由武汉政府军事委员会拨给的。在1927年4月2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上，湖北全省总工会请准扩充纠察队至1500名，两人一支枪，共需枪700支。会议决定弹械问题交军事委员会处理。4月29日，在国民党中央二届常委会扩大九次会议上，邓演达提议：“应在可能范围内，为工农武装起来，抽百分之五或百分之十（指汉阳兵工厂新造枪支）均无不可。”这个提议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但是，孙科却说“总工会已有具体提议，先组织一千五百工人纠察队，要七百支枪，军事委员会已允许照付。至于兵工厂枪支现已支配至五月底了，所以就是今天决定下了，在事实上亦领不到枪。”

这时，武汉工人纠察队已发展到5000余人，枪有千余

支。<sup>①</sup>

工人纠察队在发展壮大的同时，不断地进行整顿，加强纪律教育。在4月下旬召开的省总工会纠察队队长联席会议上，讨论了加强纠察队纪律问题，规定“纪律问题照军队办法（执行），违者开除队籍及会籍，任意放枪一次者，拘狱一月”。

为了加强纪律性，根据省总工会通令，已毕业的纠察队训练班学生于5月16日齐集汉口友益街全国总工会纠察队总部举行了一次检阅。5月下旬，全省总工会发出通令，规定：“各工会会员有违反纪律者，得报告总工会逮捕之，但在逮捕后四小时内，须送交总工会裁判委员会，不得私自扣押，尤不得先行殴打。”

这些规定的执行使得武汉工人纠察队纪律严明，自建立之日起，在维护工人切身利益，收回汉口英租界，反击夏斗寅叛变，肃清反革命运动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可是，这样一支工人革命武装，却在1927年6月底自动缴械了。

解散武汉工人纠察队的方针，是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在1927年五六月之交决定的。据蔡和森回忆：“虽然五次大会决定军事工作的新方针是破坏一切旧军队和武装工

---

<sup>①</sup> 关于枪支数目，过去的教科书都说成是3000支。但是叶挺在南昌起义后不久所写的《南昌暴动至潮汕的失败》一文，记载为“工会纠察队约一千余支枪”；项英在1938年写的自传中亦称“工人纠察队有四千余，一千余支枪”。

农，然此新方针从未在五次大会后的中央军委部执行。在五次大会时有改称‘国民党工农义勇军’说，五次大会后，则以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改编入正式军队之论极占优势。夏斗寅叛变时，湖北全省总工会纠察队有逃走怯懦之现象，遂愈益确定了这种‘改编入正式军队’的方针，此方针亦成为政治局中的国是，虽然没有正式决议，如此写明，然精神和工作上完全是朝着这个方向走。”<sup>①</sup>当时的形势是：汪精卫集团的反动倾向迅速增长，5月19日，汪精卫等人以国民党中央名义发布训令，声称要“充分保护工商业者之利益”，要“组织特种委员会”，“审查”并“制止工人及店员之过度要求”，特别指责武汉工人纠察队为不轨，严禁其今后活动；5月中旬夏斗寅发动叛变，向革命疯狂反扑；5月21日，许克祥发动叛变，残酷屠杀工农；5月23日，汪精卫等人又发出对湖北总工会的训令，强迫总工会“裁制”所谓“违反纪律”的工人，禁止工会对不法资本家“逮捕”、“罚醵”。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党中央以“改编入正式军队”的形式，确定了解散武汉工人纠察队的方针。

具体实施这个方针是在6月底。当时汪精卫集团正在秘密策划着反革命政变的阴谋，他们把消灭工人革命武装作为实现这一阴谋的第一个重要步骤。反动军官何键已公

---

<sup>①</sup> 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1927年9月），载《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出版。



开反共，“公开要求C·P分子立即退出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要求解散一切工农会、纠察队、童子团及妇女团体”，<sup>①</sup>并将其三十五军移驻汉口，为镇压革命作准备。而在党中央，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则愈来愈发展，他们放弃对武装斗争的领导权，拒绝执行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6月15日，由陈独秀提出经党中央通过的关于执行共产国际“五月指示”问题给共产国际的复电，认为组织以工农为主体的新军队条件还不具备。复电写道：“我们认为，在完成这个任务之前，同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领导者保持良好的关系是必要的。我们必须吸引这些左派领袖，找出一个共同的政纲。假如同他们分裂，要创造我们自己的军队是困难的，而且是不可能的。”复电还说：“贵方的意见是正确的，重要的，我们表示完全同意。……但是，它在短期内，是不能实现的。”他们要维持所谓“国共两党合作到底”的总政策，执行“以拉拢汪精卫为中心”的方针，对汪精卫集团发动反革命政变的阴谋完全丧失警惕。

在这种形势下，武汉工人纠察队的交枪就是不可避免的了。1927年6月28日，在陈独秀召集的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上，由鲍罗廷提出、政治局讨论决定了武汉工人纠察队自动缴械的建议，由中共湖北省委和省总工会具体执行。毛泽东曾指出：“他（鲍罗廷）随时准备尽力去讨好资产阶

---

<sup>①</sup> 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1927年9月）。

级，甚至于准备解除工人的武装，最后他也下令这样做了。”<sup>①</sup>

根据党中央的决定，湖北全省总工会于当日致函管理武汉卫戍事宜的汉口办事处，通知他们说：“敝会为避免反动派借口武装纠察造谣起见，业于本月二十八日将纠察队全体解散，所有前领枪弹，应即刻交存贵处。除枪弹清册随枪送交外，相应先行函达贵处，烦为查照，于本月二十九日上午十时派员来敝会点收。”<sup>②</sup> 纠察队的枪支就这样交给了以李品仙为司令的武汉卫戍司令部。省总工会并致函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务恳准予派兵保护，并一面通令武汉各军事长官知照。”<sup>③</sup> 同日，省总工会还发出《解散纠察队的布告》，曰：“现在武汉反动派企图挑拨工兵之感情，制造种种谣言，中伤本会纠察队，以致飞短流长，淆乱外间听闻，影响工兵联合战线。本会为避免反动派借口武装纠察造谣起见，业于本月二十八日将纠察队全体解散。所有前领枪弹，并经交存政府，一面仍请政府派兵保护工会。深恐外间不明真相，致兹疑窦，为此布告，仰各界人等一体知照。”<sup>④</sup> 可见，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所以作出这样的决定，是由于屈服于何键等反动军官的压力，为了维持所谓“工兵联合战线”这一目的的。这是陈独秀妥协退让政策的继续。

---

① 转引自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38—139页。

② ③④ 1927年7月11日北京《晨报》。

6月28日的紧急会议原决定“公开宣布解散纠察队，实际编入张（发奎）军”，但执行的情况却走得更远。纠察队是公开宣布解散了，却没有编入张军，枪支也几乎全部交给了敌人。据吴玉章回忆：“军事委员会下令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枪支，陈独秀竟同意了这项命令。于是我们手中仅有的一部分武装也被解除了。事后军事委员会开会时，武汉卫戍司令李品仙还说：‘只收到一千支坏枪’。意思是说还有更多的好枪藏起来了，还要逼我们交枪。其实我们手上已根本没有什么武装了。”<sup>①</sup>蔡和森谈及此事时说道：“不意省委及总工会处理纠察队之事，手忙脚乱，未向负责同志说明，以致一时大形混乱，纠察军及办事人弃枪弃职，逃走一空。”<sup>②</sup>李立三回忆此事时曾说，当时纠察队一跑四散，流氓马上到总工会去抢东西，接着军队即占领工会，工会变成空机关。这说明当时交枪的情况是相当混乱的，在这样手忙脚乱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有计划有准备地将枪支转移到张发奎部队中去的。

省总工会在宣布自动交枪之后，为了杜绝反动派发动政变的借口，继续进行了一些宣传活动。6月28日晚上，由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汉口特别市党部在普海春举行的招待第四次劳动大会代表的会上，省总工会委员长向忠发向代表们介绍了总工会解散纠察队的原因及策略，希望代表们

---

<sup>①</sup> 吴玉章：《第一次大革命的回忆》，载《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sup>②</sup> 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1927年9月）。

“普遍宣传省总工会解散纠察队系促成国民革命整个儿的前途”，并希望政府“勿被流言中伤，而坠入敌人之阴谋”。7月2日，在省总工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向忠发又报告了“此次自动停止纠察队武装之原因及经过”。大会通过的关于纠察队停止武装的决议再次重申：“此次总工会执行委员会，为免除反动派挑拨离间之借口，自动缴存纠察队武装，大会认为迅速处置是对的。”国民党中央工人部代表薛修在大会上也说：“此次总工会自动解散纠察队武装，为避免敌人挑拨离间，足以表现工人阶级顾全革命前途的利益，绝非对反动派让步。”<sup>①</sup>同日，在国民党中央工运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刘少奇代表总工会报告了自动解散纠察队的意义和经过，希望大家不要轻听谣言，为反动派所利用。与此同时，省总工会于7月1日至3日连续在《汉口民国日报》上发表了《全省总工会通电》、《全省总工会告军士同志》、《全省总工会宣言》等文件，力陈解散纠察队的意义，号召进一步巩固工兵联合，并要求国民政府“切实指导工农运动”。省总工会还命令“各工会火速督促宣传队，出发演讲自动解散武装之意义”。

交枪之后，工会随即被敌人占领。为此，李立三和刘少奇及时向国民党中央作了报告。接着，中共中央又通过正式决议，肯定了6月28日的决定。6月30日，中共中央扩大会议所通过的十一条国共两党关系的决议案指出：“依

---

<sup>①</sup> 1927年7月3日《汉口民国日报》。



照国民党主义，须武装工农，但工农武装队均应服从政府之管理与训练。武汉现有的武装纠察队，为因避免政局之纠纷或误会，可以减少或编入军队。”<sup>①</sup>

对于武汉工人纠察队的自动缴械，国民党中央表面上表示将对工会予以保护，实际上暗自高兴。6月29日下午，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33次会议上，汪精卫假惺惺地说：“军事委员会得着了总工会自己缴械的消息，也很觉得奇怪”，“可由本会要军事委员会出一布告，说明此次湖北总工会解除纠察队的武装，纯出于自动的诚意。如有匪徒胆敢骚扰或谋害工会的，定行拿办。”会议决议：“交军事委员会草拟命令，此次湖北省总工会解散纠察队，将枪械交管理武汉卫戍事宜办事处保存，系该工会自动办理，如有匪徒胆敢骚扰或损害该工会者，着地方军警，从严拿办。”于是，次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向武汉卫戍司令和武汉市公安局长发布训令，假惺惺地命令他们“迅饬所属，对各工会严加保护，所有造谣捣乱之匪徒，尤须严密缉拿，尽法惩办，以维持治安。”

交枪事件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它引起了革命队伍的混乱，加剧了革命危机。湖北省总工会自动停止纠察队武装之后，谣诼纷起，社会惶恐，反动派大施破坏伎俩，散布流言，说“总工会自行解散纠察队，各工会不日即取消。”民众即群起猜疑，引起社会不宁，市面紊乱，给反动派以

---

<sup>①</sup> 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256页。

可乘之机。

关于武汉工人纠察队的交枪事件，在后来党中央的决议和领导人的讲话及文章中，都一致认为这是右倾投降主义事件。从当时的形势看，对于如何处理武汉工人纠察队的问题，不能认为自动缴械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因为当时武汉的形势虽然是严重的，但也存在有利的一面。据蔡和森分析：“彼时唐生智、汪精卫与我们决裂的阴谋尚未成熟，势力还未完全集中，我们在豫鄂交界的张兆丰同志（属方振武）之一师二旅劲军还未被解决；张发奎（此时与唐甚冲突）、贺龙、叶挺及军事政治学校之军力皆集中武汉，工农民众冤屈愤慨，正是积久待发。”<sup>①</sup>

在交枪事件发生后仅一个多月，在党的“八七”会议上通过的《告全党党员书》即指出：“中央不但没有设法武装工人，它反一遇见资产阶级方面的不满意，立刻便自动的解散武装，解散汉口工人纠察队”；“中央那时认为武装工农难以实现的，甚至于以为是有害于与国民党军队领袖联合的。经过如此之久的时间，中央忽然‘积极’起来，不过恰好是相反的积极，决定叫汉口工人纠察队‘为避免挑拨离间的冲突起见’，自动的解除武装，这不是公开的取消主义是什么？”

1980年2月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其中谈到此事时指出：“当时以

---

<sup>①</sup> 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1927年9月）。



2 022 9450 6

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屈服于汪精卫武汉政府的压力，为维持国共合作和所谓‘兵、工团结’，决定自动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这个错误是陈独秀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所造成，主要责任在中央的领导。”

1928年在党的六大上周恩来作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的报告时曾指出：“大革命时期，我们党没有认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没有注意抓枪杆子。我们和国民党争夺领导权，还不懂得主要在武装斗争上争夺领导权。……二七年上半年不仅不抓武装，还自动放弃武装，解散纠察队，当然，不是陈独秀一个人，反映了当时整个中央的认识水平。”他还指出：“共产党领导人六月三十日的让步（承认国民党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承认共产党员参加政府是以国民党员资格，共产党员可以请假退出，工农武装应在国民党领导之下，武汉工人纠察队编入军队，取消纠察队）是投降式的让步，企图以此来挽回局面，结果更糟。”<sup>①</sup>

事实证明，这些批评是正确的。武汉工人纠察队自动解除武装一事给予中国革命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

<sup>①</sup>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71页。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 中共党史资料 第四十四辑

作者 =

页数 = 1 0 0 0

SS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目录  
正文